



小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四十三 2024. 7

宇宙无事发生
弗雷德里克·布朗

阿涅斯的海滩 | T.杰斐逊·克兰
理性的疯狂梦 | 本哈明·拉巴图特
欺骗世界的医生 | 布莱恩·迪尔





小说

新书试读 | P.05 敲门声 弗雷德里克·布朗

P.11 理性的疯狂梦 本哈明·拉巴图特

P.17 氯水人鱼 宋玉

P.23 芭芭雅嘎下了个蛋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P.29 基本粒子 米歇尔·维勒贝克

非虚构

新书试读 | P.3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个世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P.45 “反疫苗运动之父”与一场跨越世纪的医学骗局 布莱恩·迪尔

P.51 喜欢追星的妈妈们，到底冒犯了谁？ 塔比瑟·卡万

P.59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年人退出就业舞台？ 日本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

P.65 陈冲：我家住在平江路 170 弄 10 号 陈冲



题图为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2023) 剧照

小鸟回答 Vol.43

小鸟 | 小鸟回答

微信标题：

有关历史和两代人的一些话

自从几年前那些思考深邃的人劝说世人以更大尺度来看待我们的时代以来，我们不但增加了更多的历史感，而且觉得时间也过得越来越快了。

你看，这一年已经过去半年了。

年初的时候，很多人奔走相告，说 2024 年到了，它是个龙年啊，1976 年就是龙年。其实，2012 年也是龙年啊。

2012 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我们说“艰难探索”，也不过是以十年为期的。

i

《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中说 1950 年代的诗人们看到新世纪的曙光：“土地贵族的特权即将瓦解，王室灰飞烟灭，就连英国人强加在伊拉克社会的影响都会消失不见。”其中一位诗人相信眼看一代人梦想就要成真，他讴歌那个时代：

太阳升起，在我城市的上空
钟声鸣响，召唤着一个个英雄
醒来吧，心爱的国度
让我们拥抱自由

1950 年代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世俗化盛景与新时代即将切换。那本书中写到诗人布兰·海德里：

他目睹过 1950 年代的文化盛事——识字率的提高、大众民族主义的政治自信、妇女解放的浪潮，还有作为艺术形式的新文学、新诗歌得到普及与受人喜爱的全过程——以及这场盛事的衰落。他将在 1956 年遭遇苏伊士运河战争——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狂想的高峰——并在十年之后的 1967 年眼看着那股民族主义信心因为“六日战

争”的失败而破碎一地。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海德里那一代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一代之间已经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了。用我们简单阐释阿拉伯文明的方法来说就是：年轻一代的阿拉伯人放弃了老一辈尊崇的世俗政治原则，选择了神权政治。新老两辈分道扬镳，但在激荡的政治与文化局势下，还有更多东西的命运飘摇不定：故乡、记忆、一代人继承文化的方式，还有他们那些不容置疑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统统消散无踪。

ii

这就是历史中发生的事。如果再向后看，布兰·海德里的沮丧将持续六十年，还远未到穷期。

iii

两代人之间的分道扬镳，会加倍这种沮丧。

前些天一个几乎可以说微不足道的小事，牵扯到“质疑”，又撕裂了一些东西。米兰·昆德拉有一本小书《不解之词》，说到“透明”：

在政治与新闻的语言中，这个词意味着：面对公众的目光，揭示个体的生活。这让我想到安德烈·布勒东以及他那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玻璃屋中的愿望。玻璃屋：一个古老的乌托邦，同时又是现代生活最可怕的方面之一。存在这样一个定律：国家的事务越是不清不楚，个人的事情就越必须透明；官僚主义尽管代表的是公事，但它是匿名的、秘密的、有密码的、无法让人理解的，而私人则必须显示他的健康情况、经济情况、家庭状况。而且，假如大众媒体判决、决定的话，他就再也得不到一刻隐私，不管是在爱情中、疾病中，还是在死亡中。打破别人隐私的欲望是侵犯性的一种古老形式，今天，这一形式已经机构化（官僚主义体制以及它的那些止片；媒体以及它的那些记者）。在道德上合法化（获得资讯的权利成了人的第一权利），并被诗意图化了（通过一个美丽的词：透明）。

iv

对于要质疑什么，保持对什么的质疑，以及你所擅长的文字到底它是不是匕首是不是投枪，你要把它使向哪里……如果把上面这一系列问题置入如阿拉伯人所经历的两代人的价值切换，可能会更容易有历史感一些。罗志田讲钱穆晚年回忆：

他十岁上小学时，体操先生钱伯圭告诉他，“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治乱分合往复循环，应该学西方“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此语“如巨雷轰顶”，使他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而“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问题，也“围困住近一年来之全中国人”。

钱先生自认其“毕生从事学问”，皆受此一番话启发。恐怕他的许多著述，都是想要说明中国历史未必走上了错路。

所谓问题就是，前一代人以一生对抗公权力，须臾不可分心，因为他识得公权力的滥用和不受监督是万恶之源。

v

看一本旧书，《独裁者手册》，说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为了警告领导人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不高兴了，而如果政策不改变，他们将把无赖赶下台。然而在独裁国家，抗议具有更深层的目的：摧毁政府的整套制度，改变人民被统治的方式。”

想到两年前，前一代人对后一代人的赞赏、犹疑与不解，其实是两代人各自不同的社会想象。

vi

西蒙娜·薇依说：“罕有一本书像《社会契约论》这样美而有力，清醒又简明，除去书中若干章节以外。据说也罕有一本书像《社会契约论》这样影响深远。然而，世事的一应发生就仿佛人们从未读过这本书似的，从前如此，现在也如此。”

vii

再次提醒，请留意我们此前发布（现在依然挂在小鸟文学 App 首页上）的告示。
因为种种原因，小鸟文学将于今年底结束服务，在此之前，我们力求维持日常更新。

viii

本期封面是知更鸟。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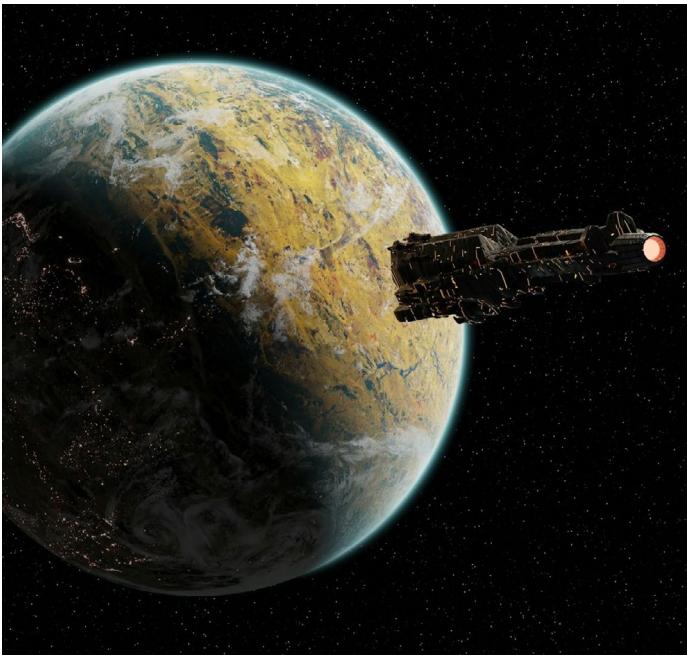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Andrei Sachov](#) on Unsplash

小说

敲门声

弗雷德里克·布朗 | 新书推荐

科幻鬼才、微型小说大师
弗雷德里克·布朗代表作

地球小伙与外星生物赌上各自种族的未来，进行一场不为人知的对决；时间机器被发明出来，用途和功效却是五花八门，甚至令人大跌眼镜；睁眼发现自己成了火星上最后一个人，还穿越到了地球人身上……看似静悄悄的宇宙，也许正发生着你料想不到的疯狂故事……

弗雷德里克·布朗是享誉科幻界的鬼才，亦被认为是微型小说大师。他是类型小说中最早进行叙事实验的作者之一，其作品深受罗伯特·海因莱因、道格拉斯·亚当斯、尼尔·盖曼等一众科幻大师的热爱。《宇宙无事发生》精选 51 篇布朗的代表作品，包括《电兽》《前哨》《角斗场》《敲门声》等科幻史上的名作。这些故事最长不过三十来页，最短的仅有半页，却能在极其有限的篇幅之内展现无尽的巧思，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惊叹于作者的想象力。

经“明室 Lucida”授权，我们摘选了《敲门声》一文分享给读者。



有一则短小有趣的恐怖故事仅有两个句子的长度：

“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内。门外响起敲门声……”

两个句子和一串省略号。当然，恐怖根本不在于这两个句子，而是存在于省略号中，存在于暗示中：是什么敲响房门？人类的头脑面对未知事物时，会主动提供一些隐约让人觉得恐怖的东西。

然而，这其实不算恐怖。

地球上的——或者宇宙中的，都一样——最后一个男人独自坐在房内。这是一间相当怪异的房间。他刚刚注意到房间有多么怪异，他一直在研究怪异背后的原因。他得出的结论没有使他恐惧，却惹他生气。

沃尔特·费伦直到两天前都还是现已不复存在的内森大学的人类学副教授，他不是一个容易受惊吓的人。他并不是一个英雄人物，不管在多么疯狂的想象中都不算是。他的身材瘦削，性情温和，外貌并不养眼，而且他对此心知肚明。

现在让他担忧的并不是他的外表。事实上，他眼下内心相当平静。他知道人类种族已经在两天前被毁灭，整个覆灭过程不到一小时，只有他和一个眼下身在某处的女人幸存下来。这个事实没有引起沃尔特·费伦的一丁点关切。他大概永远不会见到那个女人，假如他见不到她，他也不太在意。

自从玛莎在一年半前过世，女性就彻底淡出了沃尔特的生活。并不是说玛莎生前不是一位良妻——虽然有点专横。是的，他爱过玛莎，深深地、静静地爱着她。他今年只有四十岁，玛莎过世那年，他仅有三十八岁，但——这么说吧——他从那时起就没再惦记过女人。他的一辈子都扑在书籍上，包括他读过的书，他写下的书。现在写书没有任何意义，但他可以把余生花在看书上。

确实，有人陪伴会挺好，但若是没有，他也过得下去。兴许过上一阵，他会变化，会享受一名贊星人的偶尔陪伴，不过那有点难以想象。贊星人的思想对他来说如此怪异陌生，似乎没有讨论的共同基础，虽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智慧。

一只蚂蚁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智慧，但没有地球人与一只蚂蚁建立过交流。不知怎么的，他把贊星人想成超级蚂蚁，尽管他们看起来不像蚂蚁。而且他有一种预感，贊星人眼中的地球人，就像地球人眼中的普通蚂蚁一样。他们对地球所做的事当然就像地球人对蚁丘所做的事——而且完成得更加高效。

但贊星人给了他许多书。他获知他注定要在这个房间里独自度过余生后，立刻告诉贊星人他想要什么，他们马上就满足了他的要求。他要在此度过余生，或者用贊星人奇特的表达方式，永——远。

即便是聪明绝顶的头脑——贊星人显然拥有聪明的头脑——也拥有特殊的癖好。贊星人已经在几小时内学会说地球上的英语，但他们坚持把一个个音节分开来。但我们离题了。

门外响起敲门声。

你现在已经全明白了，除了那一串省略号，而我将会填补这块内容，向你展示这根本不恐怖。

沃尔特·费伦喊道“进来”，房门随即开启。来客当然只是一名贊星人。他的模样和另一个贊星人完全一样，就算存在任何一种将他们区别开的方法，沃尔特也尚未找到。他大约有四英尺高，完全不像地球上的任何生物——是贊星人到达前的地球上存在过的任何生物。

沃尔特说：“好啊，乔治。”当他获知贊星人没有名字后，他决定把他们统统叫成乔治，贊星人似乎并不介意。

这个贊星人说“好啊，沃尔特。”这是例行做法——先是敲门，然后是招呼。沃尔特等待着。

“第一点，”贊星人说，“请你从今往后，坐下时把椅子转向另一个方向。”

沃尔特说“我是这么想的，乔治。从另一边望过来，这面平平无奇的墙壁是透明的，对吧？”“是透明的。”

“正如我想的一样。我是在一个动物园里。对吧？”

“对的。”

沃尔特叹气道：“我就知道。这面平平无奇的空白墙壁，没有半件家具挨着它。而且这面墙的材质不同于其他墙壁。假如我坚持要背对墙壁坐着，那会怎样？你会杀了我吗？——我抱着希望姑且一问。”

“我们会拿走你的书。”

“你捏到了我的软肋，乔治。好吧，我坐下看书时，会面朝另一个方向。除我之外，在这

家动物园里还有多少只动物？”

“216 只。”

沃尔特摇摇头，说：“不够丰富，乔治。就连一家二流动物园都能击败这儿——我的意思是都可能击败这儿，假如世上还留有二流动物园的话。你们是随机选择的吗？”

“随机样本，是的。所有的物种都选上就太多了。选了 108 个物种，每种一雄一雌。”

“你们喂它们吃什么？我的意思是指食肉动物。”

“我们制造食物。合成食物。”

“聪明。”沃尔特说，“植物群呢？你们也收藏了不少植物吧？”

“植物没有被振动损伤，全都仍然在生长。”

“对于植物挺好。”沃尔特说，“你们对于植物不像对待动物那么严苛。好吧，乔治，你一开始说‘第一点’。我推断还存在第二点。那是什么？”

“一些我们不理解的事。有两只动物睡着了，怎么也醒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它们的身体变凉了。”

“乔治，管理得最好的动物园里也会发生这种事。”沃尔特·费伦说，“它们大概没什么问题，只是死了。”

“死了？那意味着停止。但没什么能让它们停止啊。每个都是独自待着的。”

沃尔特注视着赞星人。“乔治，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自然死亡是什么？”

“死亡是指一个生命被杀，不再存活。”

沃尔特·费伦眨了眨眼。“你几岁，乔治？”他问。

“十六——你不会知道那个词。相当于你们的星球要绕着太阳转大约七千圈。我还很年轻。”

沃尔特轻轻吹起口哨。“臂弯里的小孩。”他说。他用心思考了片刻。“你瞧，乔治，”他说，“对于你所在的这颗星球，有些事你要学习。这颗星球上有一个家伙徘徊着，而在你来自的地方没有那种家伙。那是一个留胡子、手持大镰刀和沙漏的老人。你们的振动杀不死他。”

“他是什么人？”

“我们叫他‘狰狞的收割者’，乔治。死神老人。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一直活到某人——死神老人令他们的生命停止为止。”

“他停止了两个生物？他会停止更多生物？”

沃尔特开口要回答，但又合上嘴。赞星人的声音里有些异样，假如他有一张像人类一样可辨识的脸庞，那么他的脸上会出现皱眉的忧虑表情。

“带我去看看这些醒不来的动物，怎么样？”沃尔特问，“那是否违反规矩？”

“走吧。”赞星人说。

那时是第二天的下午。次日早上，赞星人回来了，还来了好几个。他们开始搬出沃尔特·费伦的书籍和家具。等到搬完东西后，他们把他安置到别的房间。他发觉自己到了一百码之外的一间宽敞得多的房间。

他坐下等待起来。这次当门外响起敲门声时，他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于是文雅地站起身。一名赞星人打开门，站到一旁。一名女人走了进来。

沃尔特微微欠身。“我叫沃尔特·费伦。”他说，“以防乔治没有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乔治试图做到有礼貌，但他不懂得我们的所有规矩。”

女人的样子很镇定。他注意到这一点后很高兴。她说：“我叫格雷丝·埃文斯，费伦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何带我到这儿？”

女人说话时，沃尔特打量着她。她个子高挑，像他一样高，而且比例匀称。她看起来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和玛莎过世时的岁数差不多。她和玛莎一样冷静而自信，他总是喜欢玛莎的这一点，尽管这与他的随和自在形成反差。事实上，他觉得女人的模样很像玛莎。

“我想，我知道他们为何带你到这儿，但咱们先倒回去。”他说，“你知道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指他们杀害了所有地球人？”

“是的。请坐下说。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吗？”她坐进附近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不知道。”女人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办到的。这点无关紧要，对吧？”

“一点都不要紧。但这是我的推测——我跟他们中的一个说话，把其中的零散信息拼凑了起来——外星人的数量不是很多，反正在这儿的数量不多。我不知道在他们来自的地方，他们的数量有多么庞大。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个地方，但我猜那地方在太阳系之外。你看见过他们乘坐的太空飞船吗？”

“见过，大得像山一样。”

“差不多。你看，飞船上有一种装置能发射某种振动——他们用我们的语言称之为振动，

但我想它更像是一种无线电波，而不是声波振动——是它消灭了所有的动物。飞船本身是绝缘的，不受振动影响。我不知道它的覆盖范围是否大得足以瞬间消灭整个星球上的生命，还是说飞船环绕地球飞行，一路发出振动波。但它瞬间杀死了所有生物，我希望这个过程没有痛苦。我们和这家动物园里其他两百多只动物没有被杀死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飞船之内。我们已经被挑选为样本。你知道这儿是一家动物园，对吧？”

“我——我怀疑过。”

“前面的墙壁从外面看过来是透明的。赞星人相当擅长把每个房间的内部布置得像是房内生物的天然栖息地。这些房间——譬如我们所在的房间——是塑料制成的，他们有一种机器，能在大约十分钟内造出一个房间。假如地球有这样的机器和工艺，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住房短缺的问题了。好吧，反正现在也没有任何住房短缺。我想，人类——特别是你和我——可以不必担心核弹和下一次大战了。赞星人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许多问题。”

格雷丝·埃文斯淡淡一笑。“这就像手术成功，病人却死了。那时事情一团糟。你记得是怎么被抓到这儿的吗？我不记得了。某晚，我上床睡觉，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太空船上的一个笼子里。”

“我也不记得，”沃尔特说，“我的直觉是，他们首先使用低强度的振动波，刚好足够把我们所有人击昏。接着，他们四处巡行，或多或少随机地为动物园选取样本。他们抓捕到想要的样本——或是直至飞船空间容纳不下——之后，他们一直调高功率，结果就成了那样。直到昨天，他们才知道自己已经犯下大错，高估了我们。他们还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不死之身。”

“以为我们什么？”

“他们可以被杀死，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自然死亡。他们直到昨天才知道。昨天我们中有两个死了。”

“两个——哦！”

“是的，我们这些被关在他们的动物园里的动物死了两个。一条蛇，一只鸭子。两个物种无法挽回地灭绝了。反正依照赞星人计算时间的方式，每个物种剩下的成员只会生存几分钟而已。他们还以为自己拥有了永久的样本。”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意识到我们是短命的生物？”

“对的。”沃尔特说，“一名赞星人告诉我，他很年轻，只活了七千年。顺便提一句，他们是雌雄同体的，但他们大概每过一万年左右繁殖一次。当他们昨天获知我们地球上的动物有着多么短促的寿命后，他们心里大概震惊极了吧——假如他们有心的话。无论如何，他们决定要改造动物园——把两只动物养在一起，而不是一只单独关着。他们估摸着，如果不再一只只单独关着，而是两两待在一起，动物会活得更久些。”

“哦！”格雷丝·埃文斯站起身，脸上泛出淡淡红晕，“假如你认为——假如他们认为——”她转身朝向房门。

“房门锁上了。”沃尔特·费伦平静地说，“但不用担心。他们也许是那么认为的，但我不是。你甚至不需要告诉我，就算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你也不会要我。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不过是陈词滥调。”

“但他们会把我们一起锁在这个小房间里吗？”

“这间房没有那么小，我俩能凑合住下去。我可以相当舒服地睡在一把有厚垫子的椅子上。亲爱的，别认为我不完全赞同你。把所有个人顾虑搁置一边，我们能帮人类种族的最后一个忙是让它随着我们终结，而不是永远在一家动物园里展出。”

她小声说出谢谢，轻得几乎听不见，而红晕已从她的面颊上褪去。她的眼眸中充满愤怒，但沃尔特知道那并非是针对他的愤怒。她的眼睛那样闪烁时，看上去更像玛莎了，他这么想着。

他对她笑了笑，说：“否则——”

她从椅子上站起身，一瞬间，她以为他要过来掴他一巴掌。接着，她疲惫地重新坐下。“假如你是个男人，你该想些法子来——他们可以被杀死，你说过的吧？”她的嗓音透着苦涩。

“赞星人？哦，当然行。我一直在研究他们。他们的模样与我们截然不同，但我认为，他们有着和我们差不多的新陈代谢，相同类型的循环系统，大概还有相同类型的消化系统。我认为，任何会杀死我们人类的物质也会杀掉赞星人。”

“但你说过——”

“哦，当然有些差别。不管是什么因子导致人类的衰老，总之赞星人没有那些因子。要不然就是赞星人拥有某种人类没有的腺体，一些更新细胞的物质。”

她此刻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愤怒，急切地倾身向前，说：“我想是那样的。而且，我认为他们感觉不到疼痛。”

那是他希望的。他说：“但是什么让你这么觉得，亲爱的？”

“我在房间的桌子里发现了一条金属丝，于是把它横拉在门口，那么看管我的赞星人就会被它绊倒。他确实被绊倒了，而且金属丝割伤了他的腿。”

“他有没有流出红色的血液？”

“流了，但这看起来没惹恼他。他没有为此生气，甚至没有提及。当他在几小时后再次过来时，伤口不见了。呃，是几乎不见了。我能看出受伤的痕迹，足以确定是同一个赞星人。”
沃尔特·费伦缓缓点头。

“他当然不会生气。”他说，“他们没有情感。也许，假如我们杀掉一名赞星人，他们甚至不会惩罚我们。但这不会有任何好处。他们会通过一扇活板门给予我们食物，像人类对待动物园里一只杀害过饲养员的动物一样对待我们，以此确保动物再也不能伤害更多饲养员。”

“船上有多少赞星人？”她问。

“我想，这艘太空船上大约有两百个。但是，他们来自的地方无疑有更多赞星人。我有一种预感，这只是一支先锋部队，被派来清理这颗星球，让它能安全地供赞星人居住。”

“他们干得好——”

门外响起敲门声，沃尔特·费伦喊，“进来”。一名赞星人站在门口。

“好啊，乔治。”沃尔特说。

“好啊，沃尔特。”赞星人说。

“这也许是同一个赞星人，也许不是，但他总是用相同的方式打招呼。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沃尔特问。

“又有一只生物睡着，醒不过来了。是一只毛茸茸的小型动物，叫作鼬。”

沃尔特耸耸肩。“乔治，这种事时有发生。死神老人。我告诉过你死神的事。”

“更糟糕的是，一名赞星人死了。就在今天早上。”

“有那么糟吗？”沃尔特平静地看着他，“好吧，乔治，假如你要待在这儿，你得要适应这种事。”

赞星人一言不发，站在原地。最终沃尔特说：“怎么了？”

“对于那只鼬。你的建议一样吗？”

沃尔特再次耸肩。“大概不会有任何用。但是，为何不试试呢？”赞星人离开了。

沃尔特能听见外面赞星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咧嘴一笑，“这也许行得通，玛莎。”他说。

“玛——我名叫格雷丝，费伦先生。什么也许行得通？”

“我名叫沃尔特，格雷丝。你最好还是习惯这个名字。你知道的，格雷丝，你确实令我想起玛莎的许多事。玛莎是我的妻子，两年前过世了。”

“对不起，”格雷丝说，“但什么也许行得通？你在和赞星人说什么？”

“我们明天就会知道。”沃尔特说。然后她就无法从他口中再问出一个字。

那是赞星人待在地球的第四天。次日是最后一天。

一名赞星人过来时，差不多已是中午。在例行打过招呼后，他站在门口，看起来比以往更加奇异。为你描述他的模样会很有意思，但沃尔特找不到合适的字眼。

他说：“我们要走了。我们的理事会碰头，做出了决定。”

“你们中又有一个死了？”

“昨晚。这是一颗死亡的星球。”

沃尔特点点头。“你们做了一部分工作。在地球几十亿生物中，你们留下了 213 只存活的生物。别着急回去。”

“有什么我们能做的事？”

“是的。要快点做。你们可以把我们的房门打开，但不要打开其他房门的锁。我们会照顾好其他生物。”

房门响起咔嗒声，赞星人离去了。格雷丝·埃文斯站在一旁，眼睛闪亮，开口问：“什么——？
怎么——？”

“等一下，”沃尔特很谨慎，“先让我们听一下飞船升空的声音。我想要记住这个声音。”

几分钟不到，响声就传来了。沃尔特·费伦察觉到他一直保持着僵硬的姿势，此刻才在椅子上放松下来。

“伊甸园里也有一条蛇，格雷丝，它让人类陷入麻烦。”他轻声说，“但这条蛇将功补过了。我是指前天死去的那条蛇的配偶。那是一条响尾蛇。”

“你是说两名死去的赞星人是它杀死的？但是——”

沃尔特点点头。“他们在这儿就像走进丛林的宝宝。当他们带我去看第一批‘睡着了，怎么也醒不过来’的生物，我看到其中有一条响尾蛇。我心生一计，格雷丝。我心想，也许有毒生物是地球上特有的，赞星人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也许，他们的新陈代谢和我们的身

体很像，所以毒素也会要他们的命。不管怎样，尝试一下不会有什么代价。结果，两个‘也许’的假设都是正确的。”

“你如何让蛇——”

沃尔特·费伦咧嘴一笑。他说：“我告诉他们喜爱是怎么回事。他们一点都不懂。但我发现，他们对于让每个物种余下的样本尽可能久地活下去，在它们死去前研究外观、做出记录很有兴趣。我告诉赞星人，由于失去配偶，那些样本很快就会死去，除非它们经常获得爱抚。我向他们展示了如何抚摸鸭子。幸亏那是一只温顺的鸭子，我将它抱在胸前，抚摸了它一阵，展示给赞星人看。接着，我让他们用另一个样本——也就是响尾蛇——模仿看看。”

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更加舒适地坐下。

“好吧，我们有一个世界要规划，”他说，“我们得让动物们离开方舟，这需要思考，然后决定。对于食草的野生动物，我们可以直接放走。对于家畜，我们最好还是养起来，照看一下，我们会需要它们。但是食肉动物——呃，我们将不得不做出决定。但我恐怕得说，食肉动物该予以消灭。除非我们能找到外星人用来制造合成食物的机器，并且弄懂如何操作。”

他看着女人。“还有人类。我俩得对此做出决定。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

她的面庞又变得有些粉红，正如昨天那样。她僵硬地坐在椅子上。“不！”她说。

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声音。“人类是一个不错的种族，即便没人能赢得他们，”他说，“现在这个种族会从头来过，也许会稍稍倒退，直到恢复过来。但我们能为它搜集书籍，将大部分知识完整保存下来，反正重要的东西要留下来。我们可以——”

她起身走向房门，他的话音戛然而止。他心想，在他和玛莎结婚前，在他追求她的日子里，玛莎也会这样反应。

他说：“考虑一下，亲爱的，慢慢来。但记得回来。”

房门砰地关上了。他坐着等待，思考他一旦开始，就要做的各种事，不过不用急急忙忙地开始。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回来的女人踌躇的脚步声。

他微微一笑。瞧见了吗？这真的不恐怖。

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 独自坐在房内。门外响起敲门声……

* 原文“The last man on Earth”，英文中的 man 既可以泛指人类，又可以特指男人。布朗利用了这个词的双重含义，颠覆了最初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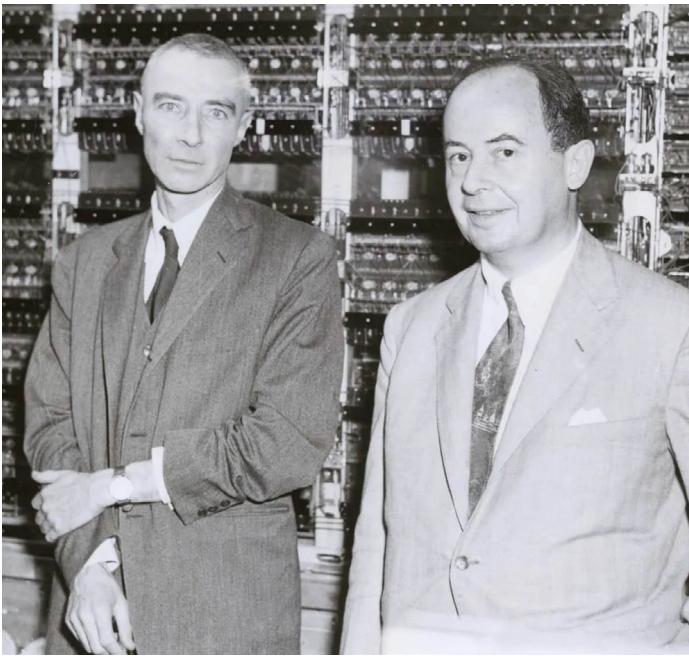


弗雷德里克·布朗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和推理小说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奖获得者，10 次获得雨果回归奖提名，4 次获得轨迹奖提名。代表作有《角斗场》《电兽》《多么疯狂的宇宙》《回家吧，火星人》等，多篇作品被《星际迷航》《希区柯克剧场》等知名影视剧改编。他是类型小说中叙事实验的开拓者，也是罗伯特·海因莱因、道格拉斯·亚当斯、斯蒂芬·金、尼尔·盖曼、菲利普·K. 迪克、星新一等科幻大师致敬的对象。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马里耶特·克韦希

门口的魔鬼

我骑着三轮车闯进他的生活时只有两岁半,当时他肯定,呃,不超过八岁。我是个富家子弟,不过话说回来他也是,所以这是我们的共同之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四分五裂之前,我在成长过程中见过他一两次,要提醒你的是,那场战争没有给他和我造成多少苦痛。我可以发誓,他把那段可怕的时光都用来在地图上移动想象中的步兵、坦克和炮兵阵地,利用从报纸收集的消息,在战争游戏的棋盘上重演索姆河战役无情的屠杀或者伊普尔战壕充满毒气的恐怖。他真心痴迷那种可怕的战争游戏。毫无意外,他总会获得胜利,因为数学计算决定了结果。这种战争推演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普鲁士军队采用,在世纪之初我们帝国知识分子中拥有大批拥趸,以致于我常常觉得,那些替代战争的无用模拟和导致中欧陷入武装冲突的疯狂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扬奇和弟弟们会身穿仿制的德国军服,用好几周时间紧盯棋盘,似乎对流血和战争的桌面微缩重现比整个大陆上演的真正屠杀更加重要。我羞于承认自己羡慕他们变得如此沉浸于想象的能力,因为我只是故意不去了解周围更大的世界,尽管知道这座大陆正处在战火之中,但是我作为一名在布达佩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正忙于享受这种身份带给我的快乐,无暇担心战局对自己的影响。没错,这很差劲,但是重要的战争没有在我们的国土上打响,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谷仓,战时物资短缺大幅抬升了谷物价格,富人其实变得更加富有。所以我们许多人表现得仿佛无事发生一样,我知道也许这看似令人震惊,可它早早就教会我一个简单的人间真理:你甚至可以跟来敲门的魔鬼舞蹈。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你怎么能责怪我们呢?我出身的匈牙利是一个正在经历美好时期的财阀国家,布达佩斯是欧洲发展最快的城市。我们有六百家咖啡厅、欧洲大陆的第一条地铁和一家媲美维也纳的歌剧院,我们周围的工业正爆炸式发展,可城市仍然充满春日紫罗兰的芬芳,我们无所不能,日新月异。科学新发现、农业生产新纪录、要购买的新产品、要穿戴的新时尚,新事物总是带来新的激情,所以我们只好投入其中,享受快乐,愉悦人生,伴着一场接一场的战争醉酒和起舞。否则还能怎么办呢?我们都曾为我们建立起来的奇妙世界行将终结,所以我们的消遣很迫切和必要。我们只是不得不享乐,否则也没有别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什么要降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就是知道,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犹太人和异教徒,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我们表现得像孩子,做孩子们最擅长的事情,假装一切正常,不停玩乐。世界可得照顾好自己了。

小说

理性的疯狂梦

本哈明·拉巴图特 | 新书推荐

在人工智能时代,
重新理解人类

1933年,纳粹当权德国,爱因斯坦的好友、奥地利物理学家保罗·埃伦费斯特在枪杀儿子后自杀;1957年,冯·诺依曼去世,他始创第一台现代计算机,确立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参与研制原子弹,出版《博弈论与经济行为》,预见了数字生活、自复制机器、人工智能和技术奇点的到来。2016年,韩国围棋圣手李世石对阵AlphaGo五局,仅惊险赢下一局,这一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

《理性的疯狂梦》是《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作者本哈明·拉巴图特长篇力作,高清还原数学家、博弈论学家、原子弹研发人、人工智能之父冯·诺依曼惊心动魄的一生,讲述人工智能的来龙去脉。

拉巴图特借书中人物之口讲道如果你知道自己会输,那么继续下残局就没意义了对吧?”今天,人工智能正处于让从程序员到卡车司机的每种职业都淘汰的风口浪尖,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不安。

经“99读书人”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的第二部分《约翰:理性的疯狂梦》分享给读者。



冯·诺依曼

作为高度同化的犹太裔高级资产阶级的成员,约翰尼一家兴旺发达,所生活的公寓占据了佩斯州核心区一栋公寓的整个顶层,就位于高雅的利波特瓦里住宅区的瓦齐大道上,奢华程度不逊于我家。我们两家都会在首都附近宽敞的山间别墅度过夏天,我们会乘坐浩荡的车队,带着女仆、管家、厨师、家庭教师、宠物和保姆,拖着塞满裙子、泳装、晚礼服和华丽服饰的行李箱和衣柜,以及足够在荒凉沙漠走上两周所需的食物和美酒,哪怕我们的应许之地距离城市里的公寓只有八公里远。不过我们俩早期生活的相似性差不多就到此为止:我是家中独女,他有两个弟弟;他母亲是一位消瘦的大烟枪,约翰尼一生都很爱她,我母亲是一位疑病症患者,哪怕我每次提高音量跟她讲话,她都会假装生病,卧

床数周；约翰尼的父亲很固执，但是既善良又热心助人，把我养大的父亲却是一个长期沉迷女色的瘾君子，暴力的男人，作为布达佩斯犹太人医院的负责人，总是忙于工作，我很少见他，我只要在宵禁后晚回家一分钟，他就会用外科医生的准确度扇我耳光，除此之外他一下都不会碰我。所以对于曾经的生活，或者跟约翰尼结婚带给我们的颇多快乐，我不会感到羞耻。我们前往美国之后，我为了一个年轻男人离开他，对此我也不会感到一丝愧疚。我们和平相处，甚至根据赋予我一定自由的协议，共享女儿玛丽娜的抚养权，保佑她幼小的灵魂：她小时候跟我一起生活，十六岁时搬去他那里。这是约翰尼的主意，我得提醒你，这对当时的任何女人来说，都不同寻常。这样的安排我觉得对孩子大有裨益——她成了一名天才经济学家以及通用汽车公司的第一位女性高管，她还担任总统顾问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管，负责过更多我不愿记住名字的委员会——哪怕这意味着她得忍受约翰尼的第二任妻子，那个疯女人克拉莉，以及她歇斯底里的爆发。我从来不是因为聪明才智爱上约翰尼，那是她的错误所在，我跟约翰尼结婚是因为他那个傻瓜让我开怀，我们一辈子互相渴望，即使这激怒了我们各自的配偶。可我无法跟那个男人维持婚姻，对，说的就是他，伟大的冯·诺依曼，多么了不起！科学技术之神！咨询顾问之王！计算机之父！逗我开怀。真希望他们像我一样了解他。那个男人不会系鞋带，废物一个，连婴儿都不如。我敢肯定，假如我把他留在家里几天，他会在炉灶前饿死，或许这正是直到他去世，我都一直格外关心和担忧他的原因。我甚至考虑过再婚后保留他的姓氏。约翰尼的父亲，了不起的老麦克斯，曾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经济领域杰出服务的名义授予过一个世袭头衔，以这种不太隐晦的方式感谢他捐钱资助匈牙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那项荣誉让他有资格在姓氏前加一个“冯”，我们来到普林斯度大学的时候，我丈夫尽管把亚诺什改成了约翰尼，但还是保留了那个姓氏，尽管他痛恨纳粹的怒火一直燃烧，但他喜欢跟德国的联系，因为那个“冯”字给他带来了餐厅和零售店的优质服务。哪怕约翰尼的大多数玩笑没法逗笑听众，他还是喜欢开自己的玩笑，其中有一个他总是讲起，早已经不再有趣：波兰的一个小村庄里流传着一个可怕的传闻，一个基督教女孩被人发现死于谋杀，担心很快会遭到报复的犹太人群体聚集在教堂，计划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保护自己，就在会议紧急召开的过程中，犹太教堂负责人激动地跑进来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兄弟们，他高喊，兄弟们，我得到了最绝妙的消息！被杀害的女孩——被杀害的女孩是犹太人！

短暂的童年相识之后，我们在年近三十的岁数再次相遇，当时他已经在德国功成名就。我无聊到了极点，迫不及待脱离父母，所以答应了他的求婚，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即将踏入怎样的生活。我父母要求像他们多年以前一样，他得在结婚前皈依天主教，就好像他们真的因此获得了幸福。我怒不可遏，不是因为在乎自己的犹太人出身，而是因为他们过于专横跋扈。约翰尼一点都不在乎，完全地世俗化，对于犹太人身份既不自豪也不羞耻。我可以发誓，他跟我们犹太人唯一真正的联系，在于貌似永不枯竭的意第绪语段子，他常常用在非犹太人身上，奚落讨厌的家伙或者他认为说蠢话的人，当然蠢话可以指很多种。他一直最喜欢的一句财损就是——窝囊废！



奥斯卡·摩根斯特恩与冯·诺依曼的合影

在外行看来这就是疯狂。

有人为冯·诺依曼的一个思想所形成的最疯狂应用创造了一个缩写MAD：相互保证毁灭，

它因此也得到了注解。美国就采用这种方法打冷战，用威力足以毁灭全世界的武器在行星尺度上开展一场胆小鬼博弈。相互保证毁灭是一种实施威慑和报复的原则，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只有囤积超大数量的核武器，确保任何核攻击都会彻底毁灭两国，才能避免核战争在超级大国之间打响。那是一种绝对理性的疯狂：用一触即发的末日之战来确保全球和平。这种荒唐堕落的信条持续了四十年，令我永远蒙羞的是，冯·诺依曼和我在《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中创立的概念被邪恶曲解后成为了那种信条的基础。

相互保证毁灭是人类可以为理性所困的众多范例之一，可它的缘起没有恶意，当时冯·诺依曼只是在牌局上又输给了好哥们斯坦·乌拉姆一手，还要再过好些年，原子弹才有了些许的可能。冯·诺依曼在普林斯顿的家中举行聚会，牌局就是聚会上的事儿：冯·诺依曼虚张声势也无济于事，很可能要用一个笑话分散对手的注意力，便问乌拉姆，虽然不是所有经纪人，但是在大多数都如此白痴的情况下，股市究竟是如何在现实中繁荣运转的。当时他正思考游戏，以及个体组成——不管是沿着巢穴泥塑甬道快爬的好斗火蚁、跨越大脑半球发出信号的神经元、还是站在交易所地板上互相争吵的傻瓜——即使没有完全不动脑筋，那也绝对不可靠，既然如此，那么复杂系统如何出现并维持运转。他一直对各种各样的游戏着迷，努力找寻方法概括人类在一套明确定义的规则下互动产生的众多摩擦和冲突。我也参加了那次聚会，那晚上的最后，只有少数几个人还能拼凑出有条理的完整句子，因为不喜欢饮酒，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乌拉姆赢走冯·诺依曼最后一块钱的时候，我走过去告诉冯·诺依曼，我偶然听到他对股市的看法。他正在通过往头上戴那个可笑的小玩意——一件儿童玩具，带有螺旋桨的小帽子，他通过上方的橡胶管吹动螺旋桨旋转，同时吹出哨音——来逗自己高兴，并试图以此掩饰自己输钱的沮丧，然后我们详细探讨了白痴、经济学和游戏。我们一边聊，一边渐渐转移到客厅的角落，奥本海默和魏格纳正在那里全神贯注地下象棋。我对冯·诺依曼说自己刚刚读过他在1928年发表的论文《休息室游戏理论》，我问，这篇论文对象棋这类游戏适用吗？他活泼地吹了一下螺旋桨，然后回答：“不不！象棋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形式明确的计算，你也许因为它的复杂性而无法算出正确的答案，不过在理论上，对于棋盘上任意给定位置和组合的棋子，都肯定会有一个解，最优的一种棋路最厉害的一步棋。而真正的游戏完全不同于此，现实生活中的游戏大相径庭。要在现实中获胜，你必须说谎和欺骗。我感兴趣的那类游戏包含仔细阐述的欺骗——甚至自我欺骗！——策略，所以你必须得不断问自己另一个人在想什么，你要怎么回应，他认为你下一步要干什么。这才是我的理论中游戏的内容。我没跟任何人告别就离开了聚会，整个周末都在工作。周一我径直走进他在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给他看了我写的论文草稿。他说文章太短，应该扩充。于是我按他的要求去做，几天后他又看了说还是太短，于是我回家按他的建议补充内容。当我把这个新版本的论文交给他，他快如闪电地读了一遍，然后说，“好吧，我们为什么不共同撰写一篇论文呢？”就好像他是为了我才要做那么做。

那是我已知的强度最大的一份工作，我们每天早餐时见面，如果他晚上有空，我们会工作到夜里。他不是个坐下来思考的家伙，而是在一直琢磨，以便想法在他头脑里准备好了，会喷薄而出。他会毫无一失地口述精心构想的句子，没有一丝一毫犹豫，绝对不犯错误。我需要时间集中精神，需要时间思考，可他能够在任何地方工作——甚至更喜欢噪音，所以他愿意待在拥挤的火车站和机场，喜欢在飞机和轮船上工作，在高档酒店大堂等待侍者给他送饮料都能拾起之前放下的思路。我根本跟不上节奏，这个项目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私人生活。我变得更瘦，疏远了朋友、家人和同事，一度因为精疲力竭而感到非常难受。我因为发烧而意识模糊，还做噩梦梦见他像独眼巨人高高屹立在我头顶之上，玩弄着玩具飞机和坦克，把军队整个吞掉，一只巨大的眼睛凝视远方的地平线，眨都不眨一下。我承受了巨大的打击，但还是继续工作，因为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究竟有多疲惫。因为过于腼腆，我根本无法抱怨。跟他一起工作还会产生优越感，我敏锐地注意到我们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要制定游戏的规则，我们还尝试尽可能用最纯粹的数学，描述人类如何做出决策，捕捉他们难以揣测的动机，仔细审视他们参与的众多秘密游戏，不管是在心灵的内在领域还是在外面的旷野、社会的荒原。我们工作所覆盖的范围无边无界：可以是普通的日常事务——比如一个人如何商量工作加薪——或者是塑造国家间交战方式的关键决策。

我在冯·诺依曼家度过了很长时间，甚至就是在他家客厅里追到我后来的妻子多萝西，因为我要围绕冯·诺依曼紧张的日程组织自己整日的工作。克拉莉很烦我在她家久待，甚至对冯·诺依曼和我下了最奇葩的最后通牒：她说她干脆不让冯·诺依曼做跟博弈论有关的其他任何事情，除非其中包含一只大象。我知道她对那种特别的厚皮动物有着不同寻常的迷信——房子里摆了数不清的大象——冯·诺依曼我相信她会坚决坚持自己的要求，所以我们没有选择，立即引入了大象：你可以在我们著作的第六十四页看见它的象鼻子，隐藏在

一幅图表的线条间。我们用了好几年才写完那本书，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威胁要取消整个项目时才交稿，它超过七百页，满是密密麻麻的方程，以致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发给我一篇文章，它把我们的书描述为“二十世纪世纪所有经济学论著中读者最少、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不过那本书也提供了全新且独特的内容：经济学的数学基础。我感觉自己仿佛摸到了圣杯，余生再也没有取得过能与之相媲美的成就，不过我当然只能为自己代言，因为对于约翰尼而言，那只是另一项工作，是他载誉一生的另一项成就罢了。我们理论的核心是他对所谓极小极大定理的证明：冯·诺依曼用数学证明了，双人游戏中双方利益直接冲突的情况下隐藏的陷阱也就在于此总有一种理性的行为导向我们拓展了那个证明，提出方程分析利益交叠的多玩家游戏，最终创建了几乎涵盖所有类型人类冲突的理论框架。我们本打算把我们的书只用于经济学领域，然而没有人比战争的主宰者更快更疯狂地喜欢上它。

对于军事战略家来说，博弈论如同天赐的礼物，因为我们的工作似乎提出了一种交战和取胜的理性方法。这令绝对不是和平主义者约翰尼感到高兴，全世界第一家“智库”兰德公司呼吁他为我们的理论寻找军事应用时，他很快给出了答案。兰德公司的那些恶魔尊崇约翰尼，把博弈论用作现代的神谕，约翰尼仿佛一位喋喋不休的古代女先知，沉浸于出神的状态，主导着这一理论。首批公开主张用原子弹突袭苏联的人就有他一个，这不是因为他讨厌共产主义者（不过，他确实讨厌），而是因为他深信只有那样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理论——或者说至少他对其的解释——的确支持他的看法。“如果说为什么等明天轰炸他们，我说为什么不在今天呢？如果说今天五点轰炸，我说为什么不在一点呢？”这是约翰尼对《生活》杂志的表述，可是他在骇人的轻松说辞背后深深相信，和平需要我们在苏联自主开发出原子弹之前，大量投放原子弹炸毁他们。一旦核辐射物消散，数百万逝者被清点记录，他展望的未来就会拥有持久的美式和平，用有史以来最高的代价换取一段不同以往的稳定时期。我发现他冷酷的理性成了噩梦的来源，可是约翰尼完全不这样看：如果你使用博弈论的模型按照逻辑来看待它，他说，首先实施核打击不仅是最优解，它还是唯一最符合逻辑的决策。可是在1949年，广岛和长崎被毁灭仅仅四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苏联研制出原子弹，到1953年，他们已经拥有超过四百颗核弹头，也就是说美国的任何核打击都会遭到核报复，约翰尼的思想，或者说他思想的某个形态，开始支配冷战中的恐怖平衡。面对无法解决的困局，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兰德公司和其他众多组织机构开始根据我们的理论推演复杂度提高的战争方案。可是我们的方程——应用于诸如打扑克之类的娱乐行为时非常清晰明确——跟核武器时代的斗争和政治纠缠在一起，便诞生出一座不可逃脱且难以想象的迷宫，引发了西方民主国家和铁幕封锁国家的核武器竞赛，这种愚蠢的行为几乎是冷酷地引导他们走向相互保证毁灭的狂热僵局，任何侵犯都自然会受到被侵犯一方的全力核打击，导致所有参与者被彻底毁灭。相互保证毁灭要求远程轰炸机搭载核武器全天候环球巡航，全年不降落，这些飞机通过一个巨大的网络跟满载核弹头在水底巡航的潜艇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在深入地下的发射井和坚固掩体中，数千颗——三十分钟内就可以从华盛顿飞抵莫斯科的——洲际弹道导弹耐心地等待着末日号角被吹响。哪怕在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危险的平衡，这种恐怖的游戏，从没有真正地终止。太多的这种武器仍然存在于世，等待时机，受到过时且有缺陷的操控机制监管，像保存在钢铁棺材里的古代法老的陈年尸体，时刻准备着，等待以死亡开始的新生。把这全都考虑在内，难怪约翰尼确信，人类不会在工业社会的众多奇迹中生还，不过我敢肯定，如果他还活着，他会放心地发现自己做过的恐怖噩梦没有成为现实，我们的博弈论在政治温室之外的远方竞相开放，应用于计算机科学、生态学、哲学和生物学，我们的方程在生物学领域建立了癌细胞生长、扩散和沟通的模型，我们的一些术语甚至渗透到日常用语，人们把社交生活的众多方面都描述成“零和游戏”。这恰恰说明预言思想和发现的后果和应用几乎不太可能，说明我们亲身参与的真实经历为何如此难以正确评判。很多人仍然相信相互保证毁灭帮助预防了冷战转化为热战。可是对我来说，它仍然罪孽深重、难以原谅，时刻提醒我自己，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哪怕追求中立，但它们从来都达不到中立。因为我不由自主地意识到，证明了我们论著核心定理的约翰尼极度悲观，他眼中人类的前景凄凉且悲惨，所以他的心态不经意间用自身的阴暗色调玷污了支撑我们思想的方程。我自己也在病态的绝望中备受煎熬，即使到了现在，跟冯·诺依曼共事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我发现自己还在质疑我们的核心信条：每种情况下都真的有一个合理的行为方向吗？约翰尼用数学证明了这毫无疑问，可只适用于目标截然相反的两个玩家。所以我们的论证也许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任何敏锐的观察者一下子就会觉察出来，也就是构成我们整个框架基础的最小最大定理预设了绝对理性和逻辑至上的行为主体，他们只着眼于胜利，展现对规则的充分理解和对自己过往行为的全面

记忆，还会在游戏的每一步中，充分认清自己和对方行为的潜在后果。我见过的与此完全相符的人只有约翰尼·冯·诺依曼，正常人完全不是那样。对，他们说谎、欺骗、误导、暗自谋划，但他们也互相合作，为对方奉献自己，或者随心所欲地决策。男男女女凭借本能行动，他们听从直觉，犯下不经意的错误。生活远大于一场游戏，它丰富多彩、纷繁复杂，无论多漂亮或者多么精妙的平衡都无法用方程来阐释。而且人类不是我们想象中完美的扑克玩家，他们可能极度缺乏理性，受自己的感情驱使和动摇，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矛盾。虽然这引发了我们在周遭所见的难以遏制的混乱，但它也是一种幸运，仿佛一位怪天使保护我们免受理性的疯狂梦想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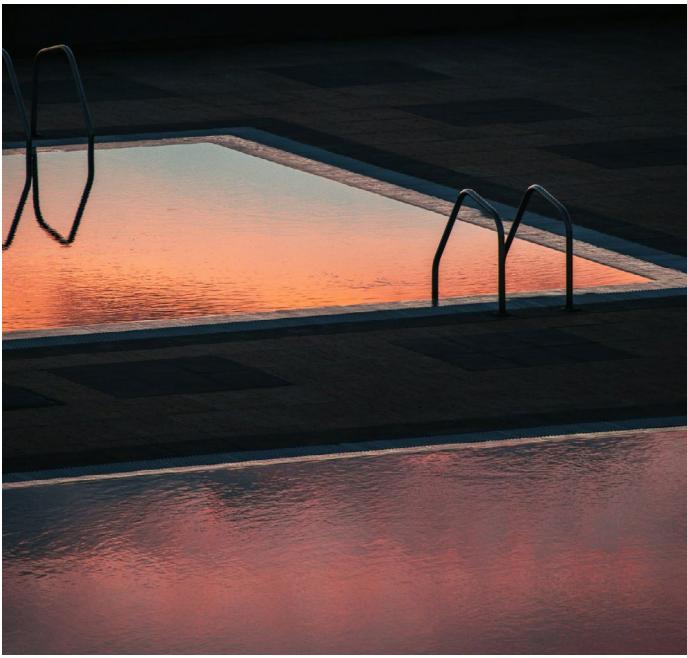


本哈明·拉巴图特

智利作家，1980年生于荷兰鹿特丹。2010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南极洲从这里开始》。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光之后》（2016）和第三部小说集《可怕的绿》（2020）以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史瓦西等科学史上重要人物为主人公，用虚实相间的笔法写出他们人生中的惊心动魄与黑暗时刻，被爱尔兰著名作家约翰·班维尔称为“非虚构小说”。《可怕的绿》入围2021年国际布克奖决选名单。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César Couto](#) on Unsplash

小说

氯水人鱼

宋玉 | 新书推荐

东亚之女的惨烈成长，
刮骨化尾的奇诡物语。

人类女孩王·余的每一日始于泳池，终于泳池。如果她游得足够好，足够快，许诺她的美好一切就会出现——名牌大学的录取、父母的宠爱、教练的倚重、光明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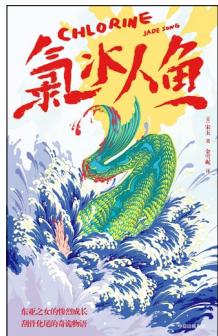
他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他们说：痛，就是软弱正在离开身体。

期待的重量、成长的残暴、生而为女的困境种种加之于她身。无处不痛，无时无刻不痛。她只能潜入泳池中逃离。身体触及氯水的刹那，裙摆变成鱼尾，皮肤化作鱼鳞。

《氯水人鱼》是美籍华裔作家宋玉生猛首作，绚丽与恐怖相融，以人鱼为引，叩问生而为女的苦痛与血腥——“人鱼不是天生的。我们是被造就的。”女性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

以下经“中信·无界”授权，节选自本书。



“好了！放进去了，我觉得是进去了。”我直起身，双臂像十字一样展开，撑着厕所隔间墙壁站起来。我扭动臀膀，想试试看能不能感觉到体内的棉条。

“我手上全是你的血。”她说。她戳了戳我的上臂，留下一个水红色的点。

我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很快她也笑了起来。她笑起来的声音很低沉，仿佛肚子都要炸了。我的手从墙壁上移开，去掐自己的侧腰，在隔板上留下一串血手印。这饱含荷尔蒙罪证的犯罪现场令我们俩都笑得更猖狂了。

“幕后红‘手’，当场抓获。”我喘着气说。

“闭嘴。佩裏洛普怎么样了？她开心了吗？”

“她说她很开心！”我边咳边说，笑得太厉害以至于无法呼吸，被自己的口水呛住了。

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在更衣室响起，宣布女子 200 码自由泳比赛开始。我清了清嗓子，欢乐的笑声顿时随着近在咫尺的比赛而消散。我轻轻抚摸佩裏洛普。我用手背擦了擦嘴，尝到了血味。

“好了，咱们走吧。你能帮我把泳装提起来吗？”我问。

凯茜点点头，一只手捂住嘴，试图堵住笑声。我把泳装

拉过胸部，挑起眉毛望着她，等待着。她靠近了我——再一次——提起左边的带子，然后是右边的，绕过胳膊，箍住肩膀，调整位置，直到它们正好落在三角肌上。皮肤被氨纶纤维面料勒得泛白。泳装很紧。一切完美。

我走到洗手池边，用肥皂清洗小臂。血水顺着排水道流下，把白瓷染成红色。

“你也该洗洗手。”我望向镜子中的她。她站在我身后，凝视着打开的手掌。她没有理我，而是专注地看着手指和掌中的血迹，仿佛入迷。

“谢谢你帮我忙。”我轻轻地说话。我的声音太小了，因此我并不确定凯茜能否听得见。毕竟外面依然隐隐传来比赛的喧嚣：人群的絮语、泳者的叽叽喳喳、教练尖锐的哨声。我们笑过之后，声音好像在同一刻涌回到更衣室中，仿佛我们之前共度的那一刻实在太过于庄严肃穆，实在不宜被琐碎的杂音打扰。

“我们走吧。”我大步离去，把几缕杂乱的碎发塞进泳帽里，边走边活动着肌肉，双臂在头顶呈流线型，腿交替弯曲踢臀，拉伸大腿股四头肌。我在厕所隔间里得到的热身已经足够了。我回归了竞技状态。

我前面那组选手已经游到了最后一圈。只要再晚一点，我就会错过比赛。我们一起走到我的泳道前。我走过去之前，她抬起手与我击掌。

“祝你好运。”她说。

她的手掌依然是猩红的。她没有洗手。我的血和她的皮肤融在一起。

人体生物钟逼得我不得不蜷缩在热水瓶旁，而不是游泳浴巾里。一般来月经的时候，我依然会努力不缺席训练，但有些时候疼痛感实在是太剧烈了，就连我都难以忍受。当我终于对吉姆承认，有时候月经期间我只能钻进被窝而不是泳池，他拥抱了我，对我说我长大了他多肉的大手揉捏我的臀膀检查那里的脂肪是否已经悄然增长起来。吉姆开玩笑道，作为教练，他很生气胸臀会减缓我在水中的速度，但作为男人，他迫不及待地渴望着胸臀能为他带来的视觉享受。他对我眨眨眼，再次提醒我，他曾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蛙泳明星。他为我的流血而感到骄傲。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我的月经持续了下去——循环不可避免。然而，每个月我都依然会因为那种暴烈的疼痛而震惊，仿佛我在拒绝相信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信任多年的东西，竟然还会反复地背叛我？胃从内部吞食着自体，我被迫加入这场狂欢，尽管我一点饿感都没有。持续四天至六天的盛宴，主食是胃痉挛，大快朵颐，碎屑从我体内淅沥漏出，拌满嫣红树莓酱。我的胃从来不是精细干净的食客，它啮咬我的子宫和输卵管，留下细密齿痕。我焦躁不安地数着太阳的每一次循环转动，直至月经结束，我又重启计时器。刀把内脏搅成炖肉，叉子刺入侧腰拔出化作奶酪孔。我连每一次叉刺都能精准分辨——那痛感太尖锐、太刺骨。我的肚肠如意大利面围着叉子盘绕成团，交缠的面条饱蘸猩红的面酱。相比起甜甜的水果泥，月经更像碾碎的汁水淋漓的酸番茄。我在宛如餐巾般的白牛仔裤上面擦擦手，留下铁锈红的线痕。漂白剂和洗衣液可以洗掉污渍。每个月我死掉然后复生。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描述这份经历？最合理的解释只有死亡。我决定，当我的尸体被推进停尸房的时候，验尸官将宣布我死于身为女人。这可比死于身为男人要好多了。

每一天我都在想，为什么人鱼不会来月经。我的人鱼书里没提过一次痛经。我好忌妒她们。我渴望能摆脱子宫的控制。

我第一次来月经的那个周末，那次比赛，我的成绩并不好。我太累了，太不适应血流从身体里涌出的感觉。吉姆后续的惩罚导致我的肌肉好几天都酸痛肿胀。但那次比赛确实带给了我一样美好的东西。

我终于有朋友了。

在凯茜用一根湿透的卫生棉条帮我“打飞机”之前，我俩只是普通熟人。我之所以会把她拖进厕所隔间，不仅因为她占尽天时地利，还因为她是所有队友中看上去最友好的一个。尽管我们做队友的时间不长，我已经看出她不是那种敢于果断拒绝的人。

或许我是出于绝望才主动拉住她的，但那次比赛后，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毕竟，你要如何做到把手伸进血淋淋的阴道，而不爱上阴道的主人呢？

人类是神话中导致衰败的原因。无论是被人类夷平了家园、伤透了心，还是信任被人类背弃，神奇生物总会在遇见人类之后变得更加糟糕。我读过无数的故事，无一不在描写人鱼被强行拖出海洋，人鱼被迫与人类男性结婚，人鱼喉咙失声。祖先的教诲告诫我，要在人类的示好面前紧锁心扉，保护自己。

但我太孤独了。

回想起来，我觉得凯茜也很孤独。在“染血棉条”事件后，她极力想要与我交朋友。我们俩都是队里的异类。作为泳者来说，她太臃肿，也太慢。尽管我一直觉得她很美，但人类青少年的审美标准是不可撼动的，尤其是对于运动员而言。凯茜没办法达到他们的期望。

凯茜是那种会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游戏王》中“青眼白龙”怪兽卡牌的蓝眼白人女孩。最终我明白了，“青眼白龙”也不过是一种建构，正如蓝眼和白肤一样：一张薄薄的卡纸，其价值纯粹由某种神秘的至高力量赋予。我可以上网购买一百万张“青眼白龙”卡牌，同样我也可以沿着郊区的街道一直往前走，蓝眼白人女孩多到十美分一打。

现在十美分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了。怪通货膨胀吧。

我确实欣赏凯茜的人生态度。她不被任何人的期望束缚。她每天游游泳，吃吃东西，然后回家，晚上心情好的话，就做做作业。除了唾手可得的快乐之外，她什么都不在乎。她的人生如此简单。她有正常的父母，晚上共睡一床。她有一个住在美国的祖母，会操办感恩节聚餐，给她烤热乎乎的巧克力豆饼干。她的日常生活因平淡而在我眼中显得精彩。

因为我享受观看她那“纯美式”人生的盛大表演，也因为我太孤独了，我准予她成为我的朋友。

~~~

“我该选菲·王的哪首歌？”我在 iPod 上滑上滑下。我和凯茜裹着浴巾，并排坐在泳池旁的看台上。上午的最后一场比赛正在进行。我是当天晚上 100 码蝶泳比赛的头号种子选手。我得在预赛结束之前告诉裁判该播放哪首背景音乐。头号种子负责为比赛终轮选出 30 秒的出场音乐。这是最快泳者的特权。

“谁？”

“菲·王。”

“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听见了。她是谁？”

我本来在看 iPod，此时震惊地抬起头：“你从来没听说过菲·王？”

凯茜摇了摇头。

“王菲？”我问道。我一边说出她的中文名字，一边在心里暗暗尴尬——如果凯茜连王菲的英文名字发音都不知道，她显然也不可能知道她的中文真名。每次我和母亲一起看《重庆森林》，她都提醒我要喊中文名字。

凯茜又摇了摇头：“她的歌好听吗？”

“好听！我和我妈都很喜欢她。我在想，出场音乐要不要播放她的《胡思乱想》。”

“你说什么？胡一塞一隆？你刚刚是打喷嚏了吗？保佑你啊。”

受伤之下，我摇了摇头，给她看我的 iPod 屏幕：“不，那是一首歌的名字。中文歌。我最喜欢的王菲歌曲之一。”

凯茜从我手中接过 iPod，狐疑地观察着专辑封面：“我觉得这里没有人听过中文歌，更别提这首歌了。”

“可我听过啊，”我恼火道，“如果我妈也来看比赛，那她也听过的。”

“那又怎样？你妈没在这里。即便你游得最快，也不代表你能选一首怪怪的歌。”她从背后的帆布包里掏出自己的 iPod，“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选项。”她招手示意我过来。

我挪动屁股靠近她，裹紧身体的浴巾丝滑掠过金属的看台座椅。我们的大腿挨在一起。

“好了，给你一个选择。”她将一只荧光粉色的骷髅头牌耳机塞进我的左耳，自己戴上右耳的那只。她按下播放键的时候不禁跟着节奏摇头晃脑。

钢琴砰砰作响，高音后是低沉的和弦。

一个小镇女孩，在孤独的世界里徘徊

我扯下耳机，卡在耳道里的水随着这个动作而发出叽叽声。我问道：“这种歌词本意是要鼓舞人心吗？”

“对！这首歌是经典金曲，《一定要相信》（Don't Stop Believin'）。”她说。

“一定要相信什么玩意？好吧，我觉得我也是个小镇女孩，但我不想生活在孤独的世界里，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这些话是要怎么在比赛之前给我加油打气？”

“不是的，傻瓜，这首歌的重点在于那段钢琴逐步营造紧张感的过程，就像在增加你赛前的期望值一样。”她说。

“我觉得这没用。”

“开头，还有和弦——你不觉得兴奋吗？”

我用手指点了点下巴。这首歌比不上任何一首王菲的歌那样让我印象深刻：“还有别的推荐吗？”

凯茜滑到播放列表底部给我看：“这首。”我又把耳机塞了回去。

诡异的合成音，低沉的电吉他，铙钹。

呜哇呜哇呜哇呜哇……

我再度拔出耳机。“这个人是在唱歌吗？”我问，“呜哇呜哇呜哇？”

凯茜停掉音乐，把 iPod 塞回帆布包里。她吸了一下鼻子。“《活在祈祷中》（Livin'on a Prayer），邦乔维的歌？这首也很经典。”她用浴巾擦了擦鼻子，“相信我，你从这两首中选一首准没错。如果你去播放你那首怪歌，别人肯定会嘲笑你。”

她的话有道理。我把头埋在臂弯里，靠在膝盖上。

“这两首歌我都还没听过，又不是我的错。”我辩解道，我的声音微弱，像个闹脾气的小孩。我的父母比起英文来更喜欢中文，我怎么可能听过这些歌？我爸爸喜欢邓丽君，电视上面的架子摆满了一张张她的淡粉色 CD。他回到中国重建他的软件生意之前，在地下室工作的时候，总爱播放她柔和轻颤的歌声。我深深铭记了她的音调，靠她的歌声来学习中文。我学会怎么说“你好”和“谢谢”之前，已经先学会了怎么说“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很喜欢邓丽君的音乐，但和母亲一样，我的心始终追随王菲。母亲和我一致认为王菲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把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算上，我们俩谁都没见过任何其他人拥有如此空灵的容颜。王菲就是酷的典范。我才不在乎那些印了 Abercrombie 品牌标志的 T 恤、奶昔和电子宠物蛋。当我脑子里没有想着人鱼和游泳的时候，我想的就是王菲。母亲接送我去训练的时候会播放她的 CD，王菲轻柔的歌声陪伴着我们的旅程。当我回忆起训练后回家路上肌肉乳酸逐渐冷却的过程，我就会听见王菲缓慢而缠绵的怀旧之歌。

王菲同样是我们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每周五晚上游泳训练之后，我都会和母亲一起看《重庆森林》。母亲一边看电影，一边缝制桌布、笔袋、枕套——任何以她的缝纫技术能用布料和丝线做出来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省点钱了。我在她身边心不在焉地做着作业，偶尔晃晃头，让风吹干头发。每当林青霞穿着性感的风衣，戴着金色假发，将一发子弹射进那个恶心的白人男性头部时（在此如此绝美的亚洲电影作品里，白男怎么胆敢出镜的？），或是梁朝伟把周嘉玲压在衣柜上，用一架玩具飞机仔细勾勒她后背的曲线时，母亲都会起身遮住我的眼睛。尽管她试图保护我，我依然看懂了荧幕上的暴力与性爱，就好像小孩子能理解父母语气中细微的起伏一样。我如痴如醉地反复看这部电影，听着《梦中人》摇头晃脑。我不是为长着古典英俊面庞的梁朝伟或是性感到令人窒息的金城武而看，而是为了王菲。王菲，飒爽的男孩式短发，镜片小小圆圆的墨镜，黄色的 POLO 衫，扛着一筐胡萝卜和洋葱穿过尘土飞扬的户外市场。王菲，斜倚在外带柜台上，一手托腮，做着逃离的梦。我从《重庆森林》中感悟出人类悲哀之荒谬，又在金城武对着电话喃喃自语“爱你一万年”的语音密码只为倾听那并不存在的留言时学到，一万年是一段很漫长、很孤单的时光。

而凯茜却要我播放这种毫无意义的杂音？

“反正两个选项你都听过了。你总得有一首喜欢的吧？”

凯茜推推我去嘛，去跟裁判说，告诉他们歌名就行了，不用说歌手的名字，他们都超有名的。”

“行吧。我选第一首。叫什么来着？《一定要相信》？”我跌跌撞撞地从看台上站起身，把浴巾裹得更紧了。我打了个寒战。

“对，没错。”凯茜说。

~ ~ ~

我是第六个在决赛中选择《一定要相信》的人。我之前的每一场比赛，以及我之后的每一场比赛，响起的前奏音乐要么是“小镇女孩”，要么是吵闹而蠢得要死的“呜哇呜哇呜哇”。

那场比赛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听过王菲的歌。我对她的爱变成了很私人的事情，只在家戴着耳机或者在车里播放 CD 的时候抒发。我明白了，所谓“合群”不是要变得出类拔萃，而是要和其他人一模一样，无论你自己真实的品位是什么样的。为了凯茜也为了我自己，我把美国体育界背景音乐中少数几首可以接受的歌曲牢记在心——全都是英文歌。旅程乐队、邦乔维、埃米纳姆。M&M——用糖果为自己命名的歌手，还能再美国一点吗？还有什么比“活在也仅仅活在祈祷中”更能代表美国吗？

最近这些天，有时候住在我隔壁珊瑚礁的海上邻居开派对的时候，也会大声播放邦乔维和旅程乐队的歌。播放人类音乐作为消遣，满足了他们掌控等级森严的动物王国的欲望。他们欢庆的时候，我就离开我的住所，因为我无法忍受他们听的音乐。我浮上水面，躺在岩石上晒太阳，尾巴一甩一甩，心里想着我现在是多么幸福。多么自由。

如今，我对生活唯一的不满，就是还没开发出可在水下观看《重庆森林》的方法。



宋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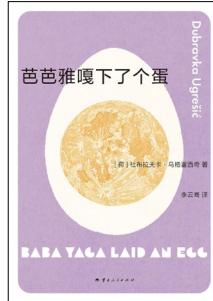
美籍华裔作家、艺术总监和艺术家，现居美国纽约。她的首部长篇小说《氯水人鱼》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并将被翻译成法文。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Baba Yaga* by Natasha Ilincic



母亲的窗前绿荫如盖，树梢上挤满了鸟儿

夏天的新萨格勒布街区空气中鸟粪的味道我母亲就住在这里她公寓大楼前的树上，树叶间挤满了成千上万只鸟儿。是椋鸟，人们说。湿热的午后，雨水将至，这些鸟尤其喧闹。不时有邻居会拿出气枪乱射一通，将它们赶走。密密麻麻的鸟儿成群结队地飞向高空，呈“之”字形上下翻飞，活像是在梳理天空的发丝。随后，伴着一阵歇斯底里的锐鸣，它们扎进茂密的绿叶间，如同一场夏天的雹暴。这里像雨林里一样吵，从早到晚都罩在一道声音做的帘幕里，仿佛外面有雨一直在敲。轻盈的羽毛乘着气流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妈妈拿出掸子，把羽毛扫起来，倒进垃圾桶，嘴上还念念有词。

“我的斑鸠不见了，”她叹了口气，“你还记得我的斑鸠吗？”

“记得。”我说。

我隐约记起她十分喜爱飞来她窗台的两只斑鸠。她讨厌鸽子。清晨，它们低沉的咕咕声令她非常恼火。

“那些讨厌得不能再讨厌的肥鸟！”她说，“你发现了吗，就连它们都不见了？”

“谁们？”

“鸽子！”

我没有发现，但的确，鸽子似乎都已经逃走了。

椋鸟让她心烦意乱，特别是夏天那股臭味，但她最后也习惯了。因为比起别人家，她的阳台至少是干净的。她指给我看阳台栏杆尽头的一小块污渍。

“在我的阳台上，只有这里会脏。看看柳比奇卡家的阳台吧！”

“看什么？”

“到处都结着鸟屎！”妈妈说，笑得像个小孩。小孩子的话语症，她显然是被屎这个字逗笑了。她十岁的孙子听到这个字也咧嘴笑了。

“像是在雨林里。”我说。

“确实像在雨林里。”她赞同。

“虽然现在到处都是雨林。”我说。

鸟群明显失控了，它们占领了整个城市，占据了公园、街道、灌木丛、长椅、露天餐厅、地铁站和火车站。似乎没有人发现这场入侵。喜鹊正在占领欧洲城市，据说是从俄罗斯飞来的，城市公园里的树枝都被它们压弯了。鸽子、海鸥和椋鸟飞掠过天空。笨重的黑乌鸦，喙张得像晾衣夹，一瘸一拐走在绿色的城市草坪上。绿色长尾鹦鹉逃出家庭鸟笼，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园里大量繁衍：成群的鹦鹉低低飞过，像碧色纸龙一般染绿了整片天空。阿姆斯特丹的河道则被大白鹅占领了，它们从埃及飞来，盘桓休息了一会儿，便留下了。麻雀已经胆大到直接从人们的手中夺走三明治，还要在露天咖啡馆的桌子上厚颜无耻地迈着大步走来走去。我家所在的柏林达勒姆区是柏林最美丽、最绿意盎然的街区之一，短租公寓的窗户已成为附近鸟儿最爱的粪便存放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放下百叶窗、拉上窗帘，就只能每天辛苦擦洗被溅花的窗户。

她点点头，但好像完全没有在听。

该地区的椋鸟入侵大致始于三年前妈妈刚病倒的时候。医生诊断书上的语句冗长骇人，而且丑陋（那真是一份丑陋的诊断），所以她才会选择用病倒这个词（我病倒之后，一切都变了！）。比较勇敢的时候，她也会用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额头，说：

“都怪我这里的蜘蛛网。”

她说的蜘蛛网是脑转移瘤，发生在她的乳腺癌被及时发现并成功治愈的十七年后。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历经一系列放疗，终于渐渐康复。后来她定期去复查，其他方面多少都还算正常，自那以后并无大事发生。蜘蛛网潜伏在大脑中一个难以触及的阴暗角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后来，她与之和解了，习惯并接受了它，就像接受了一位不受欢迎的房客。

在过去的三年里，她的人生故事被压缩成一小沓出院单、医学报告、放射学图表，外加

## 小说

# 芭芭雅嘎下了个蛋

##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 新书推荐

古往今来的女性命运，  
应当由谁、如何来讲述？

芭芭雅嘎是女巫，但不属于女巫的团体；她既可以是善人，也可以是恶人；是母亲，也是杀死女儿的凶手；是女人，但没有、也从未有过丈夫；她伸出援手，也策划阴谋；被人类社会驱逐，也与人类沟通；是战士，但也操持家务；是“死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她会飞，但同时也被束缚在地面上；她只是个“偶然出现的人物”，却也是主人公通往幸福之旅的关键一站：“礼貌的”和“粗鲁的”主人公在她的小屋前驻足，他们吃饱喝足，舒服地洗个澡，听取她的建议，带走她送的魔法礼物，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翻译成更现代的语言，她是异见者、流放者、失败者、隐居者、老处女、丑八怪。她的形象依赖于口述传统，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也是一面集体的镜子。她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好的时代，那时她还是金色芭芭、大地之母。后来，她成了被驱逐的稻草人，但依然用诡计统治着人们。如今，她缩在小屋中煎熬时日，像子宫中的胚胎，或棺材里的尸身。

没有一个人带着花和巧克力，再次敲响她的门。

在杜布拉夫卡的笔下，芭芭雅嘎是斯拉夫故事中被刻板化、压抑和丑化的女性角色，她分析芭芭雅嘎们的设定和命运，解构她们身上的文化附着物，并进一步将其引申为每一位活生生的女性。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节选了《芭芭雅嘎下了个蛋》第一部分，分享给读者。

一堆脑部核磁共振和 CT 报告。扫描图像上能看到她轻微前倾的脊椎，上面连着可爱匀称的头骨，还有面部清晰的轮廓，熟睡一般低垂的眼睑，奇异的帽子般展覆的脑膜，以及浮在她唇边的一抹隐约的微笑。

“这张让人觉得我脑子里像是在下雪。”她指着 CT 影像说。

窗下的树，绿荫如盖，高大葱茏，一直长到与妈妈六楼的公寓齐平。成千上万的鸟儿在叶片间攒动。依偎在夏日炎热的黑暗里，我们，居民和鸟儿，呼出的气息在空中蒸发。不计其数的心脏，人类的和鸟类的，在黑夜中以不同的节律跳动。发白的羽毛乘着阵阵气流飘进敞开的窗户，像降落伞一样飘向地面。

我的词都散了

“把那个什么递给我……”

“什么？”

“那个涂在面包上的。”

“人造黄油？”

“不是。”

“黄油？”

“你明知道我好多年不吃黄油了！”

“那到底是什么？”

她皱起眉头，因自己的无能而越来越恼怒，因此她立刻狡猾地切换到攻击模式。

“什么样的女儿会不记得抹在面包上的东西叫什么！”

“抹？奶酪酱？”

“就是它，白色的那种。”她气呼呼地说，仿佛她已经下决心再也不说奶酪酱这个词了。

她所有的词语都脱落了。她很生气，她真想跺脚，用拳头捶桌子，大喊大叫。但她只是僵在那里，愤怒在她内心涌动，格外轻快鲜活。面对一堆词语，她只得停下来，就像面对着一幅拼不出来的拼图。

“把饼干给我，下体那种。”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种饼干。纤体饼干。她的大脑依然在运行：她用更熟悉的下体代替了不太熟悉的纤体，于是，一个惊人的组合从她嘴里吐了出来。这只是我的想象，也许语言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一条不一样的路径。

“把耳机给我，我要给雅沃尔卡打电话。”

“你是说手机吗？”

“对。”

“你真要打给雅沃尔卡吗？”

“不，怎么会呢，我干吗给她打电话？！”

雅沃尔卡是她多年前认识的人，谁知道她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名字。

“你想说的是卡娅，对吗？”

“对呀，我说我想给卡娅打电话，不是吗？”她哼了一声。

我能听懂她的话。大多数时候，我都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通常她忘记词语的时候，会这样描述它：把喝水的那什么拿给我……这个任务很简单：指的是她一直放在手边的塑料水杯。

之后，她似乎还是想到了办法来应对。她说话时开始加上小、小可爱、小可心、甜心之类以前从来不用的小词。就连人名，包括我的名字前面，也会加上这些尴尬的昵称。它们就像磁铁一样，果然，四散的词语又整整齐齐地聚合在一起了。她尤其喜欢用这些词来形容她最贴身的东西（我的甜心睡衣，我可爱的小毛巾，那个松软的小枕头，我的小瓶子，那双舒服的小拖鞋）。也许这些词句就像唾液，可以帮她融化硬糖一般的词语，也许她只是在为下一个词、下一个句子争取时间。

或许这样一来，她就没那么寂寞了。她向周围的世界轻声低语，于是世界好像也变小了，没那么可怕了。除了这些小词，她的话里偶尔还会蹦出来一些大词，像弹簧一样：蛇变成了邪恶的大蛇，鸟变成了又老又肥的鸟。在她眼中，人往往比实际上更大（他是个大——块——头！）。其实，是她变小了，世界就显得更大了。

她用新的、更幽暗的音色慢慢地讲话。她似乎很享受这种音色。她的嗓音有些嘶哑，声调有些傲慢，是一种要求听众绝对尊重的语调。在频频失语的情况下，音色就是她仅剩的一切。

还有一个变化。她开始倚靠某些声音，仿佛声音就是她的拐杖。我听到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开冰箱，去浴室，按照某种规律的节奏，嗯嗯嗯，或者呜呼呼，呜呼呼。

“你在跟谁讲话？”我问。

“没有谁，就我自己。我在和自己讲话。”她回答。

谁知道呢，也许在某个时刻她突然被寂静吓到了，为了驱散恐惧，她学会了嗯和呜呼呼。她害怕死亡，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她忘记了太多东西，却从来不忘提起她认识的人的死讯，无论亲疏远近，朋友的朋友的死，甚至她未曾谋面的人的死，还有她从电视中得知的公众人物的死。

“出事了。”

“怎么了？”

“我担心说了会吓到你。”

“说吧。”

“韦斯娜太太过世了。”

“哪个韦斯娜？”

“你认识的那个韦斯娜太太！住在二楼的？”

“不认识，我都没见过她。”

“失去儿子的那个，有印象吗？”

“没有。”

“电梯里碰见总是笑眯眯的那个？”

“真的一点印象都没了。”

“就是这几个月的事儿。”她说着，合上了脑海中韦斯娜太太的小档案。

她的邻居、密友和点头之交相继离世，以女人为主的社交圈日渐缩小。男人很早以前就死了，有些女人埋葬了两任丈夫，有些甚至埋葬了自己的孩子。提起那些对她无足轻重的人的死讯时，她波澜不惊。几则纪念性的小故事具有治疗作用，讲述这些故事能驱散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然而，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她却避而不谈。密友近期去世后，她一直缄默不语。

“她已经那么老了。”她只在后来简单提了一句，好像吐出一块苦涩的东西。这位朋友只比她大一岁。

她扔掉了衣柜里所有的黑衣服。以前她从来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现在她永远穿着红衬衫或者嫩草色 T 恤，这样的 T 恤她有两件。我们叫出租车时，如果车是黑色的她就拒绝上车（再叫一辆吧。我才不想上这辆呢！）。她把摆在架子上的她父母的、她姐姐的、我父亲的照片都收了起来，换成她孙辈的、我弟弟妹妹的和我的照片，还有她自己年轻时的漂亮照片。

“我不喜欢死人，”她告诉我，“我想跟活人待在一起。”

她对逝者的态度也变了。在此之前，每个人在她的记忆中各有其一席之地，一切都井井有条，如同在一本家庭相册里。现在相册散了架，照片散落一地。她不再提起过世的妹妹，反而突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她的父亲。父亲永远在读书，还经常带书回家，父亲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她曾亲手把父亲送上神坛，如今又亲手把他拉了下来，关于父亲的记忆被她体会过的最彻骨的心寒永久地玷污了，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也绝对不会原谅。

然而，她给出的理由与谈起这件事时的痛苦并不相称，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有一对夫妇是外公外婆的好友。外婆去世后，他们一直照应着外公，特别是那位妻子，也是外婆的朋友，对外公十分照顾。有一次，我妈妈偶然目睹了外公和这个女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一幕，外公在亲吻她的手。

“我觉得很恶心，妈妈当时一遍又一遍地说：‘照顾好我丈夫，照顾好我丈夫！’”

外婆不太可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她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照顾好我丈夫，照顾好我丈夫！这种可悲的恳求，是被妈妈塞进奄奄一息的外婆嘴里的。

与恶心的吻手画面粘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画面，妈妈无法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她上次回瓦尔纳时，外公请求妈妈带他一起走，但是她——被我父亲绵延的病情、临终的剧痛和最后的离世折磨得心力交瘁——惧怕责任的重担，拒绝了他。外公被遗弃在瓦尔纳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把我送他的小毛巾卷起来，夹在胳膊下面，转身进了门。”她这样向我描述他们的最后一面。

听上去，她是把一条毛巾夹带进了最后那一幕里。每年夏天，我们去看望妈妈的保加利亚亲戚时，总会带着一堆礼物。她不仅喜欢送礼物，还喜欢自己送礼物时的样子：她回到阔别已久的瓦尔纳，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就像一位善良的仙女。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与自己父亲告别的画面中加上一条小毛巾，仿佛她在用那条毛巾鞭打自己，仿佛夹在他胳膊下的毛巾是人类衰败时最恐怖的意象。衰败就发生在她眼前，她却袖手旁观，没想

着要阻止，或者至少减缓一下它的颓势。她没有作出那真正的壮举，即经过漫长痛苦的官僚程序，还得不到确定的结果。相反，她塞给了外公——一条毛巾！

贬低死者是她最近才出现的需要。她的指责并不严重，全是零碎的细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很有可能是她当场编造出来吸引我注意力的，仿佛吐露了一个从未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也许逝者的形象现在由她掌握这一事实会让她感到满足。有时她回忆起故去的朋友，就像刚刚决定在学校记录上把他们的成绩降一档，她会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从来都不待见他；也从来没怎么喜欢过她；我对他们印象都不好；她一直是个小气鬼；不，他们都不是好人。

有一两次，她甚至想抹黑我父亲的形象，这位她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她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将他留在了他死后她为他建起的神坛上。

“你不是真的爱他爱到发狂吧？”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但我确实爱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安静。”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爸爸确实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我记忆中的外公也是位沉静的人。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仅都安静，还都是妈妈见过的最诚实的人。

也许通过对逝者偶尔的亵渎，她可以消除自己本该做某些事却没有做的负罪感。她用严苛的审判来掩饰自己对最亲近的人不够尽心尽力的愧疚。她似乎只是害怕多关心别人一点。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她就像畏惧死亡一样畏惧生活。所以她才会固守着自己的位置，固守着自己渺小而倔强的坐标，面对那些对她来说太过刺激的场面和情景，她选择闭上眼睛。

洋葱一定要炒熟。健康是第一要紧的。撒谎的人是最坏的。老年是可怕的灾难。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煮羽衣甘蓝一定要倒掉第一道水。

也许她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我没有在意。现在，一切都变小了。她的心脏萎缩了。她的血管变细了。她的步子变小了。她的词汇量缩小了。生活也越缩越窄。她以特别的分量说出这些老套的话。我想，这些老生常谈让她觉得一切都还好，世界各安其所，让她觉得她仍然掌控着一切，仍然有决定权。她挥舞着她那老一套，仿佛它们是无形的印章，她把它们盖得到处都是，急切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她的头脑仍在运转，双腿也还合用，她能走路，诚然，是在助步器的帮助下，但是她毕竟能够行走，她仍然知道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老年是可怕的灾难。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在萨格勒布大学就读期间，主修俄语文学及比较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毕业后留校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杜布拉夫卡因公开反对战争及民族主义，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于1993年被迫离开克罗地亚。此后，杜布拉夫卡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1996年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从事小说创作、文化评论、翻译、文学研究及编辑出版等工作，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1998年7月1日适逢星期三。杰任斯基在星期二晚上就准备了告别聚会的食品，这是合乎逻辑的，尽管有点不正常。胚胎冷冻盒之间还有个电冰箱，用来装香槟酒。冰箱被香槟酒压得有点变形。平时它用于保存常用的化学制品。

四瓶香槟十五个人喝，有点勉强，反正一切都有点勉强，连他们聚会的理由也浮于表面。不适当的一句话，斜眼的一瞥，都可能使聚会的人散伙，各人奔向自己的汽车。他们聚会的地点是地下室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房间铺着白瓷砖地砖，装饰着画有德国湖泊的招贴画。谁也没有提出要拍照。一位年初才来的年轻研究员，满脸胡子，一副蠢相，没待几分钟就离去了，借口是要去修汽车。客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不自在。假期在即，有些人要回老家，有些人要作绿色旅游。交谈的话语懒懒地在空气中回荡。大家很快分了手。

到十九点三十分，一切都结束了。杰任斯基在一位女同事陪伴下穿过停车场。这位女同事有着黝黑的长发，白皙的皮肤，丰满的胸脯，年龄比杰任斯基稍大一点，很可能接替他担任研究单位的头儿。她出版的所有作品都是记述果蝇 DAF3 基因的。她是单身女子。

杰任斯基站在自己的丰田汽车前面，微笑着向女研究员伸出手（几秒钟以来，他就在酝酿做这个动作，同时露出微笑，思想上做好准备）。两只手握在一起，轻摇两下。稍后他想，这次握手缺乏热情：考虑到具体情况，他们本来可以像部长们或者联袂演出的歌唱家一样相互拥抱的。

道别之后，他坐在车内待了五分钟。这五分钟他觉得很长。那个女人为什么没有启动车子呢？莫非她在一边手淫一边听勃拉姆斯的音乐？抑或相反，她在考虑自己的职业道路和新的职责？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她感到高兴吗？女遗传学家终于开着高尔夫牌汽车离开了停车场。又剩下杰任斯基孤单一人。这天阳光灿烂，十分和煦。在这初夏的几星期内，一切都仿佛沉浸在光辉和宁静中，凝滞不动。杰任斯基意识到这一点。白昼开始变短了。

过去他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工作，他启动车子时这样想。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生活在帕莱佐是享受一种优越环境吗？”百分之六十三的居民回答：“是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楼房不高，且其间铺有草坪，有好几个大型超市，购物方便。涉及帕莱佐，“生活质量”这个概念似乎只是略显得夸张。

去往巴黎方向的南方高速公路上不见车行。他觉得自己仿佛处在大学时代所看的一部新西兰影片之中：一切生命都消失了，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空气中有某种东西，令人想到干旱中世界末日的来临。

杰任斯基在弗雷米库街生活了十来年，在那里住惯了。那是一个很安静的街区。1993年，他感到需要一个伴儿，一个当他傍晚归来时能在家里等待他的伴儿。他选择了一只白色的金丝雀，一只怯生生的小鸟。那鸟儿多在早上唱歌，看上去并不愉快。不过，一只金丝雀谈得上愉快不愉快吗？愉快是一种强烈而深层的激动，是整个心灵感受到的一种丰富而激越的情感。接近于兴奋、陶醉和狂喜。有一次，他把小鸟从笼子里放出来。吓坏的小鸟在长沙发上拉了一泡屎，跳到铁栏杆上寻找回笼子的门。一个月后他又试验一次。这回可怜的小鸟从窗台上掉了下去，只是勉强挣扎才没有一直跌落，终于停在对面那座楼五层下面的一个阳台上。米歇尔一直等着那家的女主人归来，强烈希望她家没有养猫。他弄清了那家的女主人是杂志《芳龄二十》的女编辑，单身，回家很晚，家里没养猫。

天黑了。米歇尔找回了小鸟，它蜷缩在水泥墙角，又冷又怕，瑟瑟发抖。他后来又见过那位女编辑好几回，一般是在倒垃圾的时候。她每次都点点头，大概是表示点头之交。他也点点头。总之，这件事使他与一位邻居建立了关系。这挺好。

从他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十来栋楼，约三百套住宅。他傍晚归来时，金丝雀一般就开始叽叽喳喳鸣叫，持续五到十分钟光景。他为它换食物、垫沙和加水。可是这天傍晚他进家门后，却没听见任何声音。他赶到笼子边一看，小鸟死了。它小小的白色躯体已经变冷，卧在细沙边上。

晚餐他吃了一块不二价超市自主品牌香叶芹调味狼鲈，加上一瓶蹩脚的巴尔德佩尼厄斯葡萄酒。犹豫一阵之后，他把小鸟的尸体放进塑料袋，同时放进一个啤酒瓶作为压重物，一起扔进垃圾孔。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呢？去做一次弥撒吗？

他从来不知道那个垃圾孔通到什么地方。孔口窄窄的（但足以放进一只金丝雀的尸体）。然而他想象有些巨大的垃圾箱，里面装满咖啡滤纸、蘸酱的饺子和切下的性器官；一条条与金丝雀一样粗大的虫子，用它们的嘴啃噬金丝雀的尸体，扯下它的腿，拖出它的肚肠，掏出它的眼球。半夜里他吓得在床上坐起来。才一点半钟。他吞服了三片爽心宁。他头一



题图为电影《基本粒子》(2006)剧照

## 小说

# 基本粒子

米歇尔·维勒贝克 | 新书推荐

人类，

只是宇宙粒子的随机排列组合？

《基本粒子》是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第二部长篇小说，从中已经可以看出维勒贝克作为一个作家的野心，他想要细致地记录下西欧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和变化，他想要成为20世纪的巴尔扎克。在尼采提出“上帝疯了”之后，西方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如果没有宗教，社会以及个人要如何活下去？

布吕诺和米歇尔是对同母异父的兄弟，性格截然不同，又互为映照。布吕诺浪漫，成了语文老师；米歇尔理性，成了生物学家。布吕诺是个生活实践家，在吃喝玩乐、更换女友的过程中寻求生命的意义；米歇尔拒绝了青梅竹马的示爱，比起稍纵即逝的欲望，他更愿意投身神圣的科学研究。在人生路的某个节点，他们都曾无限接近幸福又失之交臂。

布吕诺和米歇尔互相纠缠的命运，构成了人类生存图景的DNA双螺旋结构。而在不远的将来，得益于米歇尔的研究成果，人类通过无性繁殖实现了永生，摆脱了生而为人的七情六欲……

以下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



个自由的晚上就这样结束了。

## 2

1900 年 12 月 14 日, 在为柏林科学院撰写的一篇题为《标准光谱能量分配率理论》的学术报告中, 马克斯·普朗克第一次提出了能量量子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在后来物理学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900 年至 1920 年间, 主要在爱因斯坦和玻尔的推动下, 人们构造了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巧妙的模型, 并试图将这种新概念并入从前的理论框架; 只是从 20 年代初开始, 旧框架显得不可救药而寿终正寝了。

尼尔斯·玻尔被视为量子力学真正的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发现, 更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周围营造的那种充满创造力、智力和激情、思想自由和友好情谊的气氛。1919 年由玻尔建立的哥本哈根物理学院, 汇集了欧洲物理学界所拥有的年轻研究者。海森堡、泡利、玻恩在这里深造。玻尔比他们年龄稍大一点, 他常常不惜花上数小时, 探讨他们设想的细节, 把哲学的洞察力、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出色地结合在一起。他讲究精确, 甚至有些过分, 对试验的陈述绝不容许近似的概念。任何新想法他都不会先验地认为是发疯, 任何传统的概念他都不会认为不能触犯。他喜欢邀请学生和他一起去蒂斯维德的乡间别墅。他也在那里接待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政治家和艺术家: 交谈经常自然地从物理学转到哲学, 从历史转到艺术, 从宗教转到日常生活。从希腊思想活跃的古代直至今日, 从来没有出现过可与之相比的情形。正是在这种异乎寻常的氛围中, 拟定了哥本哈根阐释的基本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从前的空间、因果关系和时间等范畴无效了。

杰任斯基根本不可能在他周围重新营造这种气氛。他所领导的研究单位的内部气氛, 不折不扣是办公室气氛。分子生物学研究者远非情感丰富的公众所乐于想象的使用显微镜的诗人兰波形象, 他们通常是一些诚实的、没有天赋的技术专家, 阅读《新观察家》杂志, 幻想去格陵兰岛度假。在分子生物学上进行分析研究, 不需要任何创造和发明。实际上这差不多完全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活动, 只要求具有适当的、二流的智力。那些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进行论文答辩时, 大学二年级的人为其操作仪表还绰绰有余。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物所所长德斯普莱辛喜欢说: “要想获得遗传密码的概念, 发现蛋白质的合成法, 那的确需要费一点事。况且, 你想必注意到了, 首先探索这个问题的是物理学家伽莫夫。至于破译脱氧核糖核酸密码, 呃, 就只需破译, 破译, 做了一个分子, 做另一个分子, 把资料输入电脑, 电脑计算亚序列; 大家发个传真: 他们做基因 B27, 我们做基因 C33。变变化样而已。仪表上不时会显示出微不足道的进展。一般情况下, 这就足以让人家授予你诺贝尔奖了。简直是修修补补, 开玩笑一样!”

7 月 1 日下午酷热, 将近傍晚时分天气变坏, 最终会暴发一场暴风雨, 驱散打赤膊的人。德斯普莱辛的办公室面朝阿纳托尔·法朗士河堤街。在塞纳河另一边, 杜伊勒里宫那段河堤上, 一些同性恋者在阳光下徜徉, 两个一对或三五成群地交谈着, 共用几条毛巾擦汗。他们几乎都穿三角裤衩。涂了防晒油的肌肤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臀部鼓凸而发光。有些人一边闲聊, 一边隔着尼龙裤衩抚摸自己的生殖器, 或者伸进一个手指……德斯普莱辛在玻璃幕墙边安了一架望远镜, 据传他本人也是同性恋者。事实上, 几年来他更多地是社交界一个酒鬼。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下午, 他有两次想手淫。他把眼睛贴在望远镜上, 盯住一个年轻人不放。那个年轻人让三角裤衩滑落在地上, 那东西昂起头, 暴露在空气中。他自己的又垂下来, 软趴趴, 皱巴巴, 干乎乎; 他不作坚持。

杰任斯基是四点整到的。德斯普莱辛要他来见面。他对杰任斯基的情况感到好奇。他当然知道, 一位研究员会利用休假去挪威、日本, 总之去四十来岁的人成批自杀的那类可怕的国家的某个团队工作; 另一些研究员则寻找风险资金建立公司, 把这个或那个分子商业化。这种情况在金钱贪欲达到空前程度的“密特朗年代”经常发生, 而且某些人在很短时间里创造了可观的财富, 不知廉耻地拿他们在无私的研究年代所获取的知识去营利。可是, 杰任斯基的离职没有计划、没有目的、没有任何解释, 这就不可理解。他四十岁上成了主任研究员, 有十五位科学家在他手下工作。纯粹从理论上讲, 他只隶属于德斯普莱辛。他那班人取得了优秀的成就, 被认为是欧洲最出色的团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德斯普莱辛尽量用热情的口气问道: “你有什么打算吗?”沉默了半分钟, 杰任斯基简单地答道: “想一想吧。”出师不利。德斯普莱辛装出诙谐的口气, 又问道: “个人方面呢?”他盯住对方那张严肃、尖削、目光忧郁的脸, 突然感到羞愧。个人方面什么呢? 十五年前, 是他自己去奥塞大学找的杰任斯基, 他的选择被证明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位一丝不苟办事严谨,

富有创造性 的研究者。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能在欧洲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保持好的名次, 很大程度上是多亏了杰任斯基。合同已经充分履行。

“当然,”德斯普莱辛最后说, “我们会保留你进入信息系统的权利。你的密码始终有效, 你可以进入服务器查看存储的数据, 也可以登录中心的网络。这一切不限定期限。你如有其他需要, 尽管对我讲。”

杰任斯基走后, 德斯普莱辛又走到玻璃幕墙边。他微微有点出汗。对面的河堤上, 一个典型的北非褐发青年正在脱裤子。仍然存在一些真正的基础生物学问题。生物学家思考和处理问题, 仿佛分子是分离的物质要素, 彼此仅仅由电磁斥力和引力间接联系。德斯普莱辛相信, 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听说过爱波罗佯谬, 没有任何人听说过阿斯佩实验, 甚至没有任何人费心去了解本世纪初以来物理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他们关于原子的概念几乎还是与德谟克利特一样。他们收集累赘而重复的资料, 唯一的目的, 就是看看什么东西可以立刻在工业中应用, 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方法概念的根基遭到了破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可能只有杰任斯基和他本人由于受过物理学的启蒙教育, 了解这些情况。一旦真正触及生命的原子根基, 目前的生物学基础就会土崩瓦解。德斯普莱辛在思考这些问题时, 夜幕已降临塞纳河上。他无法想象杰任斯基会如何考虑, 甚至觉得自己没法与他进行讨论。他已属花甲之年, 感到自己的智力已彻底枯竭。那些同性恋者已经散去。河堤上现已阒无一人。他无法忆起他最后一次勃起; 他等待着暴风雨来临。

## 3

暴风雨在将近二十点钟来临了。杰任斯基一边小口呷着廉价的阿玛尼亚克烧酒, 一边谛听着雨声。他刚满四十岁。莫非他是四十岁危机的受害者? 随着生活条件改善, 现在四十岁的人还年富力强, 身体状态良好。表明又上了一个年龄台阶的种种最初迹象, 无论是身体的外表, 还是各种器官对力气活儿的反应, 通常只有到四十五岁甚至五十岁才会出现。而且, 这众所周知的“四十岁危机”往往伴随着性方面的现象: 突然疯狂地追求妙龄少女的肉体。就杰任斯基的情况而言, 这方面的考虑是多余的, 他的阳具是用来撒尿的, 仅此而已。

第二天, 他将近七点钟起床, 从书架上拿了科学家沃纳·海森堡的自传《部分和整体》, 步行向战神广场走去。晨光清丽而凉爽。他从十七岁起就拥有这本书。他在维克多·库赞道的悬铃木下坐下来, 重读第一章中海森堡描述他在求学年代最初接触原子理论的那一节:

记得那大概发生在 1920 年春天。第一次大战的结束在我国青年中播下了骚动和惶惑。老一代人因为失败而深感失望, 失去了掌控力; 青年人以大大小小团体的形式集合起来, 寻求新的道路, 或者至少找到能为他们指明方向的新指南, 因为旧指南已经被砸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 我与十来个或二十来个同学漫步于路上。如果没记错, 这次漫步是向斯塔恩贝格湖西岸的山丘走去。每当一排碧绿得闪光的山毛榉间出现一个缺口, 湖面便出现在我们的左下方, 似乎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群山之中。相当奇怪的是, 在这次漫步的过程中, 我头一次与同学们就原子物理的世界展开了一场讨论, 而这次讨论对于我后来的研究生涯有着重要意义。

将近十一点钟了, 热得越来越厉害。米歇尔回到家里, 脱光衣服往床上一躺。接下来的三个星期, 他的活动大大减少。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形: 鱼不时将头露出水面呼吸空气, 在几秒钟之间, 瞥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堂般的空中世界。当然, 随后它又回到了那大鱼吃小鱼的水藻世界之中。但就在那几秒钟之间, 它兴许直觉感受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完美的世界, 即我们这个世界。

7 月 15 日晚上, 他打电话给布吕诺。在冷爵士乐背景声衬托下, 他同母异父兄弟的声音传达出微妙深意。布吕诺嘛, 肯定是四十岁危机的受害者。他穿皮雨衣, 蓄胡子。为了表现他懂得生活, 说话像二流警察片里的人物。他抽小雪茄, 锻炼扩张胸肌。但在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上, 米歇尔根本不相信四十岁危机这种解释。一个受四十岁危机影响的人, 恰恰要求生活, 要求生活得多一点, 要求什么都延长一点。而他的情况, 实际上是对生活完全厌倦了, 干脆看不出任何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

当天晚上, 他找到一张照片, 一张在上夏尼小学时拍的照片。他抽泣起来。孩子坐在课桌前, 手里捧着翻开的课本, 凝视着欣赏着, 脸上浮着微笑, 充满快乐和勇气。事情真不可思议, 这孩子就是他。孩子正在做作业, 认真而自信地温习功课。他正步入世界, 发现世

界，面对世界而毫无胆怯之感，正准备在人类社会占有他的位置。这一切，从孩子的目光中可以读出来。他穿一件窄领罩衫。

好几天米歇尔一直把这张照片靠床头灯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岁月神秘又平淡，一切正常有序。他这样想着，目光暗淡了，快乐和自信消失殆尽。他躺在布台克丝牌床垫上，力图接受无常，但无济于事。孩子额头有一个小小的圆形凹陷，那是出水痘留下的疤痕。这个疤痕没有被岁月抹去。真理何在？中午的炎热扑进房间。



米歇尔·维勒贝克

法国小说家、诗人、电影导演。凭借《基本粒子》崭露头角，销量在法国超过 100 万册，而《地图与疆域》使他斩获了法国文学最高奖项——龚古尔奖。如今维勒贝克已是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加缪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也是最诚实质问生存意义的思想家。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本文作者



非常荣幸能在今年的“大师讲堂”做讲座。我爱佛罗伦萨，很高兴来到这里，不过这份盛情邀请也让我有点蒙。我收到的信息是，我可以和你们谈论我喜好的任何话题，只要与写作有关就行。但是，关于通常而言的写作，我还能说出什么别人没有说过或者我自己没有说过——但那对我而言也就意义不大——的内容？能就此说点什么有权威性的东西呢？似乎没有话题能涵盖这种情况。

比如说，文字是纸上或者洗手间墙上的一行黑色标记，无数人将它们放置于那些地方。书写是记录人类声音的一种方式，尽管不是唯一的方式。写作日渐过时，或者尚未落伍，一切取决于是谁在告诉你这句话。写作通常是讲故事的一种形式，而讲故事又是人类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发明；我们通过故事要比通过图表和图形等方式更容易学进去。书写发端于美索不达米亚时期，用来记录庙宇中小麦等商品的库存情况。它曾被视为只有文士和魔术师才知晓的秘密，至今也仍然带有一丝警告的意味。我最近收到了一只咖啡杯，上面印有“字词”一词，下面还有“小心处理”的字样。信件可以伪造出来摧毁他人，如苏格兰女王玛丽。文字也被拯救那些面临处决威胁的人：看啊，书面签署的赦免书及时送达了！写作还被用来敲诈和勒索，或是给人带来希望和欢乐。手写体在十九世纪得到广泛传授，因为资本主义需要大量会读会写的文员，以便记录财富与债务状况。

哦，但你们指的不是小写 w 开头的写作，而是大写 W 开头的写作！你们的意思是文学写作，或者至少具有一定高度的书面作品。也许你们指的是我自己常搞的那种写作。我说“搞”是有意为之——有人搞事儿，犯了罪，文学写作也是个事儿，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罪行。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写作就被关进监狱或送进坟墓：亵渎和背叛是对他们的裁决；而在文学评论家中间——我们且别忘了，他们本身也是作家——坏品味与烂作品是对他们的指责。

我们可能会说，要小心写作！也许人们应该小心谨慎些，永远不要在纸上记录任何东西。但就我而言，一切都太晚了。

因为人类是符号的制造者，喜欢用可以理解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符号，所以我现在将尝试通过“大祭司”“命运之轮”以及“正义”三张塔罗牌，来审视写作的某些方面。

再者，由于人类是故事讲述者，而且成千上万年来一直如此，所以我将从三个故事开始讲起。第一个故事：“我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算是作家吧）”。第二个故事：“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怎么用塔罗牌教初级小说写作课”。第三个故事：“二一七年，意大利米兰，我得到一副维斯康蒂塔罗牌的来龙去脉”。

#### 第一个故事：“我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算是作家吧）”

故事背景是这样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很有资格向你们描述那个遥远的世界，因为我当时已经活蹦乱跳，而且多少算是长大成人了——那时没有手机。不止如此：那时也没有个人电脑、社交媒体或者互联网。甚至连传真机也没有。电子打字机刚被发明出来；直到一九六七年我才买了一台。当时没有连裤袜。没有拿铁咖啡，或者说在北美没有：拿铁咖啡还没有从欧洲悄然袭来，尚未渗透到集体血液中去。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的女性——如果有的话——人数非常之少。

如果你从事医学工作，且身为女性，你很可能是一名护士。如果你身处法律行业——虽然不太可能——你会是一名法务助理。如果你是一位从政的女性——至少在北美——那你就是个怪胎，大家都当你是个怪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绝大多数小说家和诗人都是男性。当时只有一所教授创意写作的学校——在艾奥瓦州。加拿大多伦多没有这种学校，而我就在这里出道成为作家。在漫长而奇妙的人生轨迹中，我获得的任何技能都是自学而来的——我很高兴地承认，自己还得到了一众朋友、最初的读者、代理人与编辑的帮助。但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学会了这些技能：首先我必须写出点东西。而一开始我写的东西都很糟糕。大多数

## 非虚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个世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新书推荐

《使女的故事》作者对世界与未来的“灵魂拷问”

我们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一场蔓延全球的流行病、新一波女性运动的发展、愈加频繁的极端气候灾难和区域冲突，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可替代的文化象征，多年来，她一直是西方文坛最活跃、最关心公共话题的作家之一，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地发表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她对现实的关切也反映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都热切地关注着公共事件和全球议题的发展与动向。

出版于 2021 年的随笔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收录了阿特伍德近二十年来的五十多篇作品，以她一贯的犀利、幽默、永远开放的心态和不可思议的预见性，提出了最切中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疑问。从科技、债务、气候危机、环保主义到如何适时地为年轻人提供建议；她也用相当的篇幅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包括《使女的故事》《证言》等畅销作品的创作谈。阿特伍德用自己永不停歇的好奇心突破一切表面的界限，展现了人类社会的诸多截面，刺破这个同质化时代设下的重重阻碍，引领读者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做出自己的思考。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三张塔罗牌》一文分享给读者。

作家都是如此。



阿特伍德

一九五七年，我进入大学，这时我已经读了一些对我此后一直大有裨益的核心文本——《圣经》、《伊利亚特》、《奥德赛》、《埃涅阿斯纪》、我能读到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无数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海量的漫画书、莎士比亚的大量作品和许多十九世纪的小说——尽管还没读多少但丁、塞万提斯或者乔叟的作品。当时，人文科学算得上正值繁荣时期，或者至少比现在更受尊重。它们确实——在某些圈子里——填补了原先曾经由宗教占据的空白；它们似乎可以带来精神上的升华、个人的充实、或者说不清道不明的进步。人文科学应该有益于你的道德修养，虽然个中路径向来是云里雾里。

这种观点有其缺陷，正如人类的一切都有缺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末的苏联把这种道德化的分析推向极致——某些诗人、作家甚至不能出版作品，因为他们被宣称一派“堕落颓废”，对社会有害。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被认为十分危险，她的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长达数十年。她以片段形式创作的惊世长诗《安魂曲》讲述了亲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感受，再分由阿赫玛托娃信得过的朋友来背诵。书面记录尽数焚毁：如果给抓到了证据，很可能意味着阿赫玛托娃要被判处死刑。等开放政策终于到来，这首诗的片段才得以重组并全文出版。

想象一下，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存一首诗、一部小说或者关于所发生之事的一份记录！但人们确实这么做了。就在最近，一部关于在极其压抑的政权下生活的短篇小说集被偷偷运出朝鲜。这本书叫《指控》。作者用了一个笔名——班迪，意为“萤火虫”。想想看，一只小虫，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闪光。

作家作见证，也当信使——这是个历史悠久的角色。我想起了《约伯记》中对于声音的运用——据说《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文本之一。那声音是报信人的话语，他来到约伯身边，讲述了将他的儿女毁于一旦的可怕灾难。他说“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是富于想象的文学作品在困顿磨难之时所能做的事情之——可作见证。

然而，当声称要行动起来保护社会的外部力量对艺术进行过多的道德检视，这时你毫无例外会受到审查甚至会遭到类似于对待福楼拜开创性小说《包法利夫人》的淫秽罪审判。这种以道德为依据的文学观——不应出版任何会冒犯道德观念的作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特征：与那个时代严格尊崇道德原则形成对照的，却是伦敦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交际花、街妓和被卖到娼业的儿童。但我们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想法，即小说、诗歌和艺术作品总体上须按照评判人的标准来评判它们是否对你有益。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道德说教很可能表现为对艺术作品的审查，将艺术仅仅限定为娱乐业的一小部分，或者是某种分泌物——就像珍珠质包裹住烦人的沙粒而形成的一颗珍珠——或者是碎屑，比方说一片蛇蜕或一些剪下来的脚指甲它们是文化大环境的产物，也就是只有作为其作者在心理、世界观、社会经济地位、哲学观点、审美趣味或成见等方面出了问题的症状，这才值得研究。

据说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不再是关于艺术作品的沉思，而是对它进行的批判性摧毁。多令人欣慰——又一样败坏的文化糟粕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更加开明的人正沿着黄砖路走向每个人都快乐而又品行端正的翡翠城奥兹国——或者按照将性视为原罪的圣奥古斯丁的说法——上帝之城。在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们这种高傲的批判性（我赶紧补充一句，我自己也不例外）并驾齐驱的，是以前闻所未闻且绝不可能存在的暴力色情的饱和程度。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和人类社会完全相互矛盾。

不过我跑题了。一九五七年，当时我十七岁。多伦多在一九四八年我迁居过去的时候，大约有六十八万人口，被称为“美好的多伦多”，有时也被称为“清教徒的多伦多”，这与它禁律严明的法规有关——例如，不许在街上行人目力可及的场所饮酒，而且周日全面禁酒。

周日的娱乐活动是到铁路调车场去看火车转轨。

如今情况发生了逆转：多伦多现在被视为全球范围内文化最多元的城市。一九四八年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多元文化这个词甚至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一九六一年，我还是个年轻的作家，艺术界当中那些为数不多的中坚力量给我的建议基本上都是“离开多伦多”。或者他们还会扩大范围：“离开加拿大”。加拿大当时没几个出过书的作家，没有电影业，也没有音乐业。艺术都靠进口而来，假如你们对艺术有兴趣的话：木材是你们出口的产品。加拿大被视作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不毛之地，事实上，除了伐木、采矿和捕鱼之外，几乎所有行业都不成气候。当时我们出产了寥寥几位权威专家，其中一位曾说过这么一句令人难忘的话：“美国人喜欢赚钱。加拿大人喜欢数钱。”

这位专家正是诺思洛普·弗莱，多亏了他，我才去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而不是巴黎。我原本打算去巴黎当女招待，住阁楼，利用业余时间写杰作，抽香烟——吉卜赛女郎牌，我是想这么做的，但不指望了，因为我对烟过敏——喝苦艾酒，同样也不成，我一喝就吐，这可太不够诗意了——染上肺结核这种浪漫的病，像歌剧里那样。我确实懂点歌剧，这要归功于收音机以及周六下午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现场演奏的转播。

我选择了哈佛大学和英语研究生学位，而不是去巴黎死于肺结核，因为弗莱认为我去当学生可能会比当女招待（我们当时称之为女招待，而不是“服务员”）得到更多的写作机会。他的看法没错，我后来真当上女招待时也发现了。顺带提一句，清理陌生人吃了一半的食物是减肥的好方法。我那时瘦了十磅。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写作，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这使我联想到了：

### 第二个故事：“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我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怎么用塔罗牌教初级小说写作课”

如果一九七〇年你还没有出生，别担心：很多人都没有呢。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年，我住在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市。我原本应该完成关于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作品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研究强有力的超自然女性形象及其与华兹华斯和达尔文自然观的关系，但在那两年里，我让电影业给岔开了去，写起了剧本，之后再也没有去写关于超自然女性的论文。

彼时埃德蒙顿大学开设了小说写作基础课，我获邀前去授课，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位出版过作品的诗人了。学生都是本科生，面对稿纸战战兢兢的。为了帮助他们克服恐惧，也为了让他们集中注意力，我把我的塔罗牌带到课堂上，请他们从四种花色中选取一张大阿卡那牌——有名字有图案的牌，或者从小阿卡那牌——即国王、王后、骑士和随从当中挑一张人头牌。在塔罗牌中，四种花色分别是圣杯、宝剑、权杖和星币。（在普通纸牌中，四种花色是红心、黑桃、梅花和方片。）幸好塔罗牌中不乏充满力量的女性牌与男性牌，所以大家都有很多选择。

这办法用来促成写作效果相当好，就像讲述民间故事可以激发出新的故事来。有个学生从《蓝胡子故事集》中的“费切尔的怪鸟”取材，站在魔蛋的角度——魔蛋因为沾上了血迹而暴露了女主角两个姐姐的行踪，但第三个到来的妹妹则幸免于难，原来她在进入血迹斑斑的房间之前把魔蛋搁在了架子上——写出了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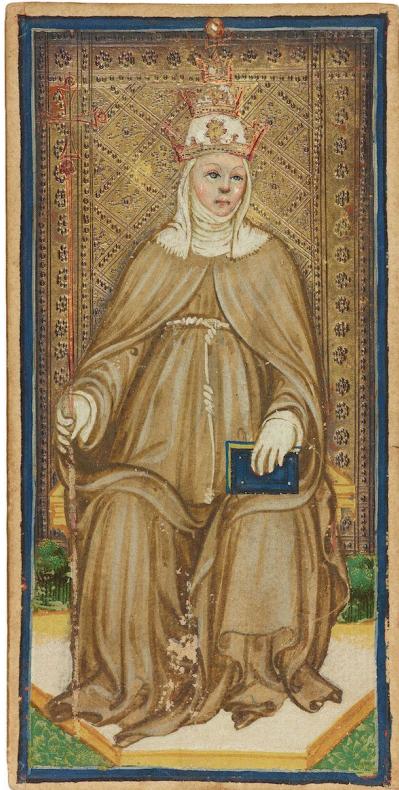
我怎么会懂塔罗牌呢？塔罗牌在T.S.艾略特那个年代就很流行，他在其经典诗作《荒原》中提到了。查尔斯·威廉姆斯——当时一位没那么出名的小说家，也是托尔金的小圈子中的一员——甚至围绕塔罗牌为基础写了一部名叫《王中王》的小说。于是，因为研究二十世纪文学作品的缘故，我已经对塔罗牌略知一二。我有一副马赛塔罗牌在手头好一阵子了，习惯于用它来占卜运势，后来这牌算得有点太准了，让人心惊肉跳，我这才不玩了。

我不久前还学了占星术和看手相，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住在埃德蒙顿一栋分为二出租的房子里，那房子另一头住的是一位荷兰艺术史学者，叫杰茨科·赛比兹玛，专门研究耶罗尼米斯·博斯。她有一个理论——现在已经获得了认可——认为博斯的画作包含占星符号，所以她研究了占星术以及相关书籍，以便解读这些符号；占星术之后又研究了手相学，因为这一体系也与行星相关，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中，手、手指和戒指的布局安排可以告诉我们肖像画主人公的许多信息。

在埃德蒙顿冰冷黑暗的长夜，贸然外出十分危险，因为处处结冰，而且还有冰雾——冰晶可能会进入你的肺部并把它截破——为了消磨时间，杰茨科就把她所知道的关于看手相和占卜星座的知识教给我。塔罗牌也与这些占星体系相关，这使我联想到了：

二〇一七年岁末，我参加了在米兰和科莫举办的专门展映黑色电影和小说的黑色艺术节。我在那里获得了雷蒙德·钱德勒奖，为此满心喜悦，因为我年轻时读过的作品的侦探小说里就有雷蒙德·钱德勒。在科莫逗留期间，我们乘坐缆车前往布鲁纳泰镇，在那里的教堂里看到了著名的女教皇画像。关于这幅画的来头可谓众说纷纭，但应该与圣古列尔马的故事有关，她是一个性别平等宗派的创始人，曾预言说女教皇将会出现。

不难理解，这一预言并不受官方教会的待见，尤其是不受宗教裁判所的欢迎。据我们的导游说，古列尔马躲藏在布鲁纳泰山顶，宗教裁判所的人懒得爬上山顶去，所以他们从没抓到她——尽管他们后来挖出了她的尸骨，还把骨头架在火刑柱上烧了。



女教皇卡牌

一百多年后，有人受委任制作了维斯康蒂·斯弗扎塔罗牌，其中第二张牌就是女教皇——在某些版本的塔罗牌中改名为大祭司——据说是为纪念圣古列尔马和她的教派。谁能说得清呢？但故事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游览了布鲁纳泰又聊了女教皇的话题之后，出版商代表马特奥·科伦坡——他本人简直是个魔术师——送给我一副精美的维斯康蒂·斯弗扎塔罗牌，后续所有版本的塔罗牌都基于维斯康蒂·斯弗扎版的设计。

我选择了三张卡片来代表小说的三个方面，它们大致对应开头、中间与结尾。

第一张牌是女教皇，即大祭司。在占卜时，它象征冥冥之中玄妙神秘的力量以及秘辛。我想让你们注意这张牌与小说写作的关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部小说都是神秘的作品。如果书的开头没有秘密，如果作者摊牌过早（“摊牌”是纸牌游戏的另一个比喻）——我们读者就没有足够的兴趣继续读下去。

我们想了解更多。我们预计作者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我们：我们希望发现人和事并不像我们最初被牵着鼻子走时所想的那样。我们希望到故事结尾之处能揭开隐藏的真相，若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很恼火。

用占星术的术语来说，女教皇或大祭司这张牌受到月亮的支配，而月亮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带有晦暗不清的意涵了。它可以代表直觉，但也可以代表变化、无常与幻象。塔罗牌中的月亮牌表示——含义不限于此——水中的倒影。这里有月亮，也有月亮的倒影。倒影是一种幻象：跳进湖里并不能抓住月亮。

而小说也是倒影与幻象。作为作者，你必须竭尽所能，使你的幻象令人信服。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小说创作。某类真相可以通过倒影与幻象显现，而且经常如此。正如艾米莉·狄金森要求诗人做到的那样，小说也要讲述真相，但要讲得婉转含蓄；她还说：“真理之光须得慢慢闪耀出来。”它是月光的折射，而非正午阳光的直射。这是送给小说作者的

一个宝贵建议。

我的下一张塔罗牌也由月亮掌管。它被称为命运之轮。我用它来代表小说的中间部分。

因为故事总是由一连串事件组成——发生这件事，又发生那件事，然后再发生另一件事——故事中的事件按照一定顺序次第发生，因此小说创作必然始终涉及时间因素。正如亨利·詹姆斯的传记作者莱昂·埃尔德曾说过的那样，只要有一部小说，那么里面就会有一个时钟。

或者，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其他用来标记时间流逝的方式。日晷通过标记太阳移动的圆周来标记时间。类似日晷样式的钟表呈圆形：指针走一圈，然后第二天再走一圈。月相标记时间——新月、满月、下弦月、暗月，然后依次重复。然而常见的纸质日历却呈线性——二一八年三月被撕下丢弃，尽管年年都重现月份与季节周期，但年份本身并不会重来。我们永远都不会再看到一八一二年，除非在历史电影和科幻小说的时间旅行幻想中。

如果时间是线性的，那么何处是起点，何处是终点呢？如果时间循环往复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小说家会如何设想时间呢？时间将如何在叙事中予以安排？大多数小说所采用的印本形式是线性的——也就是说，书页按顺序编号——但在这种线性排列中处理时间的方式未必是线性的。例如，时间元素可能类似于一个圆圈——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发现他或她回到了与起初类似的情形，尽管她不一定还是原来的岁数，除非这是一个具有超自然或非自然特质的故事；或者时间可能被安排用来讲述平行并进的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在同一时间，但随后会产生交集；或者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跟多重倒叙打交道。

故事——即发生了什么，以及结构——即如何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两者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如果相同，故事就从头开始，一直发展到结尾才收住；如果不同，则叙事切入点与故事的开头不尽然相同。例如，在《伊利亚特》中，切入点是阿基里斯在帐篷里生闷气，在这之后我们了解到他为什么会在帐篷里生闷气，然后才知道他为什么走出帐篷，以及他之后又做了什么。



命运之轮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中故事的切入点是平安夜里老守财奴史高治在凄凉守岁，已故的生意搭档的鬼魂前来拜访，之后我们看到三个独立的时间点——史高治的过去、他的现在和他可能发生的未来——每个时间点都让我们读者更多地了解他的人生，同时也让他更多地了解自己。然后时间停止并且逆转，他得以重新过一遍圣诞节，这一次可就欢乐多了。

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切入点（故事开头）在实际的小说（事件的顺序）中已经行之甚远。女主人公凯瑟琳早已去世，而痴情于她、道德存疑的爱慕者希斯克利夫也已经人到中年；他们的故事——我们将要听到的故事——完全是通过另外两个人

的话语来讲述的：一个是想租住希斯克利夫地产的绅士，另一个是主人公家里原先的帮佣奈莉——她知道相当多的事，虽然并非一切。

时间在小说中可以有多种安排方式，上述为其中几种。

作为实验，让我们以《小红帽》为例，在这个熟悉的故事上进行一些改编的尝试。

1. 纯粹线性推进的版本。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她的母亲给她做了一件带兜帽的漂亮红斗篷，所以这女孩被称为小红帽。有一天，她母亲对她说：“你外婆病了，我为她准备了一篮子营养品。她住在森林的另一头，你得把东西带给她，但要注意别偏离了小路，因为森林里有狼……”剩下的你们也知道了。

2. 单刀直入。小红帽真开心！鸟儿在歌唱，太阳当空照，野花都盛开了！为外婆采摘一束花——真是个好主意！小红帽违背了故事开始前她听到的告诫，偏离了小路。突然，从一棵树后走出来一位先生，他彬彬有礼，但显然毛发浓密，牙齿又白又尖。“早上好呀，小姑娘，”他说道，“你在做什么呢？”“我在采摘一束花准备送给外婆，她住在森林的另一头。”小红帽说。你们知道后面的故事了。

3. 回首往事，伴以闪回。小红帽的外婆每次回想起她在狼肚子里度过的可怕一天，都会不寒而栗。那里面非常暗，而且显然是酸性的，还有一些被狼误食的塑料袋以及若干没消化干净的火腿三明治。外婆更喜欢吃水田芥三明治。但这场磨难最让人煎熬的是，她不得不静静地听着狼穿上她的睡衣，戴上她的睡帽，假扮作她。假扮得太糟糕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诱骗她心爱的外孙女小红帽！所幸，后来……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或者我们可以采取更险恶的一种视角——侦探惊悚小说常用的视角——开头一上来就是尸体。但是谁的尸体呢？在故事的某一版本中，外婆和狼都死了，而在另一个版本中，只有狼死了。为什么不以两种方式把这个故事都讲一遍，让读者自己作出选择呢？不少人已经这样做了，包括《写自己的冒险故事》系列丛书的作者们，还有创作《维莱特》时的夏洛特·勃朗特。在这种情况下，事件的顺序并非单一，而是有两种。

或者当出现多个叙述者时事件会有多种顺序。这是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提出的方案，这部电影实在是太出名了，后来作家们都用片名来简称这种多线叙述——其中每个人的叙述都与其他人的叙述相互矛盾。“嗯，上演一出罗生门。”他们可能不无睿智地点头说道。

有些小说的结构类似于拼图：许多碎片到最后都能巧妙地拼在一起。另一些则类似于儿童的“线索”游戏：作者撒下线索，读者努力发现它们。但不管是什么故事，无论采用哪种结构——任何故事的讲述，任何虚构作品的叙述——故事的讲述者与故事的揭秘者、阐释者——即听众或读者——两者之间总有一种假定的互动。



电影《罗生门》(1950)剧照

命运之轮塔罗牌与时间相关。在美国有一档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就叫《命运之轮》。这档节目和这张塔罗牌的名字与符号都源自罗马的幸运女神，福尔图娜。罗马人向福尔图娜祈求，希望她能庇佑他们，为他们带来物质财富。然而，她又是出了名的善变和不可预测，赌徒们太清楚这一点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音乐喜剧《红男绿女》里，在名为“幸运女神今晚请眷顾我”的欢快的赌博歌舞曲段中，正在掷骰子的那个角色祈求的正是她的保佑。他乞求幸运女神表现得淑女一点，留在他身边，不要像平常那般四处游荡。

卡尔·奥尔夫的声乐合唱作品《布兰诗歌》的开场曲凸显的正是福尔图娜女神善变的特质。开头的拉丁文歌词是这样的：

命运女神啊，你像月亮般变化无常，盈虚交替；先摧毁这凄惨的生活，又随心所欲地治愈；无论贫贱与富贵，都如冰雪般融化消亡。可怕而虚无的命运之轮，你无情地转动，你恶毒凶残，捣毁所有的幸福和美好的企盼。

幸运女神和她那时而无情转动的“命运之轮”进入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象征主义，

从而进入了用于占卜的塔罗牌。比如，莎士比亚就很熟悉福尔图娜。最近我花了些时间来思考这位女神，因为她在莎剧《暴风雨》中占有重要地位。剧中的核心人物魔法师普洛斯彼罗——从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幸运女神的宠儿——十二年来一直运气不佳，被他那背信弃义的弟弟篡了位，坐着一艘漏水的船在海上漂流，最后困在一座岛上。若不是“福星”（请容许我引用原文）高照——这颗福星与幸运女神有关，按剧中的说法是“慈惠的天意眷顾着我”——他原本会被一直困在那里；正是在福星的影响之下，普洛斯彼罗的敌人被带到了他的魔法所及范围之内，而他制造出暴风雨的幻觉，由此拉开了这出大戏的帷幕。

我全然沉浸在这则素材中，因为——作为霍加斯莎士比亚项目的一部分——我在写一本改编自这部戏剧的现代小说，后来以《女巫的子孙》为题出版：书名即人们谩骂怪物卡列班的称呼之一。

这部戏剧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必须在我的小说中得到呈现——但我该如何处理“福星”与“慈惠的天意眷顾着我”呢？没有它们或者她，情节就无法展开，但在原剧中它们并不以角色面貌出现。我的解决办法是设置一个名叫埃丝黛的具有影响的女性人物，她戴着亮晶晶的珠宝首饰，举手投足无不闪耀——这就照顾到了“星星”的元素——而且常穿带有轮子、水果和花朵图案的衣物，因为福尔图娜的纹章是轮子与丰饶之角，那也正是你们希望福尔图娜能给你们带来的东西。由于埃丝黛在幕后推动，我的主人公的敌人才被带到了他的魔法所及范围之内。

在诸如马赛牌这类较为简单的塔罗牌中，命运之轮已经失去了它的女神，但在早期的维斯康蒂牌中，命运女神得以完整呈现。牌上的她转动着命运之轮，随着轮子的转动，人们从命运之轮左边升起（也就是命运女神的右边）。顶端显示的是暂时的幸运儿，头戴王冠，但其他曾身处顶端的人从命运女神的左边被抛下或在命运之轮底下遭到碾压。

这就是革命一词的由来。革命即是轮子的转动——底下的人爬到上面，上面的人遭到废黜。顺带一提，这种轮子的转动并不意味着平等，而主要是位置发生了变化，对一些人而言是幸事，对另一些人则是不幸。由于每一个人类象征符号都有其负面版本，轮子也成为中世纪一种特别恐怖的刑具，被称为……夺命轮。

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因此，不存在什么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如果所谓历史是指谁掌权和谁不掌权、谁赶上思想潮流而谁没有赶上的问题，因为这种历史并无哪一边可言。历史并非必然的线性发展。它并不始于《创世记》，一直发展到《启示录》，最后上帝之城出现，一切从此永远安好。人类权力和潮流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必然性：今天看似是历史的正确一边，明天很可能就变成历史的错误一边，但后天又变为历史的正确一边。

在小说创作当中，命运女神福尔图娜的位置被小说家取而代之了。由她或他来安排时间，转动命运之轮，将一些角色提升到幸福的境地，又废黜另一些人，甚至将他们杀死。也许小说中的时间总是车轮与道路的结合体：车轮旋转，爱情与生活的命运起伏不定，但车轮始终在路上行驶，时间也以线性方式前行。当你写一本小说时，你必须留神观察时钟与日历——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甲潜入暖房谋杀乙？但你也必须留意月亮，我们已经知道，它意味着幻觉。

命运好似月亮：盈虚交替。

我的第三张牌是正义，即天平。我选择它来代表小说的结局。

对于命运女神福尔图娜和她那善变的命运之轮，指望不上什么正义，但塔罗牌中确实有这样的概念，代表它的牌是天平，或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这又是一位罗马女神——你有时会在法庭外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她一手执剑，表示惩罚，另一只手拿着双臂天平，象征着权衡证据以作出公正的裁决。如你所料，正义女神受天秤座这一星象支配。有时正义女神会蒙上双眼，表明她不徇私情，无法收买。但在维斯康蒂塔罗牌中，她没有蒙住双眼，她洞悉一切。

正义女神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她就是这样上了塔罗牌，但她手上的双臂天平的历史则要久远得多。在古埃及，你死后会去往阴间，心脏被放到天平上，与代表义举的真理女神的羽毛进行衡量比较。如果你的心脏有欠缺，就会被丢给一只鳄鱼妖怪吞食。你可以把你的棺材里放入一个护身符来作弊——这也是书写的另一个功能——但长有鸵鸟头的透特神是文字之神，他很可能拿着写有你全部善恶行径的书面清单，就站在一旁。

在塔罗牌占卜中，如果你本身为人和善、行为公正，这张牌就意味着你会有积极的解决之道；如果不是，那你就需要注意了——因为有了天平，你怎么对待别人，命运也就会怎么对待你。这张牌的作用与命运之轮截然不同：是恰恰相反。这表示，存在某种道德模式，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张牌关注的不是进行中未决之事，比方小说的中段部分，它关注

的是结果，即化解与结局。

现在，卡牌的顺序展现了小说模式的形成。小说的开头是女教皇或大祭司，以及她的种种秘密与迹象；中间是命运之轮，铺陈出时间、事件以及人物不断变化的命运；结局是正义，或称之为天平，这时候人物得到他们应得的命运——我们希望如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当然是儿时的我们满心期许的，民间故事通常也乐于满足这一愿望。灰姑娘是个善良的角色，她的命运大为改善，原来是遇见了一位有钱人，他正好骑马路过，而且有恋鞋癖——好吧，这至少也比在柴火灰堆中打转要好；小红帽也从大灰狼魔掌下给救了出来。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小红帽变成了大灰狼的美味佳肴，我们会多么难过啊！

但亲爱的读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出人意料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小说的结局并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它们都没有那么简单。塔罗牌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牌——例如高塔，表示灾难；或者是“倒吊人”，它预示光明会到来，但前提是你要有一段时间被倒挂在树上；或者“魔术师”，如果你是艺术家，这是张好牌。我们可以想想，把其他这些卡牌作为小说创作的潜在指南是什么情形。

但无论我们选择什么牌，正义女神和她的天平总是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某个地方，就算没有告诉我们小说中的事件已经发展成它们应有的样子，至少也是在告诉我们它们该如何发展。一般来说，什么时候算公平，什么时候算不公平，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希望公平，但情况并不总是遂人愿。哎，这就是真实生活。或者在小说中，这就是真实生活的幻象。

现在是时候收起我这副卡牌，将它塞进我的魔术师外套的口袋里了。塔罗牌中的魔术师仅仅是个杂耍者吗？有时候是的。小说家也有他们的戏法。他们经常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但在更深的层面上，魔术师牌关乎积极的转变。我们希望小说也是如此。“你的书改变了我的人生”，人们经常这么对小说家说。这时，最好不要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是一个该由读者来回答的问题。

作家这下必须继续创作新的小说，于是回到起点——回到了大祭司牌与她新的一组秘密、迹象和直觉。和赫尔墨斯神一样，她是开门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很想知道，但面对一个故事，我们只能沿着命运之轮的路径——不断旋转，不停转动——进入森林去寻找答案。森林里一如既往地有狼，有起伏的命运，有幻象，不过最后可能会有一点正义。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坛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现居多伦多。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阿特伍德便以持久旺盛的创作力不给评论界任何淡忘她的机会。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多数重量级国际文学奖，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图为反疫苗接种运动代表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医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曾经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冷冽的气候率先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英国孕育了国际交流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但是，除此之外，英国也是疫苗恐慌的诞生与萌发之地。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三次。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19世纪是天花疫苗，一个世纪之后是百白破疫苗。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疫苗恐慌的对象换成了韦克菲尔德的目标：一开始只是麻腮风三联疫苗，后来则是任何一种能够让他获得掌声和金钱的疫苗。由于疫苗恐慌始于英国，我也应该让它终结于英国：给有关那篇《柳叶刀》论文的新闻调查下一个结论。毫无疑问，即使在我死后，也会有人记得那篇论文。

我坐上前往英格兰西北部默西赛德郡（Merseyside）的火车，拜访那12个孩子中的一个孩子的母亲。基于常见的保密原则，我将称呼她为三号女士。但是，她的孩子，也就是出现在论文表格一和表格二的三号孩子，其实是第一位被带到汉普斯特德进行疫苗研究的孩子。

三号孩子跟其他大部分孩子一样，也是被《新闻之夜》节目中的红衣女士弗莱彻介绍到皇家自由医院的。三号孩子唯一的肠道问题是严重便秘，他的血检结果很正常，病理学家也没有发现他有结肠炎。然而，在内窥镜检查中，三号女士看见了肿胀的腺体（她称其为“红斑”）。三个月后，三号孩子的病历记录被篡改了。医生尝试性地给三号孩子开了带有黑框警告的药物，并在《柳叶刀》论文中把他列入患有“综合征”的儿童之中。

在这十年中，这是我第三次前往三号女士的家。到达距伦敦200英里的利物浦，再搭乘20分钟的公交车，穿过工薪阶层居住的城市近郊，我最终来到了一栋两层的出租屋之外。这栋房子有金色的信箱、门牌和门环，跟这条街上的其他房子没太大的区别。特殊的地方是房子的后院，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这样的院子：一片修剪整齐的方形草坪，三面都有围栏，没有灌木丛，没有花坛，什么都没有。

三号女士身材纤细，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这次拜访她的时候，她已经58岁了。三号孩子是她的第二个儿子（他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已经29岁了，即将步入中年，早已不再住家中。

三号孩子是个黑发碧眼的帅气小伙。如果你在约会软件上看到这样一张笑脸，一定会觉得他在几分钟内就能找到约会对象。他有我所说的“利物浦相”，我觉得已故的“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就有这种面相。在我看来，这种面相似乎散发着一种你能在利物浦街头发现的神秘且怪异的智慧。

但是，三号孩子没有使用约会软件，也不能立刻跟人见面。他不能独自出行，只能牵着别人的手沿着默西河散步。“他可能在一分钟前还亲吻着你，不到半个小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们坐在客厅，三号女士对我说，“有时候我很害怕，会把自己关在花园里，因为我知道他打人的时候能有多狠。”

与三号孩子交谈也没有浪漫的色彩。他在两岁时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语言能力，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啃地毯，像着魔一样地在自己眼前轻弹手指。现在，他只能发出近似“是的”或“给我”的声响。他可以辨识出（但自己不会使用）代表“不”或者“不可以”的手势：他的母亲先交错双手，再放开，就像一个裁判示意进球无效那样。

“如果他希望某个人离开，就会打开前门，”在我第二次拜访三号女士时，她解释道，“如果他想喝茶，就会给我茶杯，或者在茶杯里面放入四个茶包，尝试自己泡茶……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倒水。水已经满了，他还会继续倒，让水溢得到处都是，这太危险了。”

他很危险，对其他人、对他自己来说都很危险。我最后一次拜访三号女士时，他已经不再回家了。更准确地说，他跟一群陌生人一起住在破旧的护理中心。在那里，他用头撞击窗玻璃，割伤自己的手腕，打坏了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子。即使服用三种不同的抗精神病药物，他的情绪依然像其他没有犯罪却要承受终身监禁的自闭症患者一样难以预测：前一分钟还在阳光中听着音乐，下一分钟就把某个人打伤。

“最能让他开心的事就是洗澡，”他的母亲告诉我，“他曾经在六个小时之内洗了12次澡。”

不是阿斯伯格综合征，也不是神经多样性。他的孤独表现差异太大了。他的症状并不是那些拿自闭症出来炫耀的人（他们把自闭症特质当作一种勋章，例如“我其实有点自闭”）所赞赏的“与众不同”，也不同于同性恋或者有些印第安血统的人。三号孩子的情况是某些家长所说的——借此表达他们的悲伤，外加一点批评——仿佛“火车失事”般的全谱系自闭症。

但是，三号孩子的困境是疫苗导致的吗？他的母亲毫不怀疑。在过去的25年，三号女士的说法始终如一：三号孩子满14个月时接种了麻腮风三联疫苗，接受注射后就立刻开始流鼻血，不到48个小时就开始发高烧，不到一周就出现了类似麻疹的红斑。从此以后，

## 非虚构

# “反疫苗运动之父” 与一场跨越世纪的医学骗局

布莱恩·迪尔 | 新书推荐

一位欺骗世界的“医生”  
与一名老派记者长达十余年的“猫鼠游戏”

《欺骗世界的医生》记录了“反疫苗运动之父”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针对麻腮风三联疫苗进行科研欺诈，引发全球性疫苗信任危机的全过程。1998年，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基于对12位儿童的研究，提出麻腮风三联疫苗中的麻疹病毒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这篇论文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和一系列的科研争议，引发了麻腮风三联疫苗全球接种率的大幅度下降，麻疹感染潮再次复苏。

2003年，《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布莱恩·迪尔经过详尽深入的调查，发现了潜藏在这篇论文背后的惊世骗局，曝光了韦克菲尔德及其借此牟利的同伙、律师理查德·巴尔之间的秘密交易。最终，论文被《柳叶刀》撤回，韦克菲尔德的行医执照也被吊销。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兴起，韦克菲尔德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迪尔对他的追踪还在持续。

经“万有引力”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第三十二章《因与果》分享给读者。



三号孩子开始在他的小床上前后摇晃，失去了语言能力，攻击性也越来越强。

三号孩子五岁的时候，一位神经学家给他做了诊断认为他患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和自闭症”但这位神经学家仍认为他的母亲错了。

病人的母亲非常伤心，她想要责备某个人或者某些事，并且也在〔为她的儿子〕寻找特殊的治疗方法。但很可惜，在这两方面我都帮不了她。

这位神经学家的看法与主流意见一致。发育儿科学的基础研究认为，自闭症症状首次出现或者被家长察觉的时间大约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同时，科学家们认为，麻疹疫苗中的病毒要在几天之后才能在皮下组织复制。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麻疹、腮腺炎和风疹都不太可能产生三号女士描述的突发性影响。

同样，流行病学家也倾向于对三号女士这种类型的家长“轶事”表示怀疑。韦克菲尔德在那篇《柳叶刀》论文中想要用伪造的图表证明的核心主张认为麻腮风三联疫苗是造成自闭症的主要原因，许多国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都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支持这种主张的证据。来自芬兰和丹麦的两篇论文各自分析了超过 50 万名儿童的记录，结论是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日本横滨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麻腮风三联疫苗暂停接种的一段时间里，自闭症的诊断人数依然在持续增加。

在韦克菲尔德推动反疫苗运动之时，家长和医学界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媒体用“家长与科学的对决”来描述这一现象。一个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研究团队发现，当麻腮风三联疫苗的接种人数“显著减少”的时候，广泛性发育障碍的诊断人数却出现“显著的增加”。波兰克拉科夫 (Krakow) 的一个医生团队在比较了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和接种单一疫苗的儿童在发育和智商成长方面的情况后，也报告说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差异。

但是，大数据研究所解释的是整体性的结果，而不是像三号孩子这样的个案。或许，这些个案的数量太过于稀少，以至于被完全忽略，没有被纳入流行病学的研究。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三号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男性——有一种独特的生物学特质，或者他接种疫苗后身体会出现非常短暂的脆弱期？事实上，所有有效的药物都有可能对某些人体造成伤害。正如三号女士的回忆，家长们提出的轶事中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孩子在接种三联疫苗不久之后发烧。

那天晚上，他焦躁不安，还发了高烧，医生给他服用了泰诺……隔天他醒来后就不能走了，也不能爬，只是不停地打自己的脸和耳朵。

两天后他突然发起高烧，烧到了 40 摄氏度。在那之前，他一直是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会大笑、制造噪声、试图翻身。接种疫苗后，那个正常的孩子就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这样的观察并非家长与科学的对决，而是被严密的科学研究所证实的疫苗反应。芬兰开展了一项针对双胞胎的研究，根据这项研究的统计，接种疫苗后发烧的概率高到惊人。这篇论文在 1986 年 4 月发表在《柳叶刀》上，作者是赫尔辛基的儿科专家海基·佩尔托拉 (Heikki Peltola) 和流行病学家奥利·海诺宁 (Olli Heinonen)。他们设计了非常精妙的安慰剂对照双盲实验，研究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之后产生的直接反应。

在佩尔托拉和海诺宁的研究中，每对双胞胎都会被分开，每个孩子都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中的一组。第一组的孩子先接种疫苗，三个星期后再注射安慰剂；第二组的孩子则是先注射安慰剂，三个星期后再接种疫苗。他们分析了 581 对双胞胎的数据，以表格的方式记录“接种疫苗后的每日反应”。分析结果显示有很多孩子在接种疫苗后发烧。

在表格中的第一天至第六天（三号孩子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症状的），芬兰研究人员的统计结果显示，儿童在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之后出现“低烧”的比例是 163%，“中度”发烧的比例则是 8%，而“高烧”的比例则是 1%，难怪许多自闭症儿童的家长都会说孩子在接种疫苗后发烧。

但是，芬兰人研究的卓越之处在于对双胞胎儿童注射安慰剂之后的体温进行对比。注射安慰剂之后，出现低烧的比例减少了 1%，中度发烧的比例同样减少了 1%，而发高烧的比例则完全一样。因此，疫苗引起儿童立刻发烧的可能性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接种疫苗之后会出现偶发的发烧反应——在十天中达到峰值。但是，总体而言，疫苗的副作用很罕见。“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接种广泛使用的麻腮风三联疫苗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比以前所认为的要少得多。”佩尔托拉和海诺宁这样评论道。

即便如此，他们的研究也无法证明三号女士的说法是错的。但是，只有家长提出的轶

事是不够的。韦克菲尔德、汤米、毕格崔和其他反疫苗运动人士躲藏在轶事之后，反对医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生动地描述可怕的故事，并且主张家长有权自证他们是疫苗的受害者，而这种主张所依赖的原则就是：母亲当然知道孩子的状况。

“如果一万个人都有相同的说法——万个母亲——轶事最后就会成为科学，”律师罗伯特·肯尼迪在亚特兰大的反疫苗示威运动中提出这个观点，“这些母亲知道她们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们知道孩子究竟怎么了。”

我想，那就是我踏入疫苗争议领域的机缘。到现在为止，我研究这个议题已经很多年了。1996 年 9 月，二号女士告诉皇家自由医院的儿科医生，她的儿子在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的两个星期后出现撞击头部的行为，但她在那时知道是麻疹导致的自闭症吗？或者她是在 2003 年 11 月才知道的？那个时候，她告诉我，孩子出现症状的时间“大约是在六个月之后”。2001 年 11 月，二号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她在那个时候真的知道吗？

二号女士起诉了一家制药公司，她的律师团队希望达成和解赔偿。但是，大型制药商很少会悄无声息地让步。根据另一位参加集体诉讼的家长给我的法律文件，二号女士接受了其中一位被告史克必成提出的条件。在二号孩子的医疗记录中，没有任何症状与自闭症有关，在接种疫苗的九个月内，二号孩子也没有出现任何“新型综合征”的迹象。

事实证明，接种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关联性”。二号女士的证据只剩下约翰·奥利里的麻疹病毒检验结果。她通过律师团队提出了让步，而这次让步会让所有清醒的人有所察觉。“索赔人认为，”二号女士在英格兰皇家司法院表示：“自闭症谱系障碍和肠道疾病的症状不一定会在接种疫苗的数天或数个星期之内出现。”

索赔人提出的主张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症状发生在接种疫苗之后，而非接种疫苗之前。

这就是预警案例在法庭上呈现出的力度，而韦克菲尔德曾说二号孩子“明显受到了疫苗的伤害”。而且，随着六号女士的轶事被揭开，我们就会发现二号女士不是唯一在回忆中寻找幻景的人，六号女士（声称她的孩子发出“高音调尖叫”）让她的两个孩子参与了皇家自由医院的研究，并招募了另一个孩子加入。在我的调查报道发表之前，都没人知道在《柳叶刀》论文的 12 位儿童中，有三人与六号女士有关，而在论文中被列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中，有四人与六号女士有关。

在医疗保密的绝妙帷幕之后，六号女士从一开始就引发了质疑。各位专家非常怀疑她提出的各种断言，以至于儿科专家西蒙·默奇离开伦敦，赶了 60 英里的路，去与当地的诊所医生见面。社工人员曾经考虑将六号女士的两个孩子列入“处境危险”的名单。一个独立的律师调查委员会审核巴尔集体诉讼案的结案材料之后认为，六号女士的两个孩子都没有足以控告任何人的医疗问题。

“她让人摸不着头脑，六号女士的家庭医生告诉英国医学总会的评审委员会每一次会诊，她都会提出不同的说法。”

二号女士和六号女士都是与韦克菲尔德关系紧密的追随者。她们和韦克菲尔德一起工作，一起推动反疫苗运动，竭尽所能阻挠我的调查。而且，在韦克菲尔德的人际圈中，还有一个人跟六号女士极为亲近，她就是十号女士，一位极度张扬的说谎者。十号女士原本不在最初 12 位儿童的家长之列，但她依然把自己的儿子带到皇家自由医院接受内窥镜检查，并加入了巴尔的集体诉讼。她经常出庭作证，也参加了尤斯顿路的听证会。

“他拯救了我们的孩子，”她在听证会上大喊，“韦克菲尔德医生拯救了我们的孩子。韦克菲尔德医生和他的同事拯救了我们的孩子。韦克菲尔德医生拯救了我们的孩子。”

唯一的麻烦就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医疗记录，许多支持韦克菲尔德的母亲最终都会发现，那些医疗记录中的真相只会让她们沮丧。十号女士声称她的儿子在 18 个月大时接种了麻腮风三联疫苗，然后就开始发烧，并且“立刻”失去了语言能力和用眼神交流的能力。她说她的孩子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了长达六个小时的痉挛和呕吐，然后在六个月里陷入“持续的植物人状态”。

但是，经过缜密严格的审查之后，法官并未采信十号女士提出说法，甚至用了一个律师团队不太喜欢的词语“捏造”。“这个案例中的关键事实可以这样总结，”法官裁决道，“〔十号孩子〕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自闭症是因为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引起的。他的父母所描述的不良反应是捏造的。”

他的家长捏造了不良反应，为什么捏造？这很好理解：如果一个人能够用欺诈的方式成为百万富翁，骗取政府或者制药公司的金钱，而且可以确定即使遭遇失败也不会受到批评，更不可能入狱坐牢，他会尝试一下吗？难道不会吗？而且他不必面对发育障碍的孩子——不必面对发育障碍孩子父母所要面对的所有混乱、担忧和脑力劳动——只需要在

回忆时搞错少许事实，这会不会影响他的道德决策？

这是对人性的严峻考验。为了获得赔偿，人们会不会刻意踩刹车，让后方来车撞击自己的车尾？人们会不会在享受海洋游艇的餐点之后假装肠胃不适？人们会不会假装自己遭遇了恐怖袭击？如果韦克菲尔德说服那些家长相信这些事情背后有一个阴谋——一个由制药公司、徇私舞弊的医生、说谎的科学家和“被收买”的新闻记者共同参与的阴谋，在这样一个不公正的情况下，家长说谎是一种犯罪吗？

当然，这很难在道德上做出判断。

但是，上述令人悲伤的想法与三号女士内心的想法相去甚远。我从来没有觉得三号女士说了谎。如果家长目睹了孩子接种疫苗后发生的变化，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又听到魅力十足的韦克菲尔德抛出的答案，他们为什么不会相信？三号女士是一个正直的人——正如其他许许多多的家长，但是，行为是否正直并不能决定他们的观点的对错与否。

这些年来，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们的说法经常会发生改变。人类的记忆会衰退，过去的故事变得遥远，回忆也会变得凌乱，就像实验室中的基因经过太多次检验循环就极易产生错误一样。于是，在某些情况下，更多的信息浮现之后，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

以韦克菲尔德的特殊友人波莉·汤米为例，她声称她的儿子比利因为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而受到伤害，在2016年与韦克菲尔德一同在全美巡回演讲时指责医生杀害了人们的孩子。在《疫苗黑幕》这部电影中，波莉和她的丈夫乔纳森声称，他们的儿子比利在13个月大的时候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当天开始出现“无法控制的颤抖”，并伴有发烧，而且“再也没有真正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或许波莉和乔纳森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在17年前，当他们夫妇二人在英国的电视频道上推广一种从猪的体内提取的激素用于治疗自闭症时，他们的说法明显发生了变化。那次的版本是：比利满九个月之前，所有的情况都“很不错”，直到九个月大时比利的发育才开始出现衰退。“我们当时认为，比利的语言能力发展较慢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听不见，”他的父亲在电视节目上表示（没有提到疫苗或痉挛），“每个人都说：‘比利不能讲话的原因是他有胶耳问题，如果听不见，自然就没有办法说话。’”

比利听不见？在自闭症的早期症状中，一个常见的判断错误就是以为孩子听不见。在汤米夫妇提出这两种说法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信息让我对他们产生了怀疑。2010年2月，我接到汤米家的一位密友打来的电话，此人通过《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新闻总台联系了我。

“波莉·汤米真的有坐下来，”我在电话中（这次通话有录音记录）询问此人，“仔细查看过她儿子的医疗记录吗？”

“有，有，当然有。”这位友人回答。

“她依然相信是麻腮风三联疫苗造成了自闭症吗？”

“不，不，不，她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这位友人的回答并没有让我感觉意外。我经常发现，时间会改变家长口中的故事，例如另一位韦克菲尔德的仰慕者——演员詹妮·麦卡锡——对她儿子的感受。詹妮·麦卡锡在书中和电视上都宣称她的儿子是麻腮风三联疫苗的受害者。但是，小男孩的外祖母后来告诉居住在密尔沃基的作家肯·赖贝尔（Ken Reibel），詹妮·麦卡锡在她儿子接种疫苗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儿子有典型的自闭症症状。

外祖母的说法是接种疫苗之前，那么，有没有可能男孩的症状与疫苗毫无关系？我可能还接触过这样的案例，那就是JABS团体的发起者杰姬·弗莱彻。弗莱彻让韦克菲尔德和二号女士相遇，在巴尔刚开始筹备集体诉讼案时就率先加入，《柳叶刀》论文列出的12位儿童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她介绍来的。多年来，她的儿子都是“因麻腮风三联疫苗而受到伤害”的典型代表。

但是，档案记录再一次道出了真相。这次是法律文件加上美国政府疫苗不良反应回报系统(Vaccine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的记录（这是一位母亲提醒我注意的）。弗莱彻将儿子出现发热惊厥的原因与麻腮风三联疫苗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指出疫苗的生产批次号为G0839，声称就是这个批次的疫苗给她的孩子造成了伤害。但是，医生认为小男孩的惊厥是胸腔感染引发的症状，而根据制药商的信息，G0839这个批次的疫苗实际上是破伤风疫苗；检验结果也显示，她儿子的免疫系统并未产生麻疹、腮腺炎或风疹病毒的抗体，但确实有少量破伤风梭菌的抗体。

时间会让记忆模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经常发现，越是哭天喊地的家长，他们提出的故事越是经不起严格的调查核实。我猜想，当律师们发现他们的标准案件（比如二

号孩子和米歇尔·塞迪略）的证据不堪一击时，必定也有相似的感受。

三号女士没有参加过反疫苗运动，我也没有在媒体上看过她。虽然她没有在Facebook上大发雷霆或在街头咆哮，但只要是为儿子好，她依然是一位无可阻挡的“圣战士”。她会为了让医生调整并重新评估孩子的药物而争论，会在儿子放在房间里的衣物被人偷走时表达抗议，会为了关闭最糟糕的护理中心而竭力抗争。如果没有三号女士，谁知道三号孩子如今会是什么样？

我第三次拜访三号女士时，我们讨论的重点就是三号孩子步入成年后的人生。但上次我在她家的客厅，跟三号女士和她的丈夫三号先生（曾经当过叉车司机）所谈的，更多的是关于麻腮风三联疫苗的问题。

“你们真的相信，”我想着韦克菲尔德最恶劣的主张，“医生和政府工作人员都知道麻腮风三联疫苗是导致你们儿子生病的原因，并且掩盖了真相？”

“我相信。”三号女士说。

“我不信，”三号先生说，“我不相信。”

“我相信。”她重复说了一次，而且她真的相信。

这个话题很快就过去了，但三号孩子的父亲还说了一些话，暗示他有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只是很脆弱，”他说，“我们想要找到答案。”

谁不想找到答案呢？

但是，三号女士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最后一次见面时，她很明确地告诉我。她“以前不信麻腮风三联疫苗”，现在“依然不相信疫苗”。她仍相信韦克菲尔德十几年前在皇家自由医院中庭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主张。

“我发自内心地相信，”她遵循着韦克菲尔德关于接种三联疫苗的建议，“让小孩分开接种疫苗是比较好的方法。”

但即使是三号女士，也没有全盘接受韦克菲尔德的主张。她并不相信韦克菲尔德最核心的主张。三号女士认为，导致她儿子患病的元凶不是三联疫苗中的麻疹病毒。

“我始终认为是风疹病毒。”她说。



布莱恩·迪尔

英国调查记者，凭借为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调查制药产业、医学和社会议题而闻名。他三次获得英国新闻奖（British Press Award）的提名，两次获得年度专业领域记者奖项，并入围年度记者的决选名单。他曾居住在纽约、旧金山和亚特兰大，现居伦敦。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犬之力》(2021)剧照

## 非虚构

# 喜欢追星的妈妈们，到底冒犯了谁？ 塔比瑟·卡万 | 新书推荐

“你可以永远热爱，也可以随时抛弃。”

当一个被生活围剿的中年女性决定追星：从尴尬羞愧到无所畏惧，她看到在热爱中轻盈自在的自己，确认自己拥有享受快乐的能力。她卸下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的精神镣铐，感受追星时每个毛孔的张开，尝试梳理自己的欲求。一个关心自身愉悦感的女性不会再等待、不愿被赋予，只想要担任主动的角色，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首位。这是追星教会她的事情。

在《我要快乐！》中，作者塔比瑟采访数位中年追星的女性，与她们交流体内流淌的动能，收获关于追星的各种故事。她们中有写同人文的教授、上市公司副总裁、研究雌鸟鸣叫的教授……尽管她们最开始追星的原因或许不同，现在的她们都如此快乐。

“妈妈疯狂应援男明星，我该不该阻拦值得讨论；‘妈妈应援男明星，我为什么会觉得不适’更值得思考。

以下经“野望”授权发布。



在俄亥俄州，有一家墙上贴满本尼照片的美甲店。

一切是如何开始的，真的重要吗？（“我对着电视随便换台，想找点可看的东西。”）之

后发生了什么，重要吗？（“本尼出现，我惊呼：‘天哪，这个人有点怪，他看起来真的很奇怪！’下一秒我就爱上了他。”）发生的原因，重要吗？（“因为他专注的神态，身上的能量，还有使用的词汇。”）莱亚开始明白，原来事情不一定非得是这样。如果缺失了什么，如果生活中有一个洞，你可以去填补它。而对莱亚来说，这个洞的形状恰好和本尼一模一样。

“我说服自己相信‘本该如此’那一套。然后本尼出现了，我意识到不一定非得这样。他唤醒我，填满我的想象。听起来很傻，但他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让我走上了一条不再为自己感到抱歉的路。一开始只是一些很小的改变，后来我因为他去了伦敦！我从来没有出过国，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

莱亚和我说，她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看了本尼扮演的哈姆雷特，而且看了两次（“太震撼了！”），后来甚至在舞台门口遇见他（“他就在那儿！”）。我从未离本尼那么近，所以我问了莱亚很多问题。她告诉我，和本尼面对面站在一起时，她涌起一股冲动，想伸手摸摸他的脸颊。“我对自己说不，想都别想！但他的脸颊就在我眼前，看上去那么柔软。”她为自己用那种眼光看着他而感到愧疚。（这种负罪感完全是另一码事，后面我们会谈到。）紧接着，他们对视，她看着他说出自己的感谢。谢谢他的存在，谢谢他让自己快乐起来。之后，莱亚前往洛杉矶参加《神探夏洛克》粉丝见面会。她遇到了本尼的母亲，女演员万达文瑟姆（Wanda Ventham），并送给她一把专业的指甲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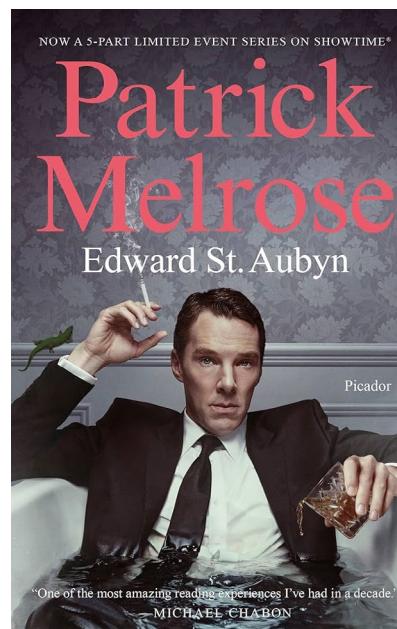
让我们回到美甲店。莱亚的客人并不知道这个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到底是谁。“她们不看PBS，甚至不知道BBC是什么，但都知道我喜欢本尼，会买各种各样的周边给我。”美甲店里的照片墙是从客人送给她的本尼日历开始的。“我正琢磨应该把日历放在哪里，一位客人说‘挂到墙上！我也想看看’。”

那些照片现在更像是提醒，不仅对她，也对那些客人。“除了做指甲，你应该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你应该沉浸在那些让你精神焕发、让你开怀大笑、让你产生各种感受的事情中。”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人们值得好好放纵一下。我真希望她们能做更多的事情。我对她们说，出去走走！随便做点什么！去感受！任何事情都行！”

同事曾看着我摆满本尼照片的办公桌，以为那是某种反讽。下面这幅画面的确有些庸俗：几位老年女性坐在一家乡下美甲店里，周围布满世界上最性感男人的画报（这一头衔已被无数投票结果证实）。当我听着莱亚的诉说，心中想的是：任何人都不会误认为这是反讽。这更像是一次激进的、颠覆性的反抗。

我问莱亚，她是否对自己用这种方式花费时间而感到愧疚。“起初，我觉得自己很傻，我都这把年纪了。”她说，“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你不应该这么做，爱上一个年轻男人，盯着他的照片，收集他的DVD，读和他有关的任何东西。你这个年纪不应该把这么多时间花在这么不成熟的事情上。年轻女孩才有资格这么做。后来，我遇到了一群人，她们丝毫不畏惧分享自己的感受。而她们的感受竟然和我一样，这让我很惊讶，直到那时我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妥。突然之间，我发现六十多岁或七十岁出头的女性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都在思考和感受同样的事情。”

现在，她的负罪感已经烟消云散。“世界上有很多男人围着高尔夫球生活，他们可不会感到愧疚。”



《梅尔罗斯》

不知道你是否在图书馆借的书里发现过小纸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能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即使只是一张用作书签的旧购物清单，你也会以这种方式与另一个人建立联结。那个人曾手捧同一本书，和你读同样的文字。原本的陌生人离变成“像我一样的人”又近了一步。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图书馆。那里有两本本尼迪克特的传记；两本用本尼照片做封面的小说《梅尔罗斯》(Patrick Melrose) 和《队列之末》(Parade's End)；有一本《神探夏洛克》的大开本精装画册，里面有幕后花絮和制作故事。当然，图书馆还有很多与本尼无关的书。图书馆每周都会为孩子们举办故事角，伴着《咯咯笑，扭扭腰》里的儿歌讲故事。

有一次，我把正在“咯咯笑，扭扭腰”的孩子们丢在一旁，偷偷走到一边，翻开那本画册。书真的很美，很多照片展现了我最喜欢的本尼的一面：不在演戏但依然打扮成角色的样子，候场时在喝咖啡或做发型。我很爱这些照片，从中可以看到两个本尼的存在——真实的他和他所饰演的角色，魅力倍增。当我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时，它刚好掉下来，翻开在我的手中我看到一幅跨页的福尔摩斯照片他正从巴茨医院的屋顶上跳下来，围巾随风飘扬。

那一页夹着一张黄色的纸条。我睁大双眼，纸条上用黑色墨水笔写着一个网址，以及一个邀请：“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夏洛克吧！（还有很多本尼迪克特的美照。）”我不只咯咯笑，扭扭腰，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差点跌倒。

我抬起头，仔细打量周围的人。一个老人正拿着放大镜读中文报纸；一个十几岁女孩跷着二郎腿坐在正在充电的手机旁；很多比我称职的母亲，她们正伴着《可爱的小蜘蛛》做动作——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留下这张纸条，都可能是“像我一样的人”，而且是在堪培拉！我急忙合上书，把它放进要借的那堆书里——几乎全是关于挖掘机的图画书。后来，《咯咯笑，扭扭腰》余下的环节比以往显得更加漫长。

回到家，我把借来的书放在厨房凳子上，让孩子们去玩橡皮泥——“想弄多乱，就弄多乱！”——然后在电脑上输入那串网址，这是找出谁留下纸条的第一步。那是一个老式论坛，我不知道在社交媒体时代还存在这种论坛，而且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正如纸条上所写的，她们在上面分享自己找到的照片，讨论《神探夏洛克》的每一帧每一秒，讨论本尼其他作品的细节，以及他的肉体。论坛上有一个版块可以做自我介绍，作为一部曾在网飞(Netflix)全球收视率排名最高的电视剧，《神探夏洛克》的粉丝遍布性别光谱的每一个点，但在这个论坛上我只看到了女性。很多论坛成员都说，她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理解她们的痴迷，或者她们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论坛上有很多三十岁以上的女性，甚至还有很多五十岁以上的女性。一位女士说，她最近穿着《神探夏洛克》的T恤参加了一场活动，希望能在聊天中开启话题，但“没有任何人说任何相关的事”。

论坛人员的组成本该多元，但所有人看上去都一样，这让我感到不安。论坛采用的是千禧年互联网风格在无法辨认的背景上使用刺眼的彩色字体，很难让人停留有一个帖子，专用来分享和他有关的梦想（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用“他”这个代词，无须进一步解释），她们在那里尽情展示自己的潜意识。这个论坛似乎是人们已经完全放弃自我管理和自我要求的地方——那种实在无处可去的时候才会去的地方。

我试着想象了一下自己加入其中的样子，宣布自己发现了一张纸条，挥舞着它去领奖品——写纸条的人。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游乐园那些挂在墙上填充过度的玩偶。这些玩偶与其说是游戏的奖励，不如说是获胜的风险。你真的想带这样的东西回家吗？什么样的人会试图通过藏在图书馆书里的秘密纸条来和人交流呢？

也许论坛上的那些女性觉得自己能隐匿在网络的暗处，但即使在这里，她们也早已暴露无遗。我相信她们比我更清楚亮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有多么可怕，多么不讨喜。有些事注定要藏起来。我合上笔记本电脑，感觉比以前更孤独了。我在孩子身旁坐下，用蓝色橡皮泥捏出本尼奇怪的头，又用手掌搓出几缕卷发。



电视剧《神探夏洛克》剧照

“她们竟然叫自己‘康伯婊’(Cumberbitches)！”每一个曾报道过本尼的记者都大惊小怪地写道，仿佛这个昵称刚刚才通过他们的独家深度报道被大众所知。谁能怪他们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在2010年，推特账号@Cumberbitches连同它的个性签名一起永垂不朽：“想要康伯的爱，就把你们的胸部抛向空中吧。”

这个名字的确富有争议。就连本尼本人也担心这个名字“让女性主义倒退了很多步”。这个名字的确让他有些为难。只有当某人主动选择把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时，这个词所带有的负面含义才会消解。因此即使他的粉丝可以自称康伯婊，他本人也不能这么称呼她们。记者总是问相关的问题，令他十分尴尬。在过去十年中，粉丝们试图为自己取更具包容性，当然也更无趣的名字，比如“康伯集合”(Cumbercollective)、“康伯人”(Cumberpeople)、“康伯饼干”(Cumbercookies)、“康伯社群”(Cumbercommunity)、“康伯兔子”(Cumberbunnies)、“康伯宝贝”(Cumberbabes)和“本尼瘾君子”(Benaddicts)，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康伯婊”。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并不觉得它冒犯到我，一直在使用。如果你和我的感受不同，请允许我提前向你道歉，也请允许我向女性主义道歉。但我真的觉得这没什么。

如果你爱过本尼，一定知道这些“康伯婊”的存在。即使你不是他的粉丝也该有所耳闻。她们是他的“像患有狂犬病般疯狂的女粉丝”。从我最早开始在谷歌上搜索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还不太确定如何正确拼写他的名字时，我就知道有这样一群人了。在他参加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中，你会听到她们的欢呼声。当他走红地毯时，她们挤着要签名或与他自拍，大声喊“我们爱你，本”（本！），制造噪声，像真的得了狂犬病一样。

你可能会认为当我发现“康伯婊”的存在时，我松了一口气，甚至会为能与志同道合的人产生联结而激动不已。但事实并非如此，“康伯婊”并没有让我在对本尼的狂热迷恋中感觉不那么怪异孤独。实际上，她们让我感觉更糟。她们的存在是一个警示，只会诱发更多焦虑。那时我的自我认同处于撕裂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无法理解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我不是她们。

还记得那个在《新音乐快递》抨击模糊乐队演唱会现场的女歌迷的家伙吗？快进几十年，本尼迪克特出现在《泰晤士报》上，为《星际迷航：暗黑无界》的首映做宣传。在人物侧写中，我们见到一位《星际迷航》的骨灰级粉丝，她在红毯上等待着，被一群“康伯婊”所包围。“这些人不是为《星际迷航》而来的，”她说，用憎恨的目光扫视那些欢呼的粉丝，“她们连《星际迷航》是什么都不知道。她们只是为他而来。”她向康伯巴奇做出大拇指朝下的手势。”

我不想被人群中的一位“迷航者”所鄙视，也不想成为大拇指朝下手势的目标。二十五年前我不想成为“演唱会上的女孩”，现在作为一位成熟女性，我也不想成为一位“康伯婊”。谁想呢？“康伯婊”是我内心恐惧的公众形象（public face）。她们的存在将我内心的恐惧公布于众。她们是活生生的例证，爱上名人是一件多么尴尬、多么不成熟的事。看看她们的样子吧！至少我有足够的自我厌恶——哦，抱歉，我的意思是自尊——来隐藏自己的感情，并维持自己是一个正常人的幻觉。这样做会让我觉得自己与她们不同。

当一群女人或女孩爱上某件事物时，她们的人数越多，她们的情感就显得越愚蠢，越令人尴尬。你可以想象一张图表，一位女性爱上本尼，如果这件事具有讽刺意味，那么需要多少女性加入，她们的行为会开始变得愚蠢？三个？四个？从那一刻开始，你会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康伯婊”？

我不知道该举些什么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哪个以女性为主的群体最容易受到鄙夷？李斯特狂热者、“披头士”狂热者、喜欢《暮光之城》系列的妈妈们、Pinterest妈妈、贾斯汀比伯的死忠粉、“单向”乐队的超级粉丝、电视剧《古战场传奇》的粉丝、“防弹少年团”的粉丝团阿米、浪漫小说作家、《五十度灰》的读者、《美食、祈祷、恋爱》的爱好者、真人秀爱好者、爱穿粉色的学龄前儿童，以及“康伯婊”。尽管这些群体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任何与她们沾边的事物都会被贬低。

男子组合的年轻女性粉丝是重灾区。她们“思想不纯，品行不端”，乐评人安雯·克劳福德写道，人们默认“她们不懂得如何聆听音乐”。“她们渴望，她们寻求。无数女孩注视着男团偶像漂亮的脸蛋，让偶像和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她还注解道：“你可能注意到了，我不假思索地用‘漂亮’这个形容词，这是因为男音乐家被女粉丝‘女性化’了。除非生来就是女性，谁会想变得女性化？”“模糊”乐队很懂这一点！

在那篇关于“演唱会上的女孩”的评论发表后不久，他们一改以往阴柔的流行音乐风格，转而追求“成熟高级”的音乐和形象。贝斯手亚历克斯·詹姆斯后来将他们与青少年女性粉丝群体保持距离的决定描述为“一次壮举”。



《纽约》杂志

当很多女性爱上某件事物时，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就够了。就连她们自己似乎也不必深入探索。你几乎可以立即从下面的清单中提取信息，勾勒出她们的群像：女粉丝的尖叫声淹没舞台上的乐队；指甲修剪整齐的家庭主妇沉浸地阅读 Kindle 上的浪漫小说；本尼迪克特为《纽约》杂志拍摄的一组题为“本尼迪克特与康伯娘”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里，他疲惫地瘫坐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女粉丝挤在车窗上，黑压压一片。另一张照片里，他正逃离同一批女粉丝的“追捕”，她们朝他伸出手臂，像极了一群僵尸。你觉得看到那些照片的我会骄傲地想“啊，是的，她们和我是同一类人”吗？

从青春期开始，我就知道要和这种女孩或女人保持距离，否则她们会像旋涡一样把你吸进去。她们会伸直手臂紧紧攥住你，让你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你会像“披头士”狂热者一样被困在时间里、被定格在黑白照片中，你时刻张着扭曲变形的嘴巴，你的手永远抓着自己的脸颊。

这一切的开始其实非常单纯，你可能只是想拥有一种美好的感受，但正因如此，你需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如果某件事让你感觉很好——更糟的是，让你感觉好过了头——其他女孩也会想要加入，然后你们就会不可避免地一起奔向糟糕的结局。“2万张大张的嘴、成百上千双迷离的眼睛、4万只高高举着的手。”这是《GQ》杂志对“单向”乐队演唱会现场的描绘。那是一摊“深粉色的浮油，随着偶像每一次顽皮的顶胯而嚎叫、呻吟、起伏”。怎么会有人自愿成为无意识的凝固污渍，如果可以“不与那些女孩为伍”？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选择。

布勒内·布朗可能会认为，我一看到“康伯娘”就浑身不适的原因并不是尴尬，而是羞耻。她们将自己暴露于易受攻击的环境中，任人嘲笑。她们让自己被看到，也让我感觉良好。我假装自己比她们更冷静，但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在害怕。我害怕被看见。布朗说，我们中的很多人“必须好好想想什么叫真正的酷”。

我只知道布朗对此会说什么，因为我最好的朋友读了她所有的书，并愿意和我分享。而我甚至羞于购买那些自助类图书。我觉得自己和其他中年女性不一样。



我再次打开笔记本电脑，回到那个论坛。这个举动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希望自己承认论坛上的粉丝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的不安。但现实并非如此。你真的认为这是那种轻易克服自我的故事吗？哈，不！只是我必须问一问纸条的事。我无法不去想它。我意外获得一张“金奖券”，却无法向任何人炫耀，因为生活中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借书是为了看本尼的照片。除了那个论坛，我无处可去。我开始打字：“我偶然间拿到这张纸条……”她们真情实感地为我感到高兴，和我一样开心。

我为什么准备与留下纸条的人见面，在现实世界中与现实的“康伯娘”交流？只要我眯起眼睛看待这件事，它几乎等同于两个正常人的初会，而非粉丝聚会。而且只有她一个人，我估计旋涡的力量不足以把我卷入其中。决定见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在这里。堪培拉是一座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如果在谷歌输入“堪培拉是……”，谷歌会自动填充——“堪培拉是一座城市吗？”（略不礼貌）和“堪培拉无聊吗？”（不，是一潭死水）。当堪培拉真的发生了什么，即使非常偶然，那么，该死的，去凑凑热闹吧。当年一只猛鹰——基本上就是一只大猫头鹰——在某个公园短期居住时，堪培拉一半的人都跑到那里，探着身子，抻长脖子，盯着那棵树。这件事当然是新闻热点。有人从图书馆借那本《神探夏洛克》画册足够令堪培拉惊讶了。这片土地上有两个人同时喜欢本尼迪克特，如此罕见的事至少能上头条。就像跑去观看猫头鹰的人一样，我也必须见见这位粉丝。终于有些事情发生了。

此外，我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没有人会知道。



工作午休时间，我骑车去一家花园咖啡馆见杰德。那天是周五，几乎每张桌子都坐满

年纪稍长的女人们，她们的笑容似乎夹杂着阴谋和愤怒——她们把头凑得很近，然后又迅速散开，我总会联想到妈妈读书俱乐部。

我知道杰德的样子，在我们的秘密中——从纸条到论坛，再到邮件，最后到这里——我们交换了照片。我相信她一定非常仔细地看了我的照片，就像我看她一样。她的照片是一张她和家人最近去东南亚旅行时拍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她身材娇小，看起来很温柔，脸上带着紧张的笑容，或许她不喜欢被拍照，或许她只是累了，花了两周的时间在东南亚哄孩子。两个原因或许都有。在咖啡馆，我们有些局促地打了个招呼，还开玩笑说我们像在相亲。

见面之后，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她四十岁左右，已婚，有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在海外生活了几年，后来定居堪培拉，然后产生了很多困惑，自从辞掉工作成为全职妈妈，她就被困住了。但这些相似之处不是我们一见如故的原因。

正午刺眼的阳光下，我们傻笑着，像在女生之夜喝得醉醺醺的老朋友一样。杰德是第一个让我用自己想要的方式谈论本尼的人——滔滔不绝地、详尽细致地、情绪饱满地。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这本书里已经写了很多与本尼有关的事，但其实连一半都不到。（这提醒了我——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附录，是完全关于本尼的？也许我应该早点提到。）

杰德告诉我，她留下那张纸条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论坛。在《神探夏洛克》下一季更新前的空档，夏洛克粉丝圈因漫长的等待而陷入沉寂。她完全没有料到那张纸条会促成一次现实世界中的相遇。杰德忙于家庭生活，陷入社会孤立之中，因无法重回职场而感到沮丧。她在网上表达自我，论坛对她来说如同家一般的存在。在本尼粉丝圈里，她分享自己创作的故事和绘画，以及搜集到的与本尼有关的新项目、新作品。杰德非常擅长搜集信息，这项技能是粉圈的硬通货。我的朋友和家人经常把他们在网上看到的有关本尼的消息发给我。可笑的是，他们以为我还没看过。我向你保证，这本书出版后一定有人跑来告诉我，好像我连这个都不知道似的。但杰德不一样，她分享我从未看过的资讯。我不禁感叹竟然还能从这种地方获取信息，我甚至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也没想到竟然还能从这些联系中挖出新东西。

一意孤行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坏事、一种缺点，但狭窄的出口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所有能量都会向一个点汇聚。也许这是件坏事，但在我和杰德交谈过程中，我觉得这绝对是件好事。如果你站在咖啡桌旁，俯身听我们的对话，可能会觉得内容浅薄单一，只围绕某位演员展开。但和她聊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完整、更全面。（很抱歉，孩子们，但这是实话！）那种感觉就像我身体内部的每一立方厘米都被充分调动。一个人内心的感受与外在的表现如此不同，就像一个人形塔迪斯，真是绝妙的把戏。几年后，另一位本尼粉丝告诉我，她走在街上时，会看着其他人微微一笑，暗自想：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完全理解：如果你能看到我内心发生的一切就好了。我比你想象的要丰富得多。那次之后，我又和杰德见过几面，在咖啡馆，有时是她的家，如果她的家人外出的话。她并不奇怪，而且在她的陪伴下我感觉自己也不那么奇怪了，我们都是会“耍花招”的女人。

你一定知道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想做的就是不止不休地聊关于他的一切，但没有人愿意参与，因为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真的很无聊。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愿意加入，然后这个人带来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会是怎样一幅画面。在杰德的带领下，我接触到本尼粉丝圈更广泛的疆域。之前我带着一种轻蔑，将论坛用户想象成夸张的漫画形象，认识她之后，她们变成了一张张人脸。这让我意识到自己与她们是多么的相似，之前的我多么无知。通过她发给我的汤博乐、推特、红迪网和同人创作网站的链接，我开始发现更多的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和我一样的人。

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而且她们的年龄比想象中更大，远远超过社会所认知的会爱上名人的年龄，就像莱亚曾说过的，我们都在思考和感受同样的事情。我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她们在发现自己被“康伯巴奇化”时的震惊与困惑。“我从十几岁起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她们说，从她们的个人历史和记忆中挖掘出献给罗伯特·史密斯的口红之吻，对大卫·杜楚尼的迷恋，为“比吉斯”发出的尖叫声。我们一起来到一个从未想过要到达的地方，被一种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所牵引。我喜欢这里，喜欢她们。我们竟然如此相似，但绝不仅限于对本尼令人难以理解的爱。这甚至不是——我不敢相信自己会这么说——发生在我们身上最有趣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起来如此快乐。



一天晚上，我在杰德家做客，我们在大电视上看本尼的剧时，她的丈夫从露营地打来电话，他正带着孩子们在露营。我们按下暂停键，她快速和丈夫聊了几句。墙上的电视投下微光，

本尼静止不动的脸隐隐出现在我们之间,我不禁注意到杰德在通电话时说话略有些含糊。她没有提到身边还有其他人。

她挂断电话后我问她她的丈夫和孩子是否知道我在他们家坐在他们的沙发上吃比萨。“不知道,”杰德回答道,“我没有告诉他们。”她从没告诉过他们,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与我见面的事。在她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些,”她指着我的方向说,“他们只会说,不成熟的愚蠢追星女孩才会干出这些事。”她按下播放键,电视上本尼的脸那么大,我却无法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仿佛灯突然打开,我从黑暗中现身,眨眨眼睛,看到我们的原貌:两个中年妇女,两位母亲——坐在擦拭得锃亮的皮沙发上,直勾勾地盯着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怜男人。这一切看上去不太妙,剧结束后我匆匆离开。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如此受伤,杰德只是做了我也在做的事。我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她,也总在内森和孩子们外出时与她见面。但保守秘密和成为秘密是截然不同的。保守秘密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成为秘密则更像是耻辱的一部分。我和她、和女网友之间的隐秘联结,以及我们达成的共识——我们比人们想象中更真实——曾令人兴奋不已。在黑暗中,我们还活着。但此时此刻,我带着些许羞愧,清晰地认识到,把内心世界藏起来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把戏。这是一个陷阱,把你分割成真实的自己和伪装的自己。只有本尼这样做的时候才会魅力四射。

在其他人眼里,这只是愚蠢的追星女孩的特质。还能是什么呢?找到那么多拥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分享那么多相似的感受,并没有让情况好转,反而更糟、更蠢、更尴尬。数量所带来的安全感更容易产生自我被认可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自己正在变得正常——甚至快乐。但在现实世界,所有这些女性正是问题的根源。这就是那张图表所展现的真相!杰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女性没有说出口的、未被看见的,恰恰是女性情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藏在图书馆书本的纸页之间、躲在网络论坛里、在心中默念“要是你知道……”、参加女生之夜、在黑暗中舞蹈——那些情感活下去的地方与情景。它们一旦接触到现实世界的光线,就会变成“康伯娃”发出的尖叫声。

那天晚上,当内森和孩子拜访完亲戚回到家时,我问他们这次短途旅行怎么样,却只字不提自己去了哪里。我开始偷偷地在网上给能联系到的人发消息。我们都很开心,不会有人想要看到现实世界的光线照进来的那一幕。



塔比瑟·卡万

澳大利亚作家,长期为《纽约邮报》《纽约时报》《澳大利亚地理》等出版物撰稿,关注身份、家庭和流行文化等议题。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东京奏鸣曲》(2008)剧照

## 催生“消失的劳动者”的社会

催生“消失的劳动者”的社会，究竟存在怎样的结构性成因呢？熟悉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家将现在的中年人称为“容易被社会帮扶忽视的一代人”。

瑞穗情报总研主任研究员、日本福祉大学教授藤森克彦在分析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后，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至今为止，由于普遍认为中年人是“主要劳动力”等原因，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即便有困难也很难成为帮扶对象，容易被社会保障安全网忽视。

因此，藤森克彦认为，“消失的劳动者”是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的代表性现象。在过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结婚后或成为家中顶梁柱，努力工作，或成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人们普遍认为，在他们之中很难产生贫困或孤独的问题。换言之，社会认为中坚群体可以自己解决生活中的风险。

然而，在如今的中年人群中，未婚人数增加，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非正式员工，仅能获得有限薪水。其中很多人更是不得不照顾父母。如此形象，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时代显然无法成为预设的人生模型。

藤森认为，对于这些无业或非正式就业的未婚中年人群中存在的风险，如果继续置之不理，将有可能演化成更加严重的问题并显现出来。

“曾经，人们认为中年人或是负责养家糊口的正式员工丈夫，或是负责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是，现在中年人的类型更加多元。其中，不仅非正式员工人数不断增加，未婚者的数量也节节攀升。这些无业或非正式就业的未婚中年人，由于没有配偶，比正常情况下更加缺乏与同龄人之间的相互支持，生活中的各项风险随之显现，问题也随之变得更加严峻。在社会帮扶一线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认为出现了更多难以解决、十分棘手的中年受助者案例。问题背后隐含的原因之一就是‘消失的劳动者’。”

### 领取生活保障金的老年人口急剧增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基于总务省的人口普查，藤森对四五十岁中年人口结构随时代的变化进行分析，指出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是“消失的劳动者”产生的结构性背景之一。

如下表所示，若将2015年与1995年进行比较，四五十岁的人口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其中未婚人数从277万增至650万，增长了一倍以上。另外，在未婚人群中，与父母同住的人数从113万增至341万，增长了两倍以上。

| 四五十岁未婚人群以及“与父母同住”/“单身”人口数量增长情况 |       |       |      |       |       |      |       |       |      |
|--------------------------------|-------|-------|------|-------|-------|------|-------|-------|------|
|                                | 总 数   |       | 男 性  |       | 女 性   |      | 增长年   |       |      |
|                                | 1995年 | 2015年 | 增长率  | 1995年 | 2015年 | 增长率  |       |       |      |
| 四五十岁人口①                        | 3,650 | 3,432 | 0.94 | 1,818 | 1,720 | 0.95 | 1,832 | 1,704 | 0.93 |
| 其中未婚人口②                        | 277   | 650   | 2.34 | 180   | 405   | 2.24 | 97    | 245   | 2.35 |
| ③④/①                           | 8%    | 19%   | —    | 10%   | 24%   | —    | 5%    | 14%   | —    |
| 与父母同住⑤                         | 113   | 341   | 3.02 | 74    | 212   | 2.86 | 39    | 129   | 3.33 |
| ③④⑤/①                          | 41%   | 52%   | —    | 41%   | 52%   | —    | 40%   | 52%   | —    |
| 单身人群⑥                          | 121   | 269   | 2.23 | 81    | 178   | 2.19 | 39    | 91    | 2.32 |
| ③④⑥/①                          | 43%   | 41%   | —    | 45%   | 44%   | —    | 41%   | 37%   | —    |

数据出处：日本总务省《人口普查》1995年版、2015年版。不明确规定比例分配，因此与人口普查数据不一致。另外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增长率与计算结果可能略有偏差。

与父母同住的中年未婚人口增加的背景原因在于，非正式工作收入很低，许多人只能通过与父母同住减少开支，维持生计。另外，有人因为必须看护无法自理的父母，因此一直不结婚，与父母同住。还有人因为同时具备上述多重风险因素（未婚 + 看护 + 非正式员工）而与家长共同生活。

另外，藤森教授参加了公益财团法人中年退休金计划综合研究机构针对四五十岁中年未婚人群的调查以对中年未婚者的真实生活状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父母等亲人同住、形成了两人以上家庭的中年未婚者中，约两成处于无业状态。即便正值劳动主力年龄也不参加工作的人超过两成，对于深陷“人手不足”困境的日本社会来说，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在中年未婚人群当中，非正式员工占比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超过20%与30%。非正式员工的工作有雇佣期限，计时发薪，不得不经常换工作。这样的非正式员工占比的增加，也是中年人群当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虽然这些人目前还在工作，但是可以预见，其中很多人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消失的劳动者”。

在四五十岁的未婚人群中，年收入100万日元以下的人数略少于三成。如前所述，其中很多人难以实现经济自立，只有选择和父母一起生活，加上父母的退休金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时，其中的风险被“家人”这个黑箱隐藏。等到父母过世，问题凸显时，往往为时已晚。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消失的劳动者”这一问题都隐藏在“家人”这个黑箱当中。然而，藤森教授指出，在这一问题已显露苗头的当下，如果还不采取任何措施，在未来问题将会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这是因为，这一群体在二三十年后也将步入老年。因此，如果任由事态发展，需要领取生活保障金的老人恐怕会比现在更多。

“为何中年未婚人群中低收入者占比高，这是因为很多人遭遇就业冰河期，只能作为非正式员工就业，收入和工作都不稳定。另一方面，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并不会随着

年龄上升而增加。如果建立家庭，将面临能否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以及住房贷款等问题，因此对于未来会产生种种不安。最终，他们或不想结婚，或放弃组建家庭。”

### 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为何依旧难以解决

对于中年未婚人群来说，在父母离世后，现实情况往往变得更加严峻。前文提到藤森参加的中年退休金计划综合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在保障老年生活而设立的官方养老保险中，仅参保满额为每月 6.5 万日元的国民养老保险的人，在中年未婚人群中占比就少于六成。

| 中年未婚人群的年收入及就业情况（单位：%） |                 |       |       |              |         |      |     |  |
|-----------------------|-----------------|-------|-------|--------------|---------|------|-----|--|
|                       | 本人年收入低于 100 万日元 | 就業 情況 |       |              |         |      |     |  |
|                       |                 | 正式员工  | 非正式员工 | 个体经营、就职于家族事业 | 自由职业、副业 | 无业   | 其他  |  |
| 单身男性                  | 19.6            | 47.7  | 19.0  | 12.3         | 3.1     | 13.9 | 4.0 |  |
| 单身女性                  | 15.5            | 43.4  | 31.2  | 4.4          | 7.5     | 11.7 | 1.8 |  |
| 两人以上家庭中男性             | 25.4            | 39.8  | 19.6  | 14.9         | 4.6     | 18.7 | 2.5 |  |
| 两人以上家庭中女性             | 38.5            | 31.8  | 34.7  | 6.6          | 5.0     | 20.3 | 1.6 |  |
| 合计                    | 26.5            | 39.5  | 26.5  | 9.7          | 4.9     | 16.9 | 2.4 |  |

出处：藤森克彦：《单身中年的生存实态与晚年风险——根据〈与父母同居的两代人以上世代〉和〈单身世代〉所做的分析》，载网络期刊《年金研究》第 3 号，公益财团法人“年金长者计划综合研究机构”，2016 年 6 月。

另外，在中年未婚人群中，不到一成的人从未缴纳过国民养老保险。因此，他们在步入老年时很有可能无法领取养老金。不论是在父母去世后重新组织生活，还是安稳地度过暮年生活，对他们来说都堪比登天。

“不论是长时间的就业空窗期，还是父母过世，都使他们感受到更加强烈的孤立感。这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对他们提供包括心理咨询在内的各种帮助。如果对这些无业中年人群置之不理，他们在老年时陷入贫困的风险势必更高。当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需要领取社会救助金的极度贫困状态。换言之，如果尽早予以帮助，让其自食其力，他们将缴纳税金与社会保险，成为支撑我们社会发展的一分子。为帮助不工作的中年人所花费的，并不是单纯的成本，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投资。我认为树立这样的认知尤为必要。”

藤森强调，目前日本企业在录用中年人时，往往希望他们能够立刻上手工作。因此，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用工单位招聘“消失的劳动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企业不希望在录用“消失的劳动者”后还要在他们身上花费培训费用。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这样做的关键时刻。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日本已经成为人口负增长社会，人口自 2008 年达到 1.28 亿的峰值后便不断减少。

人口减少即意味着劳动力减少。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估测，15 至 65 岁的劳动力人口曾达到 8000 多万的峰值之后不断减少到 2050 年将减少 2000 万，预计劳动力人口将不到 6000 万。

这是按照年龄得到的劳动力人口数据，当然也将“消失的劳动者”等长时间无法劳动的人包括在内。为适应劳动力人口本就锐减的社会现状，绝不能对“消失的劳动者”置之不理，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紧迫、亟待解决的课题。

如今，日本社会存在严重的人手不足问题，因此绝不能对超过 103 万人的“消失的劳动者”视而不见。为了帮助他们回归劳动市场，需要制定相应的帮扶措施。

“我认为，即使是长时间未就业的人，只要将他们能做的工作一点一点地交给他们，再付出一些时间成本并施以适当的支持，大部分人也能胜任工作。只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能委以重任，企业也能提升工作效率，减少长时间加班。在人手不足愈发严重的当下，每个劳动者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即便这些中年人长时间无业，只要他们愿意工作，同时社会愿意花费时间予以帮助，就会让他们获得劳动能力。我认为这对企业和社会都有利。”

### “消失的劳动者”与社会孤立

节目组还采访过另一位学者，宫本美智子。她是家庭社会学专家、放送大学名誉教授。宫本教授指出，在考察“消失的劳动者”问题时，必须重视“看护风险”。

2000 年，日本确立了看护保险制度。然而由于少子化程度急速加剧，看护过程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人的帮助。同时，看护老人的中年儿女这一代是接受非正式聘用的第一代人，工作稳定性和收入都没有保障。他们也不能像正式员工一样利用看护假制度，因此，从结果上看，他们往往不得不选择全职看护家人。

为了节约看护费用，不得不自行承担全部看护工作，从而产生了被社会孤立、精神上陷入绝境、更加难以再次就业的风险。宫本教授认为，很容易让人陷入这种困境的一种情况就是父母老年痴呆。

“当父母需要照顾，尤其是需要护理老年痴呆的老人时，就不得不 24 小时照看家人。在这种情况下，照护父母的子女连外出的机会都很难得到，更别说正常地与人交往了。他们在时间和精神上都没有空闲，当然在经济上也不宽裕，因此很容易精神崩溃。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作为社交生活基础的时间、情绪以及金钱。”

在此基础上，宫本教授提出，随着老龄人口长寿化，不得不持续看护父母 10 年，甚至 20 年，这让孩子苦不堪言，并导致他们与父母以外的社会关系长期隔绝，引发了严重后果。

“看护父母的时间并不是仅仅一两个月。在这几年乃至十几年间，自己的时间几乎全部被看护父母占据，不知不觉间与亲朋好友都失去了联系。这时就会想到自己在这

些年里几乎没有和别人交流过，陷入了孤立的状态。如果能够早点采取行动，避免陷入这样的状态，估计会想要和别人商量一下吧。然而，最终还是连商量都顾不上，被困在了整天看护家人的日子当中。于是父母和孩子都被社会孤立，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我认为在家看护就会存在这样的风险。”

一旦中年人成为消失的劳动者，在父母去世后不找工作，继续闭门不出，就只能坐以待毙，面对步入老年后的严峻未来。

### “父母去世后”的孤立

东京都新宿区政府以壮年期（35 至 64 岁）单身人群为对象进行了生活状况调查。这次调查由宫本教授担任顾问，分析问卷结果，探究中年人群“家里蹲”的状态，即“消失的劳动者”窘困的原因。

问卷结果显示，关于社会孤立的调查项目中针对如果您住院了有能够让您依靠的人吗？这一问题，男性收入越低，回答“没有”的比例越高，超过五成。

问卷结果也表明，不工作、低收入使他们失去了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加速了被社会孤立的进程。在调查中担任顾问的宫本教授认为，“消失的劳动者”与“社会孤立”紧密相关。

“工作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分工，尤其是对男性来说，如果在年富力强的阶段不去工作，会感觉仅因此就被剥夺了堂堂正正为人的资格，也会在与他人接触时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另外，由于不工作，就不会定期有钱入账，每天都会感到不安。而且有定期入账的钱意味着，即便被剥离一切，这些收入也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成年人。因此，在没有工作时会感到不安。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感觉自己被社会排斥。”

“消失的劳动者”的存在本身就对社会提出了质问：日本的目标是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还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把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放在首位呢？如果“消失的劳动者”进一步增多，参加生产活动的人进一步减少，日本恐怕会沦为生产力低下的国家。

因此，原本作为劳动力主力，每一个中年人堪称珍贵的资源。显然应该创建让他们都能各显其能、作为社会的建设者发光发热的理想环境。但是，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却恰恰相反：由于看护以及非正式聘用等种种壁垒，这些人难以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

宫本教授指出，日本社会应当反思并更正迄今为止的方针，为了建设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每一位劳动者的社会，必须设立新制度，发布新政策。

“我认为，必须让日本社会认识到，对不能工作的人视而不见、仅凭在大企业工作的人才建设经济大国这一方针路线是错误的。在人口负增长的当下，应该重视每一个个体，以建设所有人都能幸福生活的社会为目标。否则，这个社会终将崩溃。”

那么,又该如何让“消失的劳动者”再次参加工作呢?具体来说,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为了得到一些启发,节目组采访了大阪府丰中市的生活支援科。

丰中市在帮助无业青年,也就是所谓的“啃老族”方面经验丰富,在日本堪称表率。作为核心的生活支援科的最大特点是,以产业振兴部局为中心,而不像其他自治体一样以福祉部局为中心组建而成。

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把“啃老族”的再就业完全交由公共职业介绍所等劳动就业培训中心负责,而是自行与企业交流,开拓能够了解情况并提供工作的职场空间。现如今,生活支援科进一步活用这一经验,积极与企业对接,帮助中年“消失的劳动者”获得实际工作。

接受采访的滨瀬宏司先生,向我们展示了由其开拓的企业的文件。文件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摆满了五张桌子。他还将企业概要、具体工作内容、需要的人才特征分门别类整理成了表格。

“这里登记了最近12年里,承诺可以雇佣曾经长时间‘家里蹲’的人的企业的文件,以及相关注册信息。”

“有多少企业呢?”

“大约1000家。”

在人手不足愈发严重的当下,如果能够与行政手段紧密联动,抓住再就业的帮扶形势,即便是一开始难以全职工作的人,愿意接受他们的企业也逐渐增加。

“一旦有企业联系我们介绍员工,我们部门的职员首先会去拜访企业并了解相关情况,例如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工作内容是什么、希望什么时候到岗等,并一一记录在案。”

这一对策的目的在于,就业支援不能仅以讲座敷衍了事,而是持续帮助求职者,直到他们到达实际就业的出口。很多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仅停留在将求职者聚集起来、做个讲座等这一入口阶段。但是这里更加注重的是“出口帮扶”:在得到企业理解的同时,求职者开始工作后也继续为其提供帮助,直到他们的就业情况稳定下来。

“我们本来就从事地方就业支援事业,为帮助求职者找到出口,不断进行企业开拓。在了解到企业的情况以及工作的内容后,才能为求职者介绍,因此必须进行企业访问。难就业人群是指很难仅凭自己的力量寻找企业并就业的人,因此我认为,由我们来为他们找到出口是很重要的。”

丰中市通过这种对策在年轻人的就业帮扶中做出了成绩,现在也开始着手解决中年的就业问题。行动的契机来自开展单独问卷调查时得到的结果。

在2016年度针对15至39岁人群的“家里蹲”实际情况调查中,丰中市还对40至45岁年龄层人群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当时,日本政府对“家里蹲”的定义仅涉及39岁以下的年轻群体,然而丰中市为了跟踪在2010年度的问卷调查中出现的35至39岁人群的状态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特地在这次调查中也对40岁以上人群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40岁以上的“家里蹲”群体中,从十几岁开始这种状态的人不到一半,30岁以后开始“家里蹲”以及最近才开始“家里蹲”的人约占44%,接近40岁以上“家里蹲”群体的一半。其中,不仅有从十几岁开始由于不上学一直闭门不出的人,也有在20多岁时还像普通人一样工作、到了30岁后由于某些契机开始不工作而陷入“家里蹲”状态的人。通过问卷调查,上述事实得以浮出水面。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少数人一开始就沒有工作,超过七成的人都有工作经验。他们失业的原因一般是看护父母等,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很多都是“消失的劳动者”。

“曾经进入社会的中年人,或是由于人际关系,或是由于身体疾病,或是由于需要看护家人而离职,就这样闭门不出。我认为此类事例为数不少。”

如此一来,丰中市通过单独调查发现了中年“消失的劳动者”这一问题。因此,丰中市的关注重点不再局限于青年人,也尽快开始了对中年人的就业帮扶。



####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NHK即日本广播放送协会,成立于1926年,是日本第一家根据《放送法》成立的大众传播机构。NHK采访组敢于挖掘事实真相、直面社会困境,已推出《女性贫困》《无缘社会》《老后破产》《三十不立》等多部反映日本现实问题的作品。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摄影：Russel Wong 黄国基

## 非虚构

# 陈冲：我家住在平江路 170 弄 10 号

陈冲 | 新书推荐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我再也没见过一栋如它的黑瓦白墙房子。”

《猫鱼》是电影人陈冲的自传性散文作品。祖辈与母亲的故事、平江路老房子的岁月，“小花”摄制组大篷车的日子，独自踏上异国留学之旅，每一部电影不为人知的幕后，生命中的爱与痛楚、挣扎，经由作者的回望，跃然纸上。写家族故事，是独特的上海叙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小花》到《末代皇帝》《意》《太阳照常升起》等等的银幕前后，是电影艺术家的传记；从上海童年到异国打拼，一段段人生旅程，是女性兼具激情与柔情的私语。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摘选了《平江路的老房子》一文分享给读者。



朋友发来三张照片，不知是谁的公寓，我一下没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发信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是吗？我放大了照片仔细看，什么也认不出来。正要给他回信说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后景的钢窗框，眼前浮现出一个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

趴在那扇窗口发呆。春夏秋冬，没人知道她在等待什么，胡思乱想什么——那一个漫长的午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妹妹的视线穿过一片草坪，父亲的脚踏车出现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路踏过来。妹妹能看到他车把手上挂着的网兜里，有个牛皮纸包。一会儿，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父亲就头顶着那个牛皮纸包走进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有些病人康复后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会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妹妹喜欢看到他这样喜悦和自豪的样子。

父亲似乎不怎么管她，也很少跟她说话。有点像《动物世界》里那样，幼崽的爸爸把食物叼回窝里，再教会它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父亲带她游泳。上海医学院的游泳池五分钱一个人，每场一小时。那时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红和海军蓝两种颜色，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里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纱。妹妹跟两个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系紧背后的带子。她穿着崭新的大红色泳衣从更衣室出来，父亲在不远处等着。妹妹抬头望见他，阳光晃到她的眼睛里。父亲抱起她，把她放进深水，由她挣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拼命伸长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浅水嬉耍，然后就沉了下去。不知过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一只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颈的带子，像老虎叼虎崽那样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过来，她知道，在紧要关头父亲会保护她的。一小时后，游泳池的铃声响起，她已经学会了踩水，以后不会淹死了。

偶尔父亲也会带她玩耍，他们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里划船、拍照。荷叶、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树干上，柳枝垂落到水里，跟倒影连成一片。这种时候，妹妹总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头顶右面扎一个翘辫子。她没有母亲那种天然的优雅，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得像个男孩。记得一位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愿意在她身上花胶片钱的。他会跟她说，站站直，或者坐挺一点。拍完后，父亲就带她到放射科去冲洗底片，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浮现出来，神奇而美妙。一个不可重复的下午，一片已经逝去的云彩，在那一刻定格，成为永远，就像琥珀里的昆虫。

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弄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事后她就病倒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她被一种尖锐的疼痛感刺醒，母亲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打完的玻璃针筒，左手抚摸她发烫的前额。妹妹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放着一块黏糊糊的酱芒果，那是她最喜欢吃的零嘴，一小块可以嚼上大半天。她一阵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谅了，她生病的时候是母亲最温柔的时候……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后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走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择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房子里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现在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片。也许是那时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摄影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前，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

从晒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后墙，墙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再往远处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路灯照不进树林，它便成了无处可躲的恋人们亲热的地方。夜晚我们有时会看到工宣队员打着手电筒，在林子里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里抓“搞腐化”的人。被电筒照到的男女会逃，会哭，会求饶。记得有一天下午，一对男女慌张地钻进树林，

贴着后墙激动地扭抱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用铅桶装了一桶水浇下去，看到他们尖叫着逃跑，我们快乐得不得了。

在我们和邻居的晒台之间，有一堵一尺厚的高墙，每年国庆节的夜晚，我们就踩上阁楼用的木梯，爬到墙上看烟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抗议，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她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她的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总是带着一丝感伤。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淋浴，一边哼歌。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圆润。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会让你日后魂牵梦绕？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人体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来，在晒台上洗澡的时候，母亲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个年代所不可思议的自由。我也是快乐的，苍穹下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特权，母亲的肢体、歌声，还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跟母亲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陪父母去游泳池。母亲佝偻着腰，松懈的肌肤好像被雨淋湿的旧衣服，她看着更衣室里自己的衣服，认真考虑穿每一件的先后次序，然后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亲，心情犹如一首挽歌。

我把朋友发来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她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了一眼说，不是的。我说，人家装修成这样了，光二楼租金就两万块一个月。她说，那里死人比活人多，还到处都需要修，有什么好。想了想她又说，不过那里有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难过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十二岁的母亲跟她父母、妹妹、外婆、奶奶在这栋房子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时候她还不能预见生活将给她的磨难和这栋房子里将会发生的变故。

母亲回忆起老房子的时候说“我们 9 号”，难道她连老房子的地址都忘了吗？很小的时候——那几乎是我人生的第一记忆——母亲教我背诵“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 170 弄 10 号”。在那些动荡的岁月，这句话让我安心——我知道自己是谁，我有归属。母亲得健忘症好几年了，不管她说什么我从来不纠正她，可这次我忍不住提醒她我们家是 10 号，不是 9 号。没想到她记得很清楚，耐心跟我解释道，10 号是后来的事，本来颜福庆为上海医学院十位海外回来的教授，盖了十栋楼，抗战结束我们从重庆搬回来，住 9 号。很多年后加盖了一栋小房子，成了新的 1 号，我们就由 9 号变成 10 号了。那时候，阁楼都是通的，几栋房子里的小孩，就跟老鼠一样从一家钻到另一家，很开心的。

母亲慢悠悠地回忆起当年住在那里的每一户人家：1 号是肺科吴绍青；2 号是生理朱壬葆；3 号是生理徐丰彦；4 号是病理谷镜汧——“文革”期间他自杀了；5 号是生化林国豪；6 号是内科林兆耆；7 号是五官科王鹏万——我家小猫喉咙里卡了鱼刺就是王医生戴了额镜用钳子夹出来的，王太太是我的钢琴老师；8 号是胸外科黄家驷，我得肺结核就是黄医生为我动的手术；我们家住 9 号；10 号是沈克非一家，跟我们特别要好，沈教授从美国带回来一辆汽车，礼拜天开车跟儿子女儿去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做礼拜，他夫人不大去，他就把我带上。那时候不搞政治运动，邻居间关系很亲密，每天晚饭前大家出来在草坪上小聚，散步聊天……

讲到那片草坪，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儿时的自己，在草坪上跳绳、踢毽子、打球、捉迷藏、打架。到了傍晚，各家大人在窗口大声呼唤自家的小孩吃晚饭，孩子们好像退潮那样跑回家，草坪上瞬间空空如也，只剩下被孩子们踩扁、碾碎了的青草，在夕阳下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记得政府提倡绿化那年，草坪上便种满了树。一过了黄梅天，所有树干都系上绳子挂满了棉被。日落时，人们捧着晒了一天的被子，把脸埋在里面闻太阳的味道。如果幸福有一种气味的话，梅雨季后第一天阳光照射过的棉被的味道，也许就很接近了。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弄堂里开始备战备荒，每家每户出人出力，在草坪上绕开了树、弯弯曲曲挖了一条壕沟。可惜挖了才一米多深就见水了，壕沟变成了我们打水仗的地方。为了预防脑膜炎的泛滥，街道领导便定期在壕沟里喷滴滴涕灭蚊子。后来，大家被召集起来垒砖，把挖出来的泥揉成面团的样子，放到木头的模子里做

成砖的形状，在太阳下晒干，再搬上一辆卡车。听说是运到附近的火窑去烧，烧好了用来造肇嘉浜路下面的防空洞。

我问母亲，还记得 170 弄草坪上挖壕沟备战的事情吗？她说，记得啊，那时大批国民党部队集中到上海，弄堂里进驻了很多士兵。我意识到，她的失忆症让她把我的少年时代和她自己的少年时代混淆了。

母亲接着说，夜里，排长和连长们睡在各户底层的一间屋内，士兵们都挤在房子南门外的廊庭上。白天，他们就在大草坪上操练，我和妹妹常去看，那些兵都是刚抽来的壮丁，完全是没受过训练的农民，连立正的姿势都摆不正，一声“向右看齐”脑袋就乱晃，喊到“向右转”“向左转”时更乱了套，排长就拿大刀拍打他们穿着棉裤的屁股。他们只被允许在我家后门外的一个水池用水，楼下厨房边的一个小马桶间让他们用，听说有一个小兵在抽水马桶处淘米，水一冲米都没了。每当开饭时母亲就看到两个士兵抬来一口大铁锅，放在草坪上，掌勺的给排队的士兵们舀两勺稀里光当的汤菜和米，十分可怜。我们楼下住了一个排长，他有工资，可以上街买饭吃。这个排长带着一条大狗，吃睡都在一起，那狗已随军多年，名叫查理。士兵们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要开拔赴前线，临走前排长就把查理给我们留下。他说，它就不要跟我们去当炮灰了，让它给你们看大门吧。待部队开走后，大院子里空空荡荡的，查理守着那间屋等排长归来，谁知左等右等不见回来，晚上它就跑到大草坪中央对天哀鸣，那声调十分凄惨。我们怎么呼唤它，它都不理，天天如此。安妈妈（我姥姥）说，我们要防的就是那些退下来的残兵败将，而它偏偏跟所有穿黄军服的人亲，看门是不管用了，养又养不了，还天天哭嚎。说完就把它送到上医动物房去了，到了那里就凶多吉少。

母亲不记得几分钟前说过的话，但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却记忆犹新。她轻轻唱起一首英语歌，像一个被自己头脑驱逐出境的人，悄悄潜回了那曾经熟悉温馨的河畔。

*You belong to my heart  
Now and forever  
And our love had it's start  
Not long ago  
We were gathering stars  
While a million guitars  
Played our love song  
When I said I love you  
Every beat of my heart said it too  
It was a moment like this  
Do you remember  
And your eyes threw a kiss  
When they met mine  
Now we own all the stars  
And a million guitars  
Are still playing  
Darling, you are the song  
And you'll always belong to my heart*

母亲居然唱得一字不落，充满着永恒的渴望。唱完后她害羞地说，那时候才那么小，就唱这种“黄色歌曲”。接着母亲聊起儿时的两个玩伴安妮和弗兰克，这支歌是在他们家听唱片学的，那是他们最爱的歌手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唱的。安妮和弗兰克的妈妈是美国人，他们后来回了美国。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对 2 号（原 1 号）里的外国老太太很好奇，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她，因为她白天不出门。有时晚饭后，她会跟丈夫到院子里散一下步，手总是挽着男人的胳膊。备战备荒那阵，里弄里经常有防空演习。有一次演习我们几家人挤在不知谁的一间房里，那是我第一次在光线下看见她的脸。窗帘关着，当时的黄色染料腐蚀性强，窗帘布上的黄花变成一个个小洞，阳光一束一束从洞眼里钻进来。她坐在那家的床沿上，苍白的皮肤好像是透明的，深凹的眼眶里眼珠是灰色的，高耸的鼻梁像是一把尖利的武器。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她。屋里的几个孩子开始互相推来推去，一个压低嗓门说她来抓你了，一个尖叫，一个大笑。她默默地承受着，

身旁的丈夫也不作声。

她怎么会在这个跟她格格不入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美国女孩嫁给中国人是骇人听闻的事吧。她是跟家庭决裂了才跟着一位英俊的中国医生远渡重洋来到我们中间吗？什么样的激情才能给人这样决绝的勇气？在那些无比艰难的岁月里，她后悔过吗？我想象，她一定也跟我一样，无数次在梦里回到她大洋彼岸的祖屋，徘徊在她童年的树林……

二十岁的时候，我也背井离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像是被孤身放逐到月球上，回程遥遥无期。那年，我的信仰死亡了，爱情也死亡了。绝望的时刻，总是记忆中母亲的声音融化我内心的冰川：“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 170 弄 10 号。”

这句话提醒我生命的归属和牵挂，责任与使命，它把我带回梦乡里的房子——篱笆上紫色的喇叭花，花园里瘦瘦的枇杷树，窗沿上种的青葱的红瓦盆，和瓦盆边熟睡的三花猫，晒台高墙上骑着的男孩女孩，还有他们仰头看烟花的脸、眼睛里的光彩……

朋友发照片来的时候问，要不要哪天带你回那里怀怀旧？我说不用去了。人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岁月，人回不了家就像他回不到母亲的腹中。在几十年流浪的日子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再也没见过一栋如它的黑瓦白墙房子。



陈冲

1961 年生于上海。演员、电影导演、作家。  
主演电影《小花》《末代皇帝》《红玫瑰白玫瑰》  
《误杀》等，执导电影《英格力士》《世间有她》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小鸟文学出品  
卷四十三，2024.7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